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毛泽东的军事艺术

 **eBOOK**
内容资料 非同寻常

前 言

1893年12月26日，在中国大地上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里诞生了一个杰出而特殊的生命。

他以自身的行动表明，他是家庭中不安分的人，他是学校中的动乱因素，他终于成为旧时代的叛逆者。正是他，后来却成了当代的伟人，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

1921年，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十三个代表之一。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他在党内和军队的领导地位，一直到他去世，长达四十余年，而且他的思想还将继续指导着这个党。1949年，是他，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象征着几千年的旧秩序在他及其战友们的手中崩溃。使庞大、古老的龙的国度地覆天翻“换了人间”，1966年，他以自己的思考和威望，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震惊中外的“文化大革命”……

无论从什么角度，也不管他的功过如何，谁也不能否认他是时代的骄子、世界的伟人，他的名字连同他的影响，将会流传几代、十几代，甚至更久远。

他，以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成功地把马列主义引进中国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他没有俗守教条；“宜将剩勇追穷寇”，他断然拒绝了斯大林的告诫。他就是他，他的思想源于马列，但又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他有他自己的思想体系，他有他自己的思维方式，他有他自己的思维艺术。

他富有生气的语言，熔铸了古今中外语言之精华，谱写出史诗般的宏篇巨著、华美诗章。他深沉、含蓄、幽默。风趣的谈话，令中外朋友折服；他给家人亲友的书信，又是那么平易、亲切、热情；他的演讲能使人开怀大笑，也能令人颌首称道、遇思无限。他不愧是语言艺术的大师。

他从一个书生成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事战略家。他创造了独有的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他以自己的军事艺术谱写了多少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篇章，留下了多少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的千古绝唱。上下几千年，帝王写诗填词的大有人在，但没有哪一位能象他的诗词那样想象丰富、气魄宏大、寓意深刻、意境高远，更不用说那种昂扬奋进、高瞻远瞩的胆识和精神。他是领袖又是诗人，受之有余，当之无愧。他的书法别具一格。他初练魏碑，酷爱“二王”，他的书法汪洋恣肆、任意挥洒、布局谐调、自成妙趣，众口皆碑。

《毛泽东的艺术世界》这套丛书，正是从艺术的角度来审视和探究毛泽东的一个侧面，使人们能从领袖之外看到一个艺术化的毛泽东，这也是研究、宣传毛泽东及他的思想所作的尝试。我们衷心希望这种尝试，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对毛泽东的研究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编者
1991年6月

毛泽东的军事艺术

秋收起义旌旗奋 罗霄井冈建红军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之后受党中央的委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赶赴湖南，组织领导湖南秋收起义。毛泽东到达长沙后，立即向改组后的湖南省委传达了“八七”会议的精神，同省委领导一起详细讨论研究了有关起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确定了湖南秋收起义的具体计划，成立了秋收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1927年8月下旬，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了军事会议，具体部署了发动起义分路合攻长沙的计划，将武昌原国民政府警卫团编为第一团，安源煤矿起义的工人自卫队和萍乡、醴陵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团，平江浏阳农民义勇军编为第三团，将流落在鄂南的一部分旧军队和通城、崇阳的一部分农民自卫军编为第四团，共同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9月9日，震撼湘赣的秋收起义爆发了。起义是完全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的，中共湖南省委发动长沙工人赤卫队和近郊农民首先起来，破坏了岳阳至株洲的铁路交通。与此同时，工农革命军四个团，分别从江西修水、安源、铜鼓出发，向长沙进击，并先后占领了醴陵、浏阳县城和平江的龙门厂、浏阳的白沙、东门市等地。但是，当时整个革命形势已开始趋于低潮，敌强我弱，加上起义军某些指挥员缺乏经验和警惕，措施不利，第四团中的旧军队在进攻平江时临阵叛变，以致起义先后受挫。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集合了受挫后的起义部队，召开了前委会议，分析了当时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形势，攻占长沙这一中心城市已不可能，决定改变原来攻打长沙的计划，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南进途中，在江西芦溪又受到敌人的伏击，部队一共剩下不到1000人。9月29日，部队到达永新县境内的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三湾改编第一次把支部建立在连上，并成立了营以上的各级党委，建立了党代表，选举了士兵委员会，建立了军队政治工作，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奠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部队南进到达宁冈古城后，毛泽东召集了占城会议，总结了湘赣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着重讨论了在井冈山区域建立革命根据地问题。毛泽东指出，为创建年冈山根据地，党和军队要执行开展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和建设根据地三项任务，并把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毛泽东还正确地提出了团结当地农民武装力量和土客籍群众共同建设根据地的方针。10月27日，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的中心茨坪。以天险的茨坪、大小五井、茅坪等村庄为根据地的指挥中心和后方，向井冈山四周的永新、宁冈、遂川、茶陵、酃县、桂东、莲花等县出击，扩大根据地。从文家市到茨坪，历时一个多月，辗转作战，终于将红旗插上了井冈山，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毛泽东为什么选择井冈山作为革命根据地呢？因为：（一）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而罗霄山脉南接广东、北衔湖北，东西分界江西、湖南，一切革命的举动都足以影响湘、鄂、赣三省的工农群众。（二）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较好，并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地方武装。（三）井冈山上村落，出产稻米和各种杂粮，四周连接着物产较为丰富的地区，便于红军筹款、筹粮。（四）井冈山位于江西的遂川、宁冈、永新、莲花和湖南的茶陵、酃县等县之间，以宁冈为中心，周围五百里，纵横八十里，峭壁耸立，森林蔽天，只有五条坎坷崎岖小道，通向山里，形势险要，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因此，是很好的军事后方根据地，最有利于红军的军事割据。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经过十分艰苦的斗争逐步发展起来的。红军到达边界时，党的组织已全部被敌人破坏了，群众革命情绪受到严重挫伤。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毛泽东首先恢复和建立边界各级地方党组织，还领导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充分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带领边界军民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因陋就简地办起了红军医院，自己上山采药，村村办起熬硝盐厂，自己动手熬硝盐，自己种棉花，纺纱织布，实行正确的工商业政策，开办红色圩场，繁荣根据地的经济。这样，根据地的红军和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采用种种办法打破了敌人的反革命经济封锁，渡过了艰难的岁月，赢得了创建红色政权的胜利。

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一支完全新型的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人民军队成长发展了起来。红军中严格实行党代表制度和“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发展大批工农战士入党；坚持实行民主制度；加强部队的阶级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初期，正式宣布了红军的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后来又提出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以后逐步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纪律，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和团结人民起了很大的作用，是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使军队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永远立于不败之地。1927年底，毛泽东规定了红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这样，就使红军从根本宗旨上区别于任何旧式的军队。由于群众武装、地方武装的组织不断扩大，从而创立了正规红军、地方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开展了真正的人民游击战争。在1928年4月朱德率部和毛泽东会师后，适应当时的情况，又提出了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样，就初步形成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和人民游击战争的基本战略战术，为日益发展的武装割据的局面，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军共3000余人，在宁冈砦市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会师后，在毛泽东领导下，取得了“四月至七月四个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尤其是6月23日龙源口大捷，歼敌一个团，打垮两个团，缴枪千余支，取得了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达到边界全盛时期。

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向井冈山区域的进军，以及同朱德、陈毅率领的“八一”起义和湘南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会师，创立和扩大井冈山根据地，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把革命的退却和革命的进攻结合起来的最好的典范。这个进军是在革命暂时失败的形势下，革命力量被迫从城市退却下来，正确地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较薄弱、革命基础深厚的农村，特别是数省边界的边区，地势险要的山区，形成工农武装割据，创立了边界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创建红色政权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道路。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

黄洋界上炮声隆 以一当十败敌兵

1928年4月至7月，在湘赣边界，由于贯彻了毛泽东当时制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军事上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根据地区域一天比一天扩大。可是，当时的湖南省委却采取错误的冒进方针。7月17日省委代表杜修经乘毛泽东不在酃县的时候，不察当时的环境，只知形式地执行省委要红四军去湘南的指示，造成二十九团全部损失，招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历史上的八月失败。

正值二十八、二十九团要去湘南之际，毛泽东便率领三十一团两营兵力，在永新阻击吉安来犯之敌，“在广大群众掩护之下，用四面游击的方式，将此十一团敌军困在永新县城附近三十里内至二十五天之久。”（《井冈山的斗争》）从俘虏身上搜到敌军命令，8月1日敌人以6个团兵力直取宁冈的作战计划，终于被红军打破，未能实现。

可是狡黠的敌人乘我去湘南部队攻打郴县受挫，便向我猛攻，红军不得不退出永新。8月中旬，部队按毛泽东的部署，在永新、莲花、茶陵边境集结。

部队到达集结地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便召集连以上干部讨论行动问题，并总结永新阻敌的经验。但突然得到我军在湘南失利的消息，毛泽东当即决定，由他亲率三十一团第三营到桂东去迎还大队，命令第一营坚守井冈山。他说，五百五十里井冈山的地势好，有红米南瓜吃，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党恢复了，群众起来了，这是很好的割据地区，我们在这里有了依托，可以进退自如地打胜仗，扩大割据地区，敌人对我是无可奈何的。若失掉井冈山，我们将会是“虎落平阳被犬欺”了。

第二天早晨，毛泽东率第三营取间道向桂东去了。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布置了第一营和团部特务连的工作后，就带着团直属部队到井冈山部署防务去了，一营和团部特务连留在当地打游击，做群众工作，保卫红色政权，牵制与迷惑敌人，密切注视着湘赣两省敌人的动向。

情况紧急！湘敌第八军一个师配合其主力在桂东与我二十八团激战，从酃县进攻宁冈，奔袭井冈山，夺我根据地，妄图迫使我军在白区作战遭受失败。一营营长陈毅安得此情况后，留第二连、团部特务连坚持当地工作，率领第一、第三两连，用急行军的速度，于8月29日赶回小井，执行保卫井冈山的任务。部队一到小井，当即进行紧张的战斗动员。根据当时毛泽东坚守井冈山的指示，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讲明了敌我形势、作战任务、应有的精神和各项注意事项。经过动员，指战员个个摩拳擦掌，精神抖擞，誓死保卫井冈山。后方医院也进行了动员，轻伤兵员要求重返前线杀敌，重伤兵员充满了胜利信心，处之泰然。儿童团、少先队也全部动员起来，拿着红缨枪站岗放哨，查路条，严防敌探进出。赤卫队持各种旧式武器，夹杂着少数钢枪，担任警戒，准备配合作战。妇女们组织后勤队，为前线服务。全体军民决心为保卫井冈山而贡献一切。正是“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了。

第一、三两连准备好了，就从小井出发，跨过1430米高的山峰，进到黄洋界阵地。黄洋界位于井冈山北面，海拔1343米，距小井15里，只有荆棘丛生的一条小路可通。黄洋界左侧山峰高1351米，与八面山相连；右侧山峰1268米，可通往茅坪；背面（东）山峰1558米，与桐木岭连成一气。西面是敌人的进攻方向，地势很低，山峰之间，如万丈深谷，极为险峻，真是“过

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了。

湘敌第八军一个师从酃县经宁冈之睦村、大拢、桥林、陈家全、源头村，到腰子坑，距黄洋界约3000米，这是我军防御的主要方向，从酃县到源头村，只有110里路，相距可以说不远，但酃县东南部，即是边界割据地，井冈山是边界割据地的腹地，这里有巩固的红色政权，深入地分配了土地，武装了群众，敌人不敢轻易来犯，即便是胆敢来犯，在我军民的英勇抗击下，必遭灭顶之灾。

黄洋界哨口，是井冈山险要哨口之一，它与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土岭四大哨口相配合，构成井冈山的全面防御系统。从茅坪到黄洋界，沿途山高路远，构筑了防御工事。赣敌熊式辉师一个团，虽然已进到宁冈新城，有三十二团袁文才部在茅坪以北游击阻敌，束缚了敌人手足，难以同时来进犯。只要派出警戒取得联络就行。其它四大哨口，有三十二团王佐部和赤卫队警戒。各哨口都筑了防御工事，无后顾之忧。就黄洋界来说，指挥阵地的工事，就筑在哨口通小井一个稍低的山峰上，营的指挥所就设在那里。山峰下的小道上，有一棵大榭树，毛泽东、朱德行军或运粮上山，常在这棵树下休息。从黄洋界向西伸出一个小山梁，好象一个舌头，由高往低向前延伸约1500米，山梁上小竹、灌木、茅草丛生，草丛里都插有削尖了并用火烤过的坚硬锋利的竹钉，平常无人行走，哨口工事按坡度前低后高的地形，构筑几道壕堑。壕墙很厚，都用石块和土坯筑成，高出地面一米多，相当坚固，且是垛形，便于隐蔽射击。每一个或两个工事，可容一班人，互为犄角。工事面前地形陡峭，我可依托着工事俯瞰射击敌人，敌人则无法接近我壕堑。

8月29日黄昏，敌人进到源头村，观察地形布置警戒，我军闻讯，即进入阵地。

8月的夜晚，山下虽然闷热，山上却很冷，凉风阵阵寒气袭人。战士们都睡不着，干部们便凑到一起聊天，议论用兵打仗的事，大家谈到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从国内到国外，从古代到现代，无所不及。最后大家谈起自己亲身经历的战事，异口同声地认为，在秋收起义中，余洒度不听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的指挥，没有把第一团带到铜鼓集中行动，只顾招兵买马，结果被敌人假投降所欺骗，在平江长寿街附近的金坪遭到敌人的埋伏，以致损失一个营。而第三团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进攻例阳东门市、白沙市，连战皆捷，敌人败退达浒。但主要是因我兵力未能集中，敌军一营加强火力逆袭我三团，我不得不退至浏阳排埠，敌人即转向浏阳县去打我孤立无援的第二团，致使第二团遭受惨重损失。这是余洒度不听毛泽东指挥，自行其是，分散兵力，致使我军遭到敌人各个击破的严重教训。只有毛泽东洞察当时革命低潮已经到来的形势，在文家市毅然决然地带着一、三两团进到罗霄山脉中段，创造了湘赣边界根据地，使中国革命才走上了前程似锦的光明大道。关于明天的战斗，陈毅安营长带有结论似的口气说，湖南的敌人以为我主力正在湘南和永新，山上无红军，是奔袭“空城”井冈山的好机会，因此，便轻装进到了黄洋界，想取胜邀功。我们处于地利人和的有利地位，是有后方的作战，可以持久地打；而敌人既无后方，又在我们根据地内作战，是不能持久的。毛泽东迎还了大队，如果从大汾插入敌后，敌人便会溃退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这股敌人消灭一部或大部。若敌人早退回去，毛泽东带着部队从遂川方面打回来，即使打不着这股敌人，也同样可以打败敌人而归。只要我们坚决按照毛泽东临别时的坚守井冈山的指示去办，艰苦奋斗，一定

能够取得保卫井冈山的胜利！他的话，给大家增添了无穷的信心和力量。

8月30日，云雾散后，敌人爬上了小山梁，向我攻击前进。由于敌仰我俯，草丛里插了竹钉，敌兵只能一个一个缓慢匍匐行进，每一个兵又都要保持一定距离才能射击。敌虽以一个师人马企图偷袭井冈山，可是由于地形限制，使用在火线上的最多只能是一个营。我两个连的兵力进入阵地后，又加固了工事，做了许多单兵掩体，还拣了些石块，必要时作投掷用。我前沿壕堑是第一连的一个排，其余二排作第二梯队。第三连除向茅坪派出一个排警戒外，其余在阵地休息待命，敌人鱼贯式队形进攻无效，便用机枪射击掩护，然而低射妨碍它的士兵前进，高射则子弹在空中呼啸，无明确的射击目标。我则弹无虚发，每弹必打死或打伤一个敌人。敌人仗着人多，中午便更换了进攻部队，攻击也更猛些。但他们一连发起多次进攻，却未能通过小山梁的一个隘路，有竹钉刺脚板，好似触了电，无法前进。跑也不行，爬也不行，哭的哭，喊的喊，倒下去的有的刺破身手，有的刺破肚皮，任凭长官怎样督促，敌人就是无法接近我前沿阵地，象这样的竹钉防线，不只在黄洋界有，在八面山上，在鹿寨底下，也布置了竹钉，以加强防御力量，事实证明，这种防线在井冈山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中是十分有效的。下午4时许，我红军战士们把南昌起义部队留在茨坪修械厂修理的八、二迫击炮抬来了一门，放置在营指挥阵地附近，向敌人发射了三发炮弹，其中一发正落在敌指挥阵地爆炸了。敌人原以为我主力部队不在山上，听见我隆隆的炮声后，又以为我主力部队回到了山上，直吓得魂飞魄散。“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夜间，敌人乘云雾弥漫，我无法下山追击之际，逃之夭夭，溜回到酃县去了，困在宁冈新城之敌，则不敢越雷池一步。此次战斗敌人死伤300余人，而我红军仅伤数人，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

9月26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军主力回到井冈山，当毛泽东得知我井冈山以两连兵力，按照他的指示，坚守井冈山，打退了十倍于我之敌的进攻时，非常高兴，挥笔写下了《西江月·井冈山》这首光辉词章。他在11月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中说：“八月三十日敌湘赣两军各一部乘我军欲归未归之际，攻击井冈山。我守军不足一营，凭险抵抗，将敌击溃，保存了这个根据地。”

我军之所以能够取得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不仅是由于我红军指战员英勇善战，根据地人民大力支援，井冈山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临别时对坚守井冈山作了具体的安排，授予了“空城”退兵之计，正是：黄洋界上炮声隆，以一当十败敌兵。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扩大，特别是1930年七、八月间，红军大规模的集中行动，严重地威胁着国民党在湘鄂赣闽诸省的统治。10月，蒋介石在战胜冯玉祥、阎锡山之后，随即调集重兵，对我红军和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而敌人的主要矛头是对着中央革命根据地。

11月，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以鲁涤平为总指挥，兵分八路，由北向南，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略，对我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第一次“围剿”。

这时，我红一方面军4万人左右，由吉安经峡江向袁河流域推进，正在新余县罗坊、清江县黄土岗一带做群众工作。不久，红军总前委得悉国民党军队已向我根据地发动进攻的消息，总前委书记毛泽东立即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红军反“围剿”的方针问题。会上，毛泽东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和红军历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提出了撒开两手，诱敌深入，待机破敌的作战方针。11月1日，毛泽东和朱德在罗坊园前村红军总司令部，签发了东渡赣江、实行“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消灭之”的命令，具体部署了红军的作战计划。

11月上旬，敌人开始进攻。敌人占领吉安后，即由赣西尾追红军过江，沿赣江和抚水之间地区，自此而南向我根据地进犯。敌人从吉安到建宁，建立了长达800里的弧形围攻线，分东、西两路，西路由鲁涤平的第九路军负责，由张辉瓒担任前线指挥，这是“围剿”的主力；东路由朱绍良的第六军负责。蒋光鼐的第十九路军则由赣江西岸的萍乡方向远道赶来，从永新和万安向泰和推进。

敌人气势汹汹，妄图依靠兵力、武器的绝对优势速战速决，因此急于寻找红军主力作战。但我红一方面军遵照毛泽东制定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方针，就是不与敌人交战，几次使敌人扑空。12月1日，红军主力已全部集结于宁都县的黄歧、小布地区，养精蓄锐，待机破敌。

12月24日，红军总司令部发现敌谭道源五十师于午前11时到达源头、上潮、芦峰岭一线，有继续入侵小布之势，当即由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签发了红字第九号命令，“决定明（二十五）日先歼灭来犯小布之敌”。

为了做好战前的动员工作，第二天，总前委和红军总部在小布举行了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主席台两旁柱子上，挂着一副醒目的对联。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

大步后撤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最后他满怀信心地宣布：由于我们实行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大踏步地进退，敌人已掉进我们布下的天罗地网，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部已经发生了变化，胜利的条件已经具备，胜利就在眼前！

毛泽东那振奋人心的话语，给予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以极大的鼓舞。

会后，红军立即由小布出发，轻装向北运动，在通往源头的道路两旁埋伏下来，“专候”谭道源由芦峰岭下山。

谭道源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谭师进入我根据地后，进展缓慢，一则因为根据地处处坚壁清野，寸步难行；二则谭道源小心翼翼，唯恐被红军歼灭，直到2月26日师部才进驻源头。源头在宁都、永丰两县边界芦峰岭的山腰，夹在庐木峰和牛姑嶺之间，是一条狭长地带，上下山只有一条小道可通，居

高临下，易守难攻，谭道源到了源头，便不敢再向前走了。谭道源师刚到源头，红军就已经在源头通往小布的途中布下埋伏，准备歼灭它。

红军在那里一连等了两天，就是等不到狡猾的谭道源，只得撤回来。有的战士憋不住气，直接找到毛泽东，问他为什么不打就在鼻子底下的敌人。毛泽东耐心地给士解释，说明我们在小布地区布置了一个大口袋，引诱敌人来钻，可是敌人始终不脱离所守的坚固阵地，如果我们硬攻，伤亡代价就很大，现在撤回去，再等机会等等道理。

小布设伏，没能使谭道源的第五十师就范，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却向龙冈逼近了。红军总部当机立断，决定攻打张辉瓒。

夜已经很深了，毛泽东与朱德依然在昏暗的油灯下研究具体作战方案，最后，毛泽东紧握的红铅笔，在作战地图龙冈周围，画上了一个大红圈。于是一个集中兵力、全歼敌人的大歼灭战即将开始了。

张辉瓒率领的十八师，兵员充足，装备精良，战斗力强，曾有“铁军”之称。这次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围剿”，张辉瓒奉蒋介石、鲁涤平之命，负责前线指挥，他决心打几个漂亮仗，以作为自己加官晋级的筹码。

正当张辉瓒率部由永丰向东固方向推进准备同公秉藩师、谭道源师会合攻击东固根据地的时候，由于我红军的主动撤离，公秉藩师已先期占领东固。张辉瓒比公秉藩晚一天到达东固，凌晨浓雾之中，张辉瓒误认公秉藩师为红军，强行攻击，激战4个多小时，互有伤亡。直到午间大雾消散，方知原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干上了。

公秉藩挨了打，认为张辉瓒是妒忌他先占东固，抢了头功，一气之下，折回富田“休整”去了。张辉瓒孤军深入，不得不实行分兵，留下一个旅看守东固作后方阵地，张辉瓒率师部和两个旅9000人马于12月29日到达了龙冈。

红军总部获悉张辉瓒师开抵龙冈的消息后，立即下达攻击龙冈张辉瓒部的命令，命令规定各路红军向龙冈方向攻击前进，乘敌正在运动之时，出其不意地将敌军全部围歼。

龙冈，属永丰县，位于永丰、吉安、兴国三县交界处。四面环山，孤江自南而北穿流其间，形成一个狭窄的冲积盆地，从地形看，和一个“瓮子”差不多。

12月30日拂晓，雾气蒙蒙，红军按照总部的安排，顺利进入预定阵地。

毛泽东和朱德向着海拔430米高的黄竹岭指挥所走去，毛泽东一边走，一边风趣地对朱德说：“总司令，你看，真是天助我也！三国时，诸葛亮借东风大破曹兵。今天，我们借晨雾，全歼顽敌啊！”两人爽朗地笑起来，周围的同志也笑了。

张辉瓒果然按照红军的预料，率师部和两个旅由龙冈向东行进，来钻为他们早已准备好的“口袋”。五十二旅刚走到表湖以东的小别大拱桥时，就遭到担任主攻任务的红三军的迎头痛击。

敌人陷入重围，仍然垂死挣扎，作困兽之斗，仗打得异常激烈，敌五十二旅实在支持不住了，就向张辉瓒告急，张辉瓒派出一个团增援，又被红军截击，死伤大半。张辉瓒见大势已去，急命五十三旅抢占龙冈西南的万功山，掩护师部向东固方向退却。但是，我红十二军抢先占领了万功山，把敌人压在了山下。

下午，第三军团和红四军团的大部分队伍，分别从龙冈西北和东北方向

包抄过来，把张辉瓒紧紧地锁在“口袋”里，形成了关门打狗、瓮中捉鳖的形势。

下午4时许，红军指挥所发出了全面攻击的信号，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从四面八方冲向敌群，顿时，枪声、军号声、喊杀声响成一片，震耳欲聋。红军仅有的一门早先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大炮，这一次大大地派上了用场。

这一仗，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被活捉，他率的师部和两旅人马死的死、伤的伤、俘的俘，9000余人，无一人漏网。

事后，毛泽东曾满怀豪情地写下了他的著名词篇《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峰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

龙冈战斗，是红军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好典型。毛泽东谈到龙冈战斗时曾说过：龙冈战斗打得很理想。反“围剿”的第一仗，就全歼敌人，不漏一兵一卒，这在战争史上也是少见的。

龙冈战斗的胜利。充分地证明了红军从战略防御中改变敌我形势，从防御转为反攻，基本上是靠集中兵力这一着。因为，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是战略上以少胜多，摆脱被动，争取主动，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最好的作战方法。红军反“围剿”，在战略上是处于防御、内线、被“围剿”的不利地位，但是毛泽东通过集中红军的兵力这一着，在战斗中使用了几倍于敌的兵力，便改变了进退、攻守、内外线的形势，在局部地区对被分割的、孤立无援的敌人进行个别的围歼，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蒋介石派了10万兵马来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红军却集中了4万兵力在龙冈围歼了张辉瓒的9000人马。这就叫做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这是“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正是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到指挥作战上，才使得张辉瓒一败涂地。

红军旗开得胜，第一仗就歼灭了所谓的“铁军师”。老奸巨猾的谭道源，听到张辉瓒被活捉的消息，如惊弓之鸟匆匆由源头向宁都县的东韶撤退，企图向东路军靠拢，挽救其所将被歼的命运。

1931年1月2日，红军总司令部在小布颁发了追歼谭道源，进攻东韶之敌的命令，决心要把谭道源师歼灭在东韶这块四面环山、道路狭小的洼地之中。

红军战士发扬了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冒雨勇猛追击。担任诱敌任务的小部队和地方赤卫队截住了谭道源的后卫团，歼敌两个营。第二天，红军主力就追上了谭道源。

1月3日清晨，红十二军在浓雾的掩护下接近敌人，发起了攻击。谭道源刚刚率众退到东韶，未得片刻喘息，就被迫仓猝应战。我第三军团、红三军不久也陆续赶到，几支部队一起对敌人进行猛烈攻击。敌人阵势大乱，官兵竞相溃逃。别看谭道源前进动作不快，逃跑却不慢，一直逃过南城，跑到

了抚州。

这一仗，歼敌两个团。

红军五天内打了两个大胜仗，歼敌一个半师，共 13000 人，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从实践中证明了毛泽东制定的诱敌深入方针的正确性，红军实行诱敌深入，虽然暂时丧失了一些土地，在一部分人家里打烂了一些“坛坛罐罐”，换来的却是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打破了敌人的“围剿”，武装了自己，不但恢复了失地，而且扩大了根据地。

七百里驱十五日 横扫千军如卷席

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并不甘心，1931年2月初，又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去江西，代行总司令职权，重组南昌行营，他从各地搜罗了20万杂牌军，开始了第二次“围剿”；并疯狂叫嚣，要在三个月内消灭红军。

1931年4月1日，敌人以江西的宁都为主要目标，全线发动了进攻。敌人吸取了第一次“围剿”“长驱直入，分进合击”失败的教训，改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紧缩包围”的作战方针。敌人为了防备冒进深入，被红军各个击破，规定部队每天行进5里、10里或20里，而且在大队人行进的前一天，要预先进行侦察。每到一地，马上修筑坚固的工事。

4月中旬，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领导机关从黄歧来到宁都西南面的青塘。在青塘，举行了苏区中央局的扩大会议，讨论了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会上，刚刚到达的王明派遣的代表们认为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红军无法打破“围剿”，提出应采取“分兵退敌”的策略。毛泽东在会上详细地介绍了红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全面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认为红军是能以少胜多，打破第二次“围剿”的。并提出采取“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并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当时，虽然王明路线的代表们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最后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占了上风。

4月19日，毛泽东和朱德在青塘的红军总司令部下达了《战前部队集中的命令》，强调“决心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攻围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消灭敌军”。

王金钰指挥的敌第五路军，4月1日开始分左中右三路进攻，另一部巩固后方，维持交通。4月7日，右路的公秉藩师及王冠英旅侵占富田及固陂圩。这些杂牌军，害怕步张辉瓒的后尘，到了富田和固陂圩就开始大修工事，以免被红军吃掉。

4月23日，红军主力先后到达集中地，为了及时捕捉战机，红军大胆接敌，再向西移动40里，集结于东固。

东固位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前部，在吉安、吉水、兴国、泰和、永丰几个县的交界处，四面群山环抱，地势险要，这里又是著名的老根据地，群众基础很好。

东固、富田两地相距40里，中间隔了一座大山，名叫白云山，山势陡峭，其中，九寸岭、观音崖是富田通向东固的两个必经的险要山隘。

红军3万多人隐伏在东固山上，等了又等，但王金钰和公秉藩硬是不肯出来。总司令何应钦多次督催逼迫，但胆怯而又狡猾的王金钰和公秉藩，用所谓大雨冲垮道路、桥梁等各种借口，死死地蹲在富田和固陂圩坚固设防的阵地里不出来，红军中有些人不耐烦了，要求快打。但毛泽东要求红军继续潜伏待机，一定要等敌人脱离阵地后，在运动中加以歼灭。

红军迫敌而居，在东固山区足足等待了25天之久，敌人终于脱离阵地，象蛇一样爬出洞来了！

尽管王金钰、公秉藩在富田和固陂圩徘徊观望，但是坐镇南昌督战的总司令何应钦却发来一道又一道“金牌”，严令他们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之前，“如期攻下东固，树各路之先声”，否则，就要“取消番号，撤职查办”。

5月15日，红军初建的第一部电台抄收到了公秉藩师部电台与该师驻吉

安留守处电台的通报。从敌台的电报，从红军侦察员、地方群众向红军总部报告的敌军动态，都一致证实了，第二天王金钰的第四十七师王冠英旅和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将分别从富田和固陂圩向东固进发。

敌人终于出动了！事实证明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红军总部的判断和决心是完全正确的。

于是，红军总部立即作出具体作战部署：派红三军为中路军，沿东固通中洞的大道前进，设下埋伏，准备奇袭敌公秉藩师；派红四军、红十二军为右路军，抢占九寸岭和观音崖，迎击敌人第四十七师王冠英旅，另派第三军团为左路军，迂回包抄，直捣敌人的后方阵地富田和固陂圩，端他的老窝，断其归路。

晚上，黄公略正在红三军指挥所里，借着松明的微光，伏在军事地图上研究着行军的路线，他在思考着：敌人将在明天中午之前抢占制高点——将军帽，而我军如何寻找一条捷径，缩短行军时间，先敌到达将军帽呢？

就在这紧要的时刻，毛泽东亲自来到了红三军的指挥所，他和黄公略一起带着警卫员连夜去调查行军路线。经过一位70多岁老农民的指点，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条可以缩短半天行程的小道。

红三军出发后，沿黄土坳、鸡公坳一带山径小道，直向桥头岗、伯佐、中洞穿进。他们以急行军的速度，穿峡谷攀峭壁，终于抢先占了将军帽和接近中洞方向的几个制高点，在当地独立团、赤卫队战士的帮助下，又赶修了工事，严阵以待。

5月16日清晨，毛泽东身着旧灰布军装，肩上斜背着挎包和一把油纸伞；朱德背着竹叶斗笠，手里拿着望远镜，两人健步登上白云山的指挥所。这两位出生入死，同呼吸共命运的革命战友，每逢重大的战斗，总是在离火线不远的地方，亲自指挥作战。

白云山上，白云缭绕，一场关门打狗的战斗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那公秉藩从固陂圩吃过早饭便率领师部直属队出发了。由于山道狭窄，他们只好摆成一字长蛇阵，1000多人的队伍，他们就拉的有五、六里长。

敌军在山间艰难地爬行，隐蔽在白云山上的红三军，正待机破敌。

突然，发动进攻的信号枪声一响，红三军由山上以战斗队形猛冲下来，高山滚石，势不可挡。正在山间行进的敌军，遇到红军如此猛烈的侧击，兵力无法展开，机枪重炮也不能发挥作用，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横七竖八地倒卧山道两旁。那些尚未死伤的官兵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得晕头转向，纷纷惊呼：“红军是从天上飞下来的呀！”

这时，红军在前，独立团、赤卫队在后，不断向敌人冲杀。

死到临头，敌公秉藩仍妄图负隅顽抗。他一面命令特务营组织抵抗，一面命电台发出紧急呼救信号。公秉藩指示位于他前后的两个旅“着率所部轻装跑步前进，支援山坑”，并且向邻近的敌王金钰的第四十七师发出十万火急的求援电报。

但是，公秉藩是枉费心机，敌人苦心经营的富田、固陂圩的堡垒，已全部被第三军团攻占了；敌人囤积于该地的大批粮食、军火等物资，全部被红军缴获了，敌人的后路也完全被切断。而位于公秉藩师部直属队前后的两个旅，也落得同公秉藩一样的可悲下场。

在九寸岭和观音崖，红四军、红十二军同样向敌四十七师的王冠英旅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虽然，敌王冠英旅比红军早到达该地，抢占了两座山头，凭险顽抗。但红四军立即发动强攻，迫击炮集中向糜集山头的敌人猛射，为夺回这两个制高点，红军师长曾士峨和政委罗瑞卿站在火线前沿，指挥作战。罗瑞卿的腮部不幸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伤势很重，但他顽强屹立，继续指挥部队。在红军指挥员英勇果敢的指挥和鼓励下，战士们手执刀枪，向山头冲去，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终于把敌人压了下去，打垮了敌人。

从白云山到富田，红军各路部队在几十里的战线上，展开了歼敌大竞赛。

这一仗，缴枪 5000 多支，机枪 30 多挺，迫击炮 30 多门。同时，还缴获了公秉藩自备的 100 瓦的大电台。从此，红一方面军不但可以在内部用电台联络，而且可以同远在上海的党中央，以及鄂豫皖、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直接通电报了。

打胜了第一仗，红军胜利会师于富田。

王金钰所部郝梦龄师害怕被歼，连夜由藤田逃回永丰县城。为了追歼王金钰第五路军的另一个师——郭华宗的第四十三师，红军总司令部率领大队人马，冒着大雨，由富田穿过圳头，直指水南。

敌郭华宗率部由腋下仓皇逃到水南，一看浮桥被炸过不了河，又从水南逃到白沙，准备天亮后继续逃跑。但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红军击溃郭华宗驻水南的一个团后，5月19日天没亮就追到了白沙。兵分三路，立即发起攻击。郭华宗前临大河，后有追兵，被打得狼狈不堪，红军顺利地歼灭了郭华宗师一部连同逃窜到这儿来的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的残部。缴枪 4000 余支和大量物资同时还缴获了两门 75 山炮和 160 多发炮弹，建立了红军的第一个炮兵团。

位于白沙东侧的是敌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的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

5月20日，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在宁都县的南团，接到南昌行营何应钦来电，奉命驰赴沙溪增援王金钰的第五路军。5月22日，高树勋师在中村被红军紧紧包围。战斗进行了两天一夜，23日上午，红军发起总攻击，高树勋慑于被歼，急忙率领残部狼狈东逃。

红军在中村击溃了高树勋师，势如破竹，日夜不停地向东奔袭。

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和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分别被红军打垮后，东线朱绍良的第六路军更感岌岌可危了。朱绍良为保存实力，除留胡祖钰的第五师守卫广昌外，慌忙率部向南丰撤退。胡祖钰则在广昌城内拼命地加固工事，修筑了一条 5 里多长的土墙，墙外加挖战壕，还修了许多碉堡，妄图坚守广昌。

5月26日，红军追到了广昌，把城团团围住。胡祖钰率领 14 个团的兵力负隅顽抗，作困兽之斗。第二天，红军发动了攻城战，在红军猛烈的炮火轰击和奋勇冲杀下，敌军不得不丢掉外围工事，缩进城内。

这时，毛泽东、朱德到前沿阵地，亲自指挥战斗。他们同军以上干部共同仔细地研究和部署了攻城的方案。考虑到敌军已集中了 14 个团的守城兵力，并且拥有坚固的防守工事，而红军的力量还不足以达到两倍或三倍于敌的绝对优势，一口吃不下这么多敌人，毛泽东决定，一方面集中兵力，采用声势浩大的总攻势逼退敌人；另一方面，网开一面，放一部分敌军逃去，以便迅速夺取广昌城，为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打开通路。

27日傍晚，红军开始总攻。战地上，近 200 挺重机枪和几十门迫击炮齐射，地方武装在煤油桶里点燃爆竹僻啪作响，城外大小山头上前来助战的城

郊农民杀声震天。守城的敌军不知道到底有多少红军攻城，一个个吓得胆颤心惊，师部慌忙向朱绍良发出呼救的急电。

总攻发动以后，红军又悄悄地把广昌东北面的渡桥开放了，给敌军让出了一条逃命的路子。时不多久，敌人象潮水般地向这座桥涌来，桥窄人多，不少人被挤得跌下河去。

后来，红军对残敌展开了政治攻势，晚上9时，红军终于顺利进入广昌城。

广昌战斗获胜后，我红军一部分兵力北上追歼逃敌，毛泽东等人则率领主力部队1万多人向东进入福建，攻打建宁。

建宁是闽赣边界的一个重镇，山地纵横，地势险要，没有大的河川阻隔，行动比较方便，而且这里是闽西北的“鱼米之乡”，我党有良好的群众基础。红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对付敌人新的“围剿”。因此，毛泽东预定第二次反“围剿”的最后一仗，就是打建宁。

驻守建宁的刘和鼎第五十六师，共4个团，约七八千人，装备精良，号称“福建第一师”。当刘和鼎得知广昌城破，红军向建宁进军时，便破坏了通向石城、宁化的木桥，烧毁河里的船只和竹筏，闭城严守。

但是，红军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建宁。5月30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向县城发起攻击。红三军团在大雾中迅速地对各个山头上的守敌进行分割包围，夺取了外围阵地，一直打到了城下。这时，红十二军也迅速从右翼截断敌人通往宁化的道路，占领水南东面山头。经过半天的战斗，红三军团从西门、北门突破缺口，红十二军也从南门突破缺口。敌军被迫涌向东门城楼和大桥，仓皇逃命，刘和鼎从建宁逃到将乐，他手下的七八千人马，连同被红军俘获后释放的在内，总共只剩下了五六百名残兵败将。

从5月16日开始，到5月30日结束，15天中，红军由西向东横扫，走了700里路，五战五捷，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彻底粉碎了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大“围剿”。

事后，毛泽东曾赋词一首，以记其事，即《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七百里横扫敌军，生动地反映了红军打运动战的鲜明特点。这种大步前进，大步后退的运动战，毛泽东用极简单的话概括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运动战，而不打阵地战，这在红军没有扩大兵力，没有弹药补充，每一个根据地打来打去仅有一支红军的条件下，是完全必要的。当然，一切的“走”，又都是为了“打”。走，你就打不着我，打，我就看准了打，集中优势兵力狠狠地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你消

灭。

风云滚滚我谈笑 卅万敌军任我调

蒋介石第二次“围剿”惨遭失败后，仍不死心，再次纠集 30 万重兵，自任总司令，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地进行第三次“围剿”。

但是，红军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采取了“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和“磨盘战术”，大胆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一周之内，连续三战，三战皆捷。敌军始终扑朔迷离，不知我军主力所在。起初，我军巧妙地穿过敌军空隙，大踏步东进以后，敌人依然驱兵向西、向南急进，日夜辗转于兴国以北的崇山峻岭中，直到我军在莲塘、良村、黄坡给了他们一连串沉重打击之后，才恍然大悟，连忙转旗向东，向着我军主力合击过来。

敌军采取大包围态势奔向黄坡地区，其部署是：陈（诚）罗（卓英）挺进纵队 4 万余人，由西北长驱疾进；蒋（光鼎）蔡（廷锴）韩（德勤）挺进纵队 4 万余人，由西南方向逼近；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三师跟踪而进；孙连仲军两万余人由东南，朱绍良的左路军由正北和东北方向猛力进迫。

蒋介石以为使用如此优势大军，分进合击，抓住红军决战，一举消灭之，是毫无问题了。

这样想有他的道理，当时，我军兵力不过 3 万余人，而且刚刚经过二次反“围剿”的大战和莲塘、良村等连续战斗之后，部队尚未得到休整。而敌人的兵力超过红军六七倍，且又经过严密部署，从四面八方包围奔杀过来，气焰十分嚣张。

大敌当前，怎样才能挫败敌人的狂妄企图、达到歼敌的目的呢？多谋善断的毛泽东，沉着地命令部队在山里休息，他和他的战友们一起研讨情况，制定胜利的决策。

部队一休息就是三天，这三天真是不简单啊！了解敌情的同志个个心绪忐忑不安，注视着侦察人员川流不息地来来往往。但是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有毛总政委在这里，一定有办法制服敌人。

红军总部住在杨寨村，连日来，毛总政委、朱总司令、叶剑英总参谋长在总部办公室地图旁研讨军情，听取侦察员汇报敌情，谋划着打败白匪“围剿”的通盘大计。

不平凡的三天即将过去，然而情况愈来愈严重。在总部的军用地图上，蓝色箭头形成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情况正在飞速恶化……

第三天下午，黄公略、罗炳辉等领导同志，都齐集在总部开会，直开到天将黑时，毛泽东宣布会议暂停，并发出了出发的命令。

部队出发了。总部同时也离开杨寨村，向南翻过几座山。部队走了约 20 多里路，来到永丰、宁都、兴国三县交界的地方，毛泽东命令部队停下来，这是一个峡谷的谷底，毛泽东叫传令兵把地图铺在沙滩上，点亮马灯，压着地图纸角，首长们再次围着地图坐下，继续开出发前暂停的会议。经过认真地分析敌情，毛泽东最后决定：十二军向东北方向佯动，吸引敌人的注意，诱敌和调动敌人，将敌人牵走；我军主力通过兴国那个缺口，跳出合围圈子，进到泰和附近，荫蔽休整，以便以逸待劳，歼灭敌人，粉碎“围剿”。同时，又亲自向十二军军长罗炳辉仔细地交代了任务，要十二军一路上扬旗鸣号，大张声势，诱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由此突围，吸引敌人出击，以调动和分散敌人。

十二军在罗炳辉军长和谭震林政委的率领下，穿过敌人空隙之后，一路

浩浩荡荡，向北直插，果然，蠢猪似的敌人跟着来了，我军又怕把敌人甩得太远，便走走停停，保持不即不离状态，紧紧地牵住了敌人的鼻子。

行军逾夜，天色大明，敌人的飞机跟上来了，在十二军行军纵队上空嗡嗡乱转，左歪右斜地向下侦察。

为了更有效地诱惑、麻痹敌人，上级传来了命令：“拉开距离，旗子打开！”于是，部队的距离拉的更长了，一个连拉成一个营的架子；有红旗的展开红旗，无旗的拿出了各种花色包袱皮，高高地摇晃着。走到尘上多的地方，战士们故意象孩子们那样跳跃前进，荡起浓厚的尘土，漫天飞扬。从空中和远处一看，红旗招展，烟尘滚滚，人喊马嘶，气魄浩大，简直不是一支不足万人的队伍，而是一支凡万人的大军！飞机乱转一阵之后，便得意地回去报信。

为了进一步贯彻好毛总政委的指示，红十二军上下一致行动起来，为敌人设下了更多的“圈套”：在我军行经的道路上，每逢岔路口，都用白灰画上箭头，写上“三军团由此前进”，“四军团由此向北”，“……”；一到宿营地，便忙个不停，只要会写字的，就都拿起粉笔号房子，见门就写。围追我主力的敌军全部被十二军牵着鼻子拖了出来，而我主力却安全到达预定地区开始整训。

为了使主力部队能创造更有利的歼敌战机和进一步疲惫敌人，红十二军的行动又作了新的部署：哪座山高就翻那座山，哪里道路险峻就从哪里走。江西到处是绵亘起伏的山岭，山路荆棘棱石遍地。这对于行装笨重、补给困难、又缺乏山地行动素养的大队敌军来说，简直似难耐的酷刑；但对于艰苦奋斗、英勇无畏的红军战士来说，却算不了什么。

十二军拖着敌人经白沙、藤田转到安乐的大、小金竹，离东韶十多里路时，发现敌人后续部队已到东韶，我军仍不进东韶，而在东韶以北十里森林地区埋伏起来；黑夜派出一部兵力奔袭东韶，佯攻敌人。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到达，怕被我消灭，就在当夜仓皇溃逃。我军当即追击敌人，歼灭敌人后尾梯队一部，从容地收复了黄肢、小布根据地。

我军主力经过半个多月的休整，兵强马壮，士气旺盛。敌人已精疲力竭，士气低落，蒋介石下决心撤退了。毛泽东抓住了这个有利时机，向全军发出命令：立即出击！英勇善战的红军，在毛总政委的英明指挥下，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终于以只有敌人六、七分之一兵力的劣势，取得了歼灭敌人、恢复与扩大根据地、壮大红军的全面胜利，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

剿”。

声东击西有主动 四渡赤水出奇兵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此，几乎陷于绝境的红军开始神奇般地恢复活力。四渡赤水就是恢复毛泽东领导地位后的第一个漂亮仗。

1935年1月19日，第一方面军从遵义出发，向川黔边境的赤水前进。当时，红军面临的军事形势十分险恶。蒋介石为阻止我军北进或东出湖南，纠集了其嫡系部队和各路军阀150多个团共约40万人，妄图把红军消灭在川、黔、滇三省交界地区。前面是敌军把守的长江天险，后面是围追而来的敌人重兵，红军能否跳出国民党的重兵包围圈，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大问题。毛泽东胸怀全局，高瞻远瞩，作出科学的决策：灵活机动，避实就虚，避强击弱，声东击西，迷惑敌人，使敌人造成错觉，继而调动敌军，乘隙脱险。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变被动为主动。1月下旬，一方面军进抵赤水河畔的土城，击溃了守敌，又给从北面赶来的敌军以重大杀伤，红军由土城、元厚场一带一渡赤水河。进抵离长江几十里的四川叙永，积极准备渡江，与四方面军会合。由于在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违抗中央命令，自作主张，破坏了统一部署。国民党中央军和各省军阀，集结重兵封锁长江，阻止一方面军入川，同时对红军形成大包围。由于敌情发生了变化，如果继续北上硬攻，将对红军极为不利。毛泽东果断地决定放弃原来的渡江计划，命令部队西进至云南的扎西（即威信）地区，把敌人远远地甩在后面。

红军在扎西地区进行了短期休整，宣传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力量。蒋介石发觉后又急急忙忙调兵遣将，追赶而来。但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出奇不意，乘贵州境内敌人空虚之际，突然又从扎西挥戈东指，2月中旬在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二渡赤水河，再度进入贵州，把敌人远远抛在长江两岸，红军进入贵州后，迅速占领桐梓，直取娄山关。

娄山关雄踞娄山山脉最高峰，是桐梓通遵义的必经关口。地势险峻，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敌人有一个师的兵力把守，妄图凭借天险进行顽抗。但还是被我英勇善战的红军打垮了，一举夺取了娄山关。

红军通过娄山关，直抵遵义城下。从桐梓、娄山关退下来的残兵败将，龟缩在遵义城内。红军一阵猛打猛冲，迅速登城，城内的8个团，被彻底歼灭，红军再次占领遵义城。

红军回师的巨大胜利，大大地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气急败坏的蒋介石急调两个师，杀气腾腾直奔遵义而来。红军再次同敌人展开激战。当时，天下大雨，红三军团和干部团同敌人反复争夺遵义南面的制高点——老鸦山主峰，战斗异常激烈。入夜，红一军团从西侧插入敌人队伍中，霎时号声四起，山鸣谷应，敌人陷入红军的重重包围中，顿时乱作一团，慌忙向南溃退。红军乘胜追击，直达乌江北岸。

这次，红军在遵义地区共歼灭和击溃敌人达两个师又8个团。这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毛泽东的光辉诗篇《忆秦娥·娄山关》，就是这次战役的真实写照。

遵义大捷之后，蒋介石恼羞成怒，亲自到重庆“督剿”。他妄图故伎重演，采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的老办法，用堡垒主义与重兵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压迫红军与遵义、鸭溪地区进之围而歼之。毛泽东洞察其好，将计就计，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诱使更多的敌人前来围集，以利我军摆脱强

敌尾追。蒋介石错误地以为围歼红军的时机已到，于是命令他的军队火速向遵义逼进。为进一步迷惑、调动敌人，毛泽东率红军又突然北进，在茅台一带三渡赤水河，再次进入川南，装着北渡长江的态势。蒋介石扑了一个空，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赶紧调集大军堵截，并在云、贵、川边境大修碉堡工事，构筑封锁线，他的如意算盘仍然是围歼红军。不料，红军并没有渡江北上，待把敌人的兵力吸引到四川南部、贵州北部一带后，毛泽东又指挥红军突然掉头东进，从四川南部重返贵州，在二郎滩、太平渡一带第四次渡过了赤水河，这就把敌人的主力全部抛在后面，使敌人的碉堡完全置于无用。

3月底，红军除留下一支部队在乌江以北地区牵制敌人外，大部分部队迅速渡过乌江，直向贵阳挺进。当时，毛泽东布置了巧妙的阵势：派出一支部队出击瓮安、黄平方向，装作东进湖南，和二、六军团会合的态势；而主力部队迅速向南移动，逼近贵阳城。红军部队打到贵阳城下，吓坏了正在守备空虚的贵阳城督战的蒋介石，他既害怕红军围攻贵阳，又担心红军东去湖南，于是便急调云南军阀部队开进贵州来“保驾”，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队东往余庆、石阡等地布防，以阻红军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合。其实，红军既不要占领贵阳，也不是回师湖南，而是要经过云南迅速西去，渡金沙江北上。因此，毛泽东在布置这次战略行动时讲得很清楚：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蒋介石乖乖地按照毛泽东的指挥行动了。当敌人把兵力调集贵阳附近，云南十分空虚时，毛泽东指挥红军主力，乘虚从贵阳、龙里之间，迅速穿过湘黔公路，甩开敌人，大踏步地由黔南向云南前进了。

四渡赤水，是运动战的光辉典范。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灵活机动，大踏步地前进，大范围地迂回，忽南忽北，声东击西，牵着敌人的鼻子转，迫敌陷于被动，使敌人穷于应付，疲于奔命，而红军的战略意图则得以实现。四渡赤水，是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的充分体现，它在中国战争史上也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瞒天过海实堪夸 神机妙算渡金沙

1935年4月下旬，红军分三路从贵州向云南进军：一路是留在乌江北岸牵制敌人的九军团，他们胜利地完成的任务后进入云南，占领宣威、会泽，渡过了金沙江。另外两路是红军的主力，沿路翻山涉水，攻城拔寨，直逼昆明，云南军阀龙云一下子慌了手脚，因为他的主力部队全部东调增援贵阳，深怕红军乘机抄掉他的老家，他一面向蒋介石呼救求援，一面调动各地民团援救昆明。其实，毛泽东并不真要红军占领昆明，而是为了迷惑敌人，虚晃一枪，突然向西北方向的金沙江急进，准备渡过金沙江，以便摆脱后边的敌人。

金沙江属长江长游，蜿蜒穿流在四川、云南两省边境的深山狭谷之间，江面宽阔，水流湍急，惊涛拍岸，令人胆寒，两岸悬崖峭壁，形势异常险要。红军如果不能迅速过江，就有被敌人压在深谷中歼灭的危险。

这时，蒋介石一面急忙调遣军队增援云南，并亲自赶到昆明督战；一面派飞机在金沙江一线侦察红军的行踪。

红军一军团经武定、元谋，迅速赶到了当时川、滇的主要通道——金沙江边的龙街渡口。但此处因江面宽阔，敌机可以低飞骚扰，不便渡江。但为了迷惑吸引敌人，红军便伪装架桥，摆出一副渡江的架式。果然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将在龙街渡渡江，便集中全力围追，妄图围歼红军于元谋地区。当敌军麇集于昆明、元谋地区时，红军中央军委纵队和三、五军团分两路向禄劝方向的金沙江边急进，军委纵队、干部团抢占绞车渡，三军团抢占洪门渡，五军团殿后掩护。

5月初的一个黄昏，红军先遣队（干部团）火速赶到了金沙江江边的绞车渡渡口。这时渡口的船只已被敌人掳过江去，断绝了江上的交通。但先遣队却发现了敌探过江来侦察情况的小船，敌探不知哪里去了，便立即派两排红军马上乘小船悄悄过江。红军上岸后，两个哨兵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当了俘虏。摸清情况后，红军两个排立即兵分两路：一排往右打国民党的一连正规军，二排往左打保安队。当一排赶到敌人的连部门口时，被敌人的岗哨发现了，刚捉到的俘虏按照红军的事先嘱咐作了回答。哨兵还没有问第二句话，战士们赶上前去，捉住敌哨的喉咙，冲进敌人的住院，踢开了房门，躺在地上的吸大烟的敌军还以为是兄弟部队发生了误会，当得知是红军“从天而降”时，一个个胆颤心惊，乖乖地做了俘虏。

当二排赶到保安队的驻地时，敌人正在打麻将，抽大烟。红军和船工机智地装着缴税的人骗他们开门。这些唯利是图的家伙听到有利可捞，马上出来开门。红军冲进去，把几十个保安队员全部捉住了。

红军迅速控制了绞车渡两岸的渡口，并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在渡口附近找到了七条小船，红军便从这里陆续渡江。

毛泽东、周恩来亲自领导和组织了红军的渡江行动。毛泽东过江后，就在渡口边的一个潮湿的山洞里，日夜指挥着大队人马迅速过江。周恩来是渡江总指挥，他不仅协助毛泽东制定红军进军、渡江的路线，并亲自派遣突击队，抢占绞车渡渡口。当突击队过江后，他又派出一支部队沿金沙江北岸西进，迅速到达龙街渡口，阻击沿昆明经川康大道向北追击的敌人，掩护大部队过江，同时下令让一军团火速赶到绞车渡渡江。

绞车渡渡口，因为船少水急，红军渡江昼夜不停。夜晚，两岸燃起照明的熊熊火光，把江面映得通红。红军就靠这七条小船，经七天七夜，全部安

全地渡过了金沙江，过江后，便把江边的渡船全部烧毁。

当敌人赶到江边时，红军已经无影无踪了。金沙江滔滔东去，奔流不息，敌人只有望江兴叹，无可奈何！

从此，红军跳出了几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是红军在毛泽东的英明指挥下，转危为安，变被动为主动，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

古人的兵书上“三十六计”第一套胜战计中的第一计就是“瞒天过海”计。可以说，毛泽东率红军渡江中巧妙地运用了这一策略，佯装从龙街渡江，以此吸引敌人，实则赶向了绞车渡。正是：瞒天过海实堪夸，神机妙算渡金沙。

双管齐下兵分路 大渡河上争强渡

红军通过大凉山彝族区后，继续向大渡河挺进。

安顺场是大渡河南岸的一个渡口，两边都是险峻的高山，部队在这深山沟中，没有回旋的余地，极易被敌人伏击歼灭。太平天国石达开所率全军，就是在这个渡口被清兵消灭的。

当时，蒋介石一面下令薛岳、周浑元等反动军队继续围迫红军；一面下令四川军阀在大渡河沿岸修筑碉堡，布置防线，阻止红军渡河。蒋介石任命四川军阀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并要他效法清代在大渡河边生擒石达开的四川总督骆秉章。

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毛泽东指出，敌人的好梦是做不成的，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能走通。我们共产党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大渡河算不得什么困难！毛泽东的话，给了红军指战员极大的鼓舞和力量。

红军先遣队冒着蒙蒙细雨在夜间火速赶到了安顺场。安顺场住有近百户人家，早有敌人在这里“等候”红军的到来，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来的这般神速，当先遣队到达时，敌人屋里还亮着灯光，隐约传出胡琴声和唱戏声。乘敌人毫无准备，红军很快地消灭了他们。

先遣队控制了安顺场渡口，积极准备渡河。但河边的船只已被敌人掳到河北岸去了，南岸边只留有一只作交通用的小船。红军从敌人手里得了这只小船，并找来了渡河的船工，决定进行强渡。次日上午，由17名勇士组成的渡河奋勇队，在连长率领和南岸我军强大火力的掩护下，乘一条小船，随着汹涌的波涛颠簸前进。北岸敌人对我渡船展开了猛烈的射击，子弹在船周围激起一串串浪花。但载着我勇士的小船依然劈涛斩浪迎着弹雨前进，小船一靠对岸，17名勇士便立即登岸，向敌发动猛攻，很快打垮了敌人，控制了渡口的工事；小船又迅速返回南岸，继续运载红军过河，过河的勇士们猛撵敌人；敌人军心已乱，全部溃败。红军迅速占领了北岸渡口，乘胜追击，并在渡口下游缴获两个船。但仅靠找得的几条小船，要很快渡过全部红军是很困难的，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央军委立即决定，红军一师继续渡河，沿左岸北上；主力沿右岸北上，直奔距安顺场320里的泸定桥，以夺取泸定桥，然后通过大渡河与第一师胜利会合。

红军分左、右两路向泸定桥急进，5月27日，左路军先遣队自安顺场出发，翻山越岭，且战且走，第二天，突然接到军委命令，要他们在29日夺下泸定桥，时间只有一天，路程却有240里，沿路不但有高山深谷，且有敌人阻拦，应当说，任务相当艰巨。为什么非要在29日夺下泸定桥？这是因为两旅敌人正在向泸定桥增援，如果比敌人到的迟了，红军渡河就更加困难。

赢得时间就是胜利。必须同敌人争分夺秒。红军立即加快赶路的速度。一路上，打垮了凭险据守的敌人，修好了被敌人破坏的桥梁。夜幕逐渐降临，最后变得伸手不见五指，这时又偏偏下起雨来。英勇的红军战士发扬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冒雨急行军，突然，对岸山坳上亮出一长串火光，这才发现增援泸定桥的敌人，正在点起火把赶路。

摸黑赶路速度慢。于是，红军先遣队也点起火把前进。一点起火把，对岸敌人立即问话；红军回话时，巧妙地冒充是国民党的被红军打垮的队伍，敌人信以为真，糊里糊涂地同红军走了几十里。后来，雨越下越大，敌人经不起狂风暴雨的袭击停下来宿营了。这时红军先遣队一看正是大好时机，为了早到目的地，哪怕风吹雨打，道路泥泞，沿着高山急流的曲径险途，继续

向泸定桥急进。

一夜急行军，我左路军先遣队终于在拂晓抢先赶到了泸定桥，占领了桥西头。

大渡河上的泸定桥，是四川通康藏地区的咽喉。桥是用13根悬在空中的铁索联成的，两边各有两根铁索做桥栏，底下并排9根铁索，铁索上横铺木板做为桥面，桥头石碑上刻有诗句：“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桥下激流奔腾，震耳欲聋。浊流从上游山峡间如瀑布倾泄而下，冲击着河底参差耸立的礁石，激起无数的巨浪和旋涡。

桥对岸泸定城里驻着两个团敌军，桥头早已筑好了防御工事，并把铁索上的桥板全部抽去。敌人以为有此天险，万无一失，气焰十分嚣张。

为了迅速夺下这座桥，红军先遣队一到桥边便立即进行了战斗动员。战士们个个争先恐后，抢做夺桥的先锋。后来挑选了22名战士组成突击队，另有一个连携带木板，随后铺路修桥，下午，夺桥的激烈战斗打响了！

激越的冲锋号一响，红军22名突击勇士身背马刀，手持短枪，腰扎手榴弹，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攀缘铁索向对岸猛冲过去。霎时间，军号声，枪炮声，呐喊声，汇成一片，震天动地。红军勇士们扶栏突进，勇往直前。河水在脚下咆哮，子弹头顶乱飞，他们全然不顾，心中只有一个目标：杀过河去，夺下铁索桥！正当勇士们冲到对岸桥头的关键时刻，忽然东桥头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原来敌人放火焚烧了桥头的亭子，妄图用烈火阻止勇士的前进，西桥头战友们的口号声给了勇士们有力的支援。勇士们个个发扬了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大无畏英雄气概，立即向浓烟烈火中猛冲过去，他们的衣帽着火了；他们继续前进，他们的眉发烧焦了，顾不得停一停。他们这种排山倒海、压倒一切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终于威慑、制服了敌人，胜利地占领了东桥头，打垮了守敌，一直冲到街上，同敌人展开巷战。敌人妄想反扑，这时红军增援部队已经过河，经过一番激战，敌人大部被歼，残敌抱头逃窜。我左路军胜利地控制了泸定桥，过河后和右路军取得了会合。

这样，红军主力便从泸定桥源源不绝地渡过了天险大渡河。

军事上有句话叫兵贵神速，红军勇士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英雄壮举，再一次证明，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的英明指挥下，完全能够战胜千难万险，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

狭路相逢勇者胜 突破天险腊子口

1935年9月中旬，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渡过了水流湍急的白龙江，通过残缺而危险的栈道，到达了岷山脚下的腊子口。

腊子口是岷山山脉的一个重要隘口，是四川进入甘肃的天险门户。两座高山夹着一道山沟，山沟宽约30多米，两边是悬崖峭壁；山沟两峰之间，有一条水深流急的石沙河，河上横架着一座木桥，把两山连在一起。这座桥是过腊子口的必经之地。

常言说：“走过腊子口，象过老虎口。”甘肃军阀鲁大昌在这里驻有重兵把守。桥周围筑有许多坚固的工事，形成了纵横交叉的火力封锁网。敌人妄图凭借天险和重兵来阻挡红军的去路。从当时情况看，左右两边都有敌人的重兵，一边是胡宗南的主力部队，一边是杨士司的两万骑

兵，红军要迅速实现北上抗日的目的，别无他途，只有通过腊子口这一条路。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经过研究后，决定夺取腊子口。先遣队接受了夺取腊子口的战斗任务。

入夜，夺桥战斗打响了！红六连30多名勇士，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向敌人展开了正面猛攻。子弹象雨点般倾泻在敌人的阵地上，但狡猾的敌人龟缩在工事里一动不动，等我火力一停，勇士们开始向桥头冲锋时，敌人的手榴弹象雹子般扔了过来，由于敌人凭险顽抗，我方地形不利，连续几次冲锋，都未能奏效。

为了压倒敌人的火力，红军便进一步加强了攻击。轻重机枪象暴雨似地轰鸣，喷射出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但敌人一束束的手榴弹仍然不停地在我勇士突击的道路上爆炸，使我勇士难以前进。

毛泽东对突击队的战斗情况和力量配置十分关心，多次派人到前沿阵地了解情况。

红军虽然向敌人发动了多次猛攻，但一直没能接近桥头。后来部队决定让战士们暂时撤下来休息，准备再攻。

配合六连正面进攻的一、二连，在团长率领下，准备从腊子口右侧，包抄敌人的后路。但腊子口右侧的石壁非常陡峭，难以攀登。有位勇士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克服绝大困难，终于攀登了上去，然后用绑带当绳子，将战士们一个个腾空吊起来。

撤下来休息的红六连，在战地召开了党团员大会，组织了敢死队。挑选了15名勇士，编成了突击小组，准备分两路向桥下集结，突击敌人：第一路从桥底攀桥柱运动到桥对岸袭击桥上敌人；另一路则在桥这边会同第一路，对桥上敌人实行两面夹击。

一场新的战斗又悄悄开始了。第一路战士，趁天黑慢慢地摸到桥下，再攀桥柱向对岸运动；途中因有人不慎掉下水，暴露了目标，敌人顿时向桥下猛烈射击，战士们无法前进，只得摸到一块岩石背后躲着，待机行动。另一路战士，在连长率领下，趁敌人往桥下扫射的时候，迅速冲到桥边，向敌人摔过去一排手榴弹；接着，冲进了敌人筑在桥上的工事，猛袭敌人，敌人没料到这一着，顿时乱作一团。躲在桥下岩石背后的战士，也纵身跃上桥面，拔出大刀，同桥上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右翼一、二连战士迂回也取得成功，冲锋号起，顿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炮声和呐喊声。

敌人被红军杀得晕头转向，以为自己已被红军四面包围，于是甩下枪支

没命地逃窜，勇士们胜利地占领了腊子口。部分残敌直向岷州方向败退，我红军部队乘胜追击，使得敌人狼狈不堪。

“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红军顺利攻占天险腊子口，就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所率领的军队完全是一支英勇顽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军队。

伤十不如断一指 直罗全歼先头师

1935年11月下旬，陕北已进入了寒冬。红十五军团在“打胜仗迎接中央红军”的口号下，一鼓作气，攻下了张村驿，打开了东村，接着扫清了附近的两个小据点。战斗结束后，毛泽东率中央红军来到了东村一带。从此，红十五军团与中央红军会师了。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消灭红军计划的破产，预示着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为了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放在大西北，毛泽东一到陕北，即首先拟定了一个大的歼灭战计划，这就是直罗镇战役。

陕北的战局当时是这样：陕北红军取得劳山榆林桥胜利后，敌人以5个师的兵力组织新的进攻，东边：个师沿洛川、邠县（今富县）大道北上；西边4个师由甘肃的庆阳、合水沿葫芦河向陕北邠县方面前进。为粉碎敌人的进攻，毛泽东决定集中会师陕北的红军，在直罗镇一带，给敌人一个迎头痛击。并要求认真察看地形，再作具体的布置。

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团以上干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前往直罗镇去看地形。大家首先登上了直罗镇西南面的一座高山。举目望去，直罗镇尽收眼底。它是个不过百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从西而来的大道，象一条白色的带子铺向镇子的中央，穿镇而过。镇子东头，有座古老的小寨，里面的房屋虽然倒塌，石头砌的寨墙却大部完好；镇子北半面，是一条流速缓慢而平静的小河。大家举着望远镜，从左到右，从东到西，细心地观察着道路、山头、村庄和河流。大家边走边观察，边观察边研究，从一个山头，转移到另一个山头，结论得出了：把敌人放进直罗镇，再消灭它。为了防止敌人利用镇东头的寨子作固守的据点，大家商讨后，决定把它预先拆掉。当天晚上，红十五军团派出一个营，连夜去拆那个小寨子。这时战斗命令虽然还没有下达，但战士们凭着自己的经验会猜测到，将会在这里打仗，同时坚信：有毛泽东同志亲自坐镇指挥，肯定能打个“瓮中捉鳖”的漂亮仗！

为了迎接这个大胜利，打好会师第一仗，红十五军团除留一个排在直罗镇警戒外，主力集结在张村驿一带，养精蓄锐，积极地投入了战前准备工作。各级干部层层深入，具体进行战斗组织。

红军情绪高涨，以逸待劳。一切准备就绪后，第三天下午，敌一 九师师长牛元峰带着部队在6架飞机掩护下，果然来到了直罗镇。

晚上，毛泽东下达了命令。按照已经确定的部署，中央红军从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连夜急行军，在拂晓前包围了直罗镇。毛泽东、周恩来亲临前线指挥。毛泽东的指挥所设立在距直罗镇不远的—个山坡上。战斗打响之前，毛泽东就特别指示各部队负责同志，一定要打歼灭战，战斗发起后，又一再嘱咐说：“要的是歼灭战！”

天刚亮，两路红军象两只铁拳，从直罗镇南北高山上砸了下去。敌人虽有防备，却没想到我军会如此迅速，及至发觉被包围后，直罗镇两边的山岭已被我军占领。南面—响枪，敌人立即向北撤，北边—响枪，他们又反过来向南扑。— 九师被夹击在两山之中—条川里。山谷中到处是枪声、喊杀声。— 九师是东北军的部队，是红军的老“运输队”了。有不少的士兵和军官曾经做过红军的俘虏，有的还不止交过—次枪，在我军猛攻之下，纷纷瓦解，交枪投降。—些拼命顽抗的，丧身于刀枪之下。

战斗不到两个小时，红军两路合攻，占领了敌人的师部所在地直罗镇。最后牛元峰逃到镇东头的小寨里，指挥着—个多营负隅顽抗，死不投降。

这个小寨虽被我军事先拆毁，但敌人昨天下午到达后又连夜改修，加上地形复杂，易守不易攻。我们的一支小部队攻了一次，没能打上去。正组织第二次猛攻时，周恩来同其他领导从山上走下来。周恩来和干部们——握手，详细地询问了第一次攻击的情况。最后周恩来指示：敌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不好攻暂且围着算了。寨子里既没粮，又没水，他们总是要逃跑的，争取在运动中消灭他们。

枪声渐渐地平息下来。两边的山坡上，镇子里，到处堆积着缴获的枪支弹药，到处聚集着俘虏兵。胜利的喜悦，洋溢在每个红军战士心里。

— 九师师长牛元峰，蹲在寨子里，一个电报接一个电报，要求董英斌解围。他哪里知道，董英斌派的一六师还没到直罗镇，就被红军击溃了，并且在黑水寺被红军歼灭了一个整团。

晚上，牛元峰待援无望，趁黑夜率领残部突围向西逃跑，红军七十五师的战士，随即跟踪追击。一气追了25里，追到直罗镇西南一个山上，牛元峰率领的残部一个多营最后覆灭了，牛元峰也当了俘虏。

— 九师全师和一六师的一个团的覆灭，彻底打乱了敌人进攻陕北的部署，迫使得敌人一八师、一一一师不得不退回了甘肃境内；东路侵入杨泉源的一一七师也退出了郿县。陕北根据地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直罗镇战役，又一次证明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与正确。

平汉线上败敌兵 釜底抽薪战火停

自 1945 年 10 月 21 日开始，至 11 月 2 日胜利结束

的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是在毛泽东的部署和指导下，由率领晋冀鲁豫人民解放军的刘伯承、邓小平具体组织指挥，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军为反击国民党军队进犯解放区，举行的一次大规模歼灭战。该战役俘敌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以下 2.3 万余人，争取了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领该军与河北民军万余人战场起义，粉碎了敌军沿平汉路对解放区的进攻，从政治上和军事上给了蒋介石以有力的揭露和重大打击，迫使他不得不签订停战协定。

战役开始前的形势是这样：

1945 年 9 月 2 日，日本侵略者正式投降，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浇的蒋介石，却急急忙忙“下山”来要抢夺抗日战争的“桃子”，悍然对我解放区发动进攻。对于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我党采取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即巩固华北、争取东北、坚持华中）的方针。9 月 10 日至 10 月 12 日，我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上党地区粉碎了敌人的进犯，歼敌 3.5 万余人，有力地配合了我党与国民党的谈判，促进了“双十协定”的签订。但蒋介石签订“双十协定”不过是一个骗局，协定墨迹未干。他就一面密令所属“努力进剿”，一面将部分军队从空中和海上运送至华北等地，并且令其全力加紧从陆路推进，首要目标是抢占平津，夺取东北。在国民党向北推进的各路大军中，第十一战区孙连仲所部的第三十军、四十军和新编第八军共 4.5 万余人，在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兼四十军军长）和高树勋（兼新八军军长）率领下，从新乡沿平汉路北犯，并有第三十二军和伪军孙殿英所部跟进，其后续部队 4 个军，有的已进至新乡，有的正准备向那里开进。

为粉碎敌人的进犯，把好华北大门，确保我军在东北的战略展开，毛泽东决定由晋冀鲁豫军区以一部兵力截击沿同蒲路北犯之敌，并集中主要兵力歼击沿平汉路北犯之敌。

毛泽东在部署这次战役时，先后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和晋冀鲁豫中央局，说明“山东、华中主力转移至冀热辽区及东北，至快还须一月；各部到达后，布置战场，熟悉地形，初步完成准备，至快亦需两月至三月。因此，我们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并且强调指出：“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他还对这次战役的任务区分和兵力使用作了具体指示。

我晋冀鲁豫军区根据赋予的作战任务，对敌我情况和有利不利条件作了深入的分析，按照毛泽东关于“我太行及冀鲁豫区可集中六万以上主力，由刘邓亲自统一指挥，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务期歼灭其一部至大部”的指示，决心集中第一、二、三纵队以及太行、冀南、冀鲁豫 3 个军区的主力共 6 万人，并动员 10 万民兵和群众参战，准备在两个月的时间内，连续作战，歼灭沿平汉路北犯之敌。

为便于集中力量从东西两面对敌人实施钳击，我将第一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编为路东军；将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和太行军区、冀南军区部队编为路西军。另将大行军区一部组成独立支队，结合太行、冀鲁豫地方武装和民兵，先在黄河以北至安阳之间，采取各种方式滞敌前进，以争取时间掩护我主力从上党和冀鲁豫等地向平汉线集中，并迫使敌人留置大量兵力于安阳以

南的铁路沿线，减少其北进力量；等敌人通过漳河后，即以独立支队控制漳河渡口，阻止其后续梯队的增援，其余地方武装和民兵则继续钳制安阳以南的敌人。

整个战役共经历了阻击、合围、总攻、追歼四个阶段。

敌人的第一梯队3个军从新乡北犯后，求胜心切，沿途虽然遭到我独立支队、地方武装和民兵的不断袭扰打击，但由于没有与我主力接触，前进仍然比较快。10月20

日，其先头部队已进占漳河边的岳镇、丰乐镇等桥头阵地，掩护架桥。为了保障我参战主力的集中，滞敌前进，我先行赶到临漳、南东方村地区的路东军的第一纵队于21

日夜以一部奔袭敌人的先头部队，因被敌人发觉过早，在给他们一定杀伤后便撤出战斗。22日，敌人第一梯队的3个军分左、中、右三路开始北渡漳河，并以一部占领磁县，一部向南东方村进攻，主力则沿着铁路东侧前进，我第一纵队为不让敌人进入邯郸，以便尔后我主力在野战中予以歼击，除留下一个团在临漳以北地区阻敌外，主力赶到邯郸以南至东西向阳以北地区组织防御，坚决扼阻敌人。23日上午，敌人的先头部队在我工事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向我第一纵队的第一旅阵地展开攻击，我第一旅广大指战员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疲劳的精神，一边战斗，一边加强工事，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24日，敌第三十、四十军和新八军全部渡过漳河，倾注全力北犯。第四十军的第一六师等部，在密集炮火掩护下，向我第一旅阵地反复攻击竟日。我守军顽强抗击，以短促火力结合反冲击，打退敌人多次攻击。激战到黄昏时分，敌人用集中攻点的方式突入我阵地，但他们哪里知道，我参战部队已经大部赶到，对其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我第一纵队胜利地完成了将敌钳制在预定战场和掩护我军主力集结的任务。

我军主力到达后，便立即出击。但由于部队刚到，准备仓猝，当夜战果不大。25日夜，第二纵队全部到齐，再次出击，但由于敌人依据稠密的平原村落作掩护，并利用村落周围的树木设置鹿砦障碍，结合暗堡的火力封锁，使我进攻的效果仍然不理想。但这时敌人已被我四面包围，进退两难，在这种形势下，从新乡北进时就曾派人与我联系的敌新八军，更加动摇消极。26日，胡宗南的第十六军和孙连仲的第三十二军分别从石家庄和安阳南、北两个方向进行增援。

为了保证集中主力歼灭被围之敌，对于石家庄南下之敌，我增调太行军区一部在晋察冀军区一部协助下进行阻击，同时加强漳河阻援阵地；对于安阳北上之敌，我令太行、冀鲁豫两军区抽调中心区的游击队和民兵在安阳周围，开展游击活动进行牵制。对当面被围之敌，在其阵势未乱，兵力损耗不大，以及我后续部队到达之前，暂不与之决战，只以部分兵力利用夜间逼近敌阵，采取逐点割歼和渗入袭击等打法削弱和疲惫敌人。对敌新八军，又打又拉，促其反正。我军主力则养精蓄锐，进行战场练兵，研究战法，等后续部队到达后再对敌人发起总攻。对此，10月27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部署甚当。俟后续到齐，养精蓄锐，那时敌必饥疲，弱点暴露，我集中主力寻求弱点，歼灭其一两个师，敌气必挫。”又说，“石家庄、新乡两处之顽共八个师，你们当面之顽共六个师，总计不过十四个师。在你们歼当面之顽一两个师，可能引起南北增援，你们须准备在连续多次战斗中总共歼灭四五个师，即能转变局势。”

10月28日，我后续部队全部到齐，各项准备工作也已就绪，于是便决定当日黄昏对被围之敌发起总攻。在总攻前，我将围敌部队改为北、南两集团，北集团作为总攻的突击队，狠打敌四十军，并以西北和东南两面对打，重点是割歼已遭我打击、突出于其阵地北端的敌一六师。南集团钳制敌第三十军和佯攻敌新八军。同时，加紧对新八军的政治争取，由参谋长李达前往该军与高树勋进行谈判。我军发起总攻后，战至30日，先后攻克村镇20余处，敌第四十军的第一六师大部被歼，第三十军也遭到我沉重打击。这时，敌人的南北援兵分别被我阻隔于漳河以南和高邑附近。为了坚决歼灭被围之敌，然后歼灭援敌，毛泽东又急电赵尔陆：“率六个主力团南进，协同太行部队歼灭由石家庄南进之十六军。”在我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下，高树勋率领其新八军和河北民军万余人在马头镇起义。援军被阻和高部起义，对敌震动很大，使敌人失去战斗信心。

31日早晨，敌人的主力开始向南突围。由于我军预先估计到这一点，于是便有意让开了一条退路，在他们脱离阵地后，我便从东西两面多路出击，并以一部前出至漳河北岸进行兜击，以大量民兵密布各个交通要道捕歼逃敌。当日下午，马法五率领残部近两万人窜至南北旗杆樟、辛庄、马营一带企图据村顽抗。我当即集中优势兵力对其进行猛烈攻击。11月1日，我突入马法五的长官部，敌人失去指挥，顿时大乱，四散奔逃。我南北集团立即奋起围追堵截溃败之敌，11月2日，向南突围之敌，除少数漏网外，大部被我歼灭。南北援敌也闻风而退。

11月2日，毛泽东、朱德向率军起义的高树勋发去贺电。电文是：建侯将军吾兄勋鉴：闻吾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士，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戎绥。

无论在什么时候，军事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在抗日战争胜利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进犯解放区，燃起内战的战火，要实现和平，挫败国民党的猖狂进攻，在军事上给其重大打击，就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此，毛泽东强调：“这个战役的胜利，关系全局极为重大。”并亲自部署和指挥了这次战役。我军的重大胜利，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同意签订停战协定。正是：平汉线上败敌兵，釜底抽薪战火停。

大敌压境疑无路 以弱胜强又一村

1946年9月3日至7日，我军进行了以歼敌整编第三师为主要目标的定陶战役，取得歼敌1.7万余人，活捉中将师长赵锡田的巨大胜利。这是在毛泽东直接部署和指导下，由刘伯承和邓小平负责指挥的一次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

1946年8月，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为了策应中原突围，配合苏中作战，突然向陇海路出击，一连打下了10余座重镇，攻入开封，共歼敌1.6万多人，控制了开封到徐州间的铁路300余里。这拦腰一刀，砍乱了国民党在南线的作战计划，于是，蒋介石便集中了14个整编师共32个旅约30万人马，由白崇禧、陈诚在开封坐镇指挥，刘峙亲临前线督战，于8月28日向我晋冀鲁豫解放区杀气腾腾地扑来。局势是十分严重的。敌人象把张开的大钳子，正向我军合拢，东路徐州绥署的5个多旅自砀山、虞城一线向单县、成武、丰县、鱼台地区进攻；西线郑州绥署的10个旅自封丘、开封、商丘一线向东明、定陶、曹县地区进攻。此外，在豫北的安阳等地区，还有大量的敌人配合作战。敌人的如意算盘十分明确，企图以三倍于我的优势兵力，乘我陇海作战后疲惫的时机，将我钳夹歼灭于陇海路以北、老黄河以南的狭窄地区。

“兵来将挡，水来上掩”的军事原则为一般军事家所熟知，但究竟如何“挡”如何“掩”却往往由于军事指挥员军事艺术水平不同而使战争结果相差甚远，在敌人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毛泽东电示晋冀鲁豫野战军集中陇海路北休整，诱敌深入，寻机歼灭，并指出对进攻的敌人，不打无把握之仗，打则必胜，必须以三倍、四倍甚至五倍、六倍的优势兵力，先歼敌一部，再歼另一部，各个击破。

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一面指示部队抓紧作战间隙休整，一面准备再战。他们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敌情，认为东路敌军是蒋介石嫡系部队，装备好，战斗力强，而西路5个整编师中，只有整编三师是蒋嫡系部队，其余都是杂牌部队，如把整编三师诱到预定战场再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歼，敌人内部派系矛盾很深，其他杂牌部队不会积极支援，这时强敌变成弱敌，就好打了，整编三师一旦被歼，西路敌人必将震惊溃败：继而使敌人整个计划落空。于是便决定先打敌人的整编三师。

我军担任诱敌任务的是第六纵队，他们象磁石一样紧紧地吸住敌人，使敌人一步步迈向灭亡的深渊。但愚蠢的敌人对于勒在他们脖子越来越紧的绞锁却毫无察觉，只是一次又一次地频频报“捷”。蒋介石的“嘉奖”电报接二连三地从南京发来，陈诚、范汉杰、刘峙等也都飞临前线督战。

敌整编三师师长赵锡田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似乎看到了军长的宝座在向他招手，他决心施展“雄才大略”，干一番“辉煌的业绩”。他驱其全部兵力，向北猛进。正当他蒙头转向往我军布好的口袋里钻的时候，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又及时告诫前线将士：要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要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必须集中三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将敌整旅、整师干净全部地加以歼灭。刘、邓首长一面利用行军和作战的间隙，组织干部进行学习，使大家明确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指导原则；一面迅速对孤军深入的整编三师布下了天罗地网。

9月5日，敌整编三师已全部进入我预定战场，师部进至天爷庙，主力二十旅进至大、小杨湖，三旅进至周集。原来和敌整编三师并肩前进的敌整编四十六师，被拦阻在40里以外的曹县以南地区，这时，我二、六纵队为右

集团，三，七纵队为左集团，向敌人展开分割包围作战。敌整编三师已陷入我重重包围之中。

当日下午，刘们承来到六纵队司令部，召集纵队负责人会议，布置战斗。他要求当夜发起总攻，并提出用中刀杀鸡的办法，集中六纵全部兵力，先歼驻在大杨湖的敌二十九旅五十九团，五十九团是整编三师主力的主力，人多，装备好。歼灭了这个强中之强的五十九团，就会使整编三师惊慌失措，士气动摇。这样的打法，完全符合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对这次战役的部署要求，会收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进而把处于孤立状态的敌整编三师全部吃掉。六纵首长当即决定：由十八旅和十七旅四十九团担任主攻，十六旅和十七旅的一个团（另一个团在北面掩护十八旅主攻）配置在大杨湖东北4公里的大张集、范庄一线为预备队。

我军在天黑之后分头向前运动，五十二团从村东北进攻，四十九团由村东南攻击。五十四团任务最艰巨，他们迂回到敌人后面西南方向发起攻击。而他们的西面就是敌整编三师师部，战斗发起后，可能会受到敌人的夹击。五十三团两个营在他们南面，准备打援和掩护他们翼侧的安全。

我向大杨湖之敌的攻击是9月5日夜11时30分开始的。进攻信号一发，枪弹、炮弹象一阵狂风暴雨压向大杨湖，攻击部队乘势冲向敌阵，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搏斗。经过激战，五十四团首先从村西南攻进了村子，占领了两座院子；五十二团、四十九团也相继从东北、东南攻入，夺占了几间房子。

敌人的整编三师五十九团虽然战斗前由于受到我军的连日阻击，部队疲劳，伤亡也较大，但它毕竟是敌军中的强中之强。我部队一进攻便遭到敌人疯狂的火力阻击。战士们前仆后继，十分英勇，却仍然进攻受阻，五十二、四十九团都未进入敌人纵深阵地。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敌人反扑出来，再要进攻，困难就会更大，二梯队也将无法投入。在这种情况下，我已攻入村子的部队一部分连续向敌人进攻，以攻代守，阻止敌人反扑，掩护另一部分构筑工事，掩护二梯队火速进入战斗。这样，他们便稳住了阵脚，为后续部队创造了有利的进攻条件。

五十四团的情况最为紧张。他们攻入村子，夺下两座院子以后，敌人便开始了猛烈的反扑，敌人迅速从四面调集了大批兵力，一齐向我夺下的两座院子集中开火，争夺异常激烈。全体指战员英勇顽强，浴血奋战。七连长紧靠在一堵墙边，拼命堵住企图冲出的敌人，一口气扔出了100多个手榴弹，英勇地战斗到最后一息。机枪手有的牺牲了，有的负伤了，三营教导员抱起机枪就打。团长、政委、参谋长等，和团部所有人员都投入了战斗。正在我五十四团与敌人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敌人的3辆坦克从整编三师师部张牙舞爪地冲了过来，企图援助大杨湖的敌人，坦克冲到我团指挥所旁边时，团主任就抓起两颗手榴弹首先向坦克扑去，警卫员、电话员、通信员等13个同志也随后跟了上去。在他们的英勇反击下。敌人坦克两边的步兵，有的被打死，有的逃跑。坦克见步兵溃逃了，慌慌张张地打了一阵炮，也逃了回去。但战斗依然在激烈地进行，我五十四团伤亡越来越大，在这危急的关头，南面的五十三团按照旅首长的命令，除留下一个排监视敌人外，其余部队飞跑前往支援五十四团，这样，便扭转了五十四团危急的局面。

担任主攻任务的十八旅已把作为旅预备队的最后一个营投入作战，但整个战斗仍迟迟不决。

当纵队负责人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即决定把纵队的第二梯队3个团立即

投入战斗，以求在拂晓前全歼敌人。五十四团那个重要方向增加了两个团，经过一阵激战，形势很快急转直下。

经过一夜血战，6日拂晓，大杨湖的敌整编三师主力五十九团被歼灭了。赵锡田见他的师部暴露在我军直接攻击之下，慌忙调整部署，并企图南逃与敌整编四十六师靠拢。敌人一离开工事，我各纵队立即乘机追歼，一时广阔的田野上人喊马嘶，杀声震天。当天下午，敌二十旅、三十旅及整编三师师部，就全部在运动中被我歼灭。7日，敌人的整编四十一师、四十七师仓皇向考城逃窜，被我歼灭约两个旅；敌整编五十五师与六十八师向开封逃窜，又被我追歼约1个团。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优势与劣势是相对而言的，既没有绝对的优势，也没有绝对的劣势。在作战中，如何变敌人的优势为劣势，变自己的劣势为优势，这是检验一个指挥员军事艺术水平高低的重要方面，而毛泽东制定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有战略战术原则就是可以变劣势为优势的有效方法。从定陶战役当时整个战局来看，敌人的兵力处于优势，而我军处于劣势，而我集中1个纵队的兵力攻击他的1个团，从而又形成了我军的优势，造成了敌人的劣势。同时，首先被我歼灭的敌整编三师五十九团，是敌人的强中之强，它的被歼对敌人起到了震慑作用，敌人的调整又为我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敌人以三倍以上的兵力却被我挫败，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军事原则的无比正确。

华东敌情多变幻 挥师莱芜操牲券

莱芜战役，是毛泽东指导，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领导的华东野战军于1947年2月进行的一次运动战战役。这个战役，共歼敌6万余人，收复城市13座，使鲁中、渤海、胶东三个解放区连成一片，进一步巩固了我军后方，夺取了战区的主动权。

当时的情况是，国民党从1946年6月下旬开始，大举围攻我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内战。华东解放区是敌人进攻的主要方向之一。蒋介石集中了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共62个整编旅（相当于师）约50万的正规军，企图首先侵占我苏皖解放区，消灭我在该地区的主力；或压迫我军北撤山东，然后寻机与我主力决战。到1947年1月底，我华东野战军在连续进行苏中、皖北、鲁南等战役，取得歼敌近20万人的重大胜利以后，为了继续执行内线歼敌的作战方针，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将主要战场转到山东境内，主力则集结在临沂地区休整待机。

蒋介石为取得侵占我苏皖边区一些城市和地方的表面胜利冲昏头脑，错误地判断我军“伤亡惨重，续战能力不强”，又侦悉我军主力集结在临沂地区，认为临沂为山东解放区中心城市，我军必将固守。因此，急忙制定了“鲁南会战”计划，派他的参谋总长陈诚代替薛岳指挥，以31万余人的兵力向我进攻。据说这个陈诚发明了个“豆腐渣”战术，让欧震领着8个整编师20多个旅，从陇海路东段新安镇以北60华里的正面上，分左、中、右三路从南向我临沂杀来；以第四十二集团军郝鹏举部配置在宝塔埠、驼峰地区担任侧翼掩护；以4个整编师为预备队，随后跟进。北线以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所部3个军为辅助突击集团，由淄川、博山、明水一线分两路南下莱芜、新泰。各路敌军实行南北对进，分进合击，妄图围歼我军主力。陈诚说，30多万人马“即使都是豆腐渣也能胀死共军！”同时，他还有个自鸣得意的安排，在南线的三路进犯之敌中，“烂葡萄”里夹上“硬核桃”，左路夹个整编十一师，中路夹个整编七十四师，右路夹个整编二十五师。

在鲁南战役即将胜利结束之际，我华东野战军首长依据南线敌军紧逼我军北上，威胁我临沂安全的情况，拟将作战重心放在南线。待部队略事休整后，即准备南下打南线的欧震集团第七十四师。并以一部兵力牵制北线进攻之敌。毛泽东根据华东战区的情况，多次致电华野：“你们应以歼灭欧震六个旅至八个旅为目标”，“如果你们感觉打欧震需要集中更大兵力，则四、九两师可否留下一个师，打完欧震再回鲁中，即使泰安失守也不要紧”，“目前除以一部打枣庄，翌日起全军整训两星期，集中一切力量歼灭欧震”。华野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抓紧休整部队，调整部署，往前线运送粮食弹药，积极进行战役前的组织准备方针。于2月5日向军委提出三个作战方案：第一方案，以1个纵队进攻宝塔埠附近的郝鹏举部，吸引右路之敌北援或调动中路和左路之敌北进，造成各个歼敌的战机。第二方案，如第一方案未能奏效，除以1个纵队位于临沂以南监视敌人外，主力均集结到临沂以北地区休整待机，第三方案，如果南线敌人仍不北进或北进时不便歼灭，除以1个纵队留临沂地区与敌人纠缠外，其余主力急行北上，彻底解决北线敌人，平毁胶济线，威胁济南，以吸引南线敌人进入临沂以北山地或增援胶济线，然后进行全力反攻，各个歼灭。报告侧重讲了第三方案的好处，毛泽东于第二天复电：“完全同意五日十五时电第三方案，这可使我完全立于主动地位，使蒋介石完全陷于被动。”2月6日夜晚，我二纵遵照陈、粟首长命令，以突然迅猛

的动作向东南挺进，7日在白塔埠、驼峰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右路军侧翼的第四十二集团军郝鹏举部主力，并生擒了郝鹏举。在我打郝鹏举部时，欧震集团未敢增援和北进，左路军反而向后收缩。2月8日，北线的敌人也进占新泰。毛泽东依据战况的发展，于9日电示：“解决郝鹏举部很好，但就全部战略方针来说，如你们方针是解决南面，则似乎打得早了一点，可能影响敌各部进得更谨慎。打了郝鹏举后你们似应按兵不动（要有极大耐心），让敌各部放手北进，然后各个歼灭之。如你们方针是先解决北面，则打郝鹏举部并无妨碍。你们需在两个方针之间首先有所抉择。”方针，于2月5日向军委提出三个作战方案：第一方案，以1个纵队进攻白塔埠附近的郝鹏举部，吸引右路之敌北援或调动中路和左路之敌北进，造成各个歼敌的战机。第二方案，如第一方案未能奏效，除以1个纵队位于临沂以南监视敌人外，主力均集结到临沂以北地区休整待机，第三方案，如果南线敌人仍不北进或北进时不便歼灭，除以1个纵队留临沂地区与敌人纠缠外，其余主力急行北上，彻底解决北线敌人，平毁胶济线，威胁济南，以吸引南线敌人进入临沂以北山地或增援胶济线，然后进行全力反攻，各个歼灭，报告侧重讲了第三方案的好处，毛泽东于第二天复电：“完全同意五日十五时电第三方案，这可使我完全立于主动地位，使蒋介石完全陷于被动。”2月6日夜，我二纵遵照陈、粟首长命令，以突然迅猛的动作向东南挺进，7日在白塔埠、驼峰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右路军侧翼的第四十二集团军郝鹏举部主力，并生擒了郝鹏举。在我打郝鹏举部时，欧震集团未敢增援和北进，左路军反而向后收缩。2月8日，北线的敌人也进占新泰。毛泽东依据战况的发展，于9日电示：“解决郝鹏举部很好，但就全部战略方针来说，如你们方针是解决南面，则似乎打得早了一点，可能影响敌各部进得更谨慎。打了郝鹏举后你们似应按兵不动（要有极大耐心），让敌各部放手北进，然后各个歼灭之。如你们方针是先解决北面，则打郝鹏举部并无妨碍，你们需在两个方针之间首先有所抉择。”

2月10日，华东野战军根据当时情况，最后决定，集中53个团的兵力，首先解决第七十三军及南北师庄第十二军的1个师，然后再转移兵力，解决进占新泰的第四十六师，并向胶济线进攻，以彻底解决北线问题。毛泽东同意了这一决定，于是，我华东野战军主力，除留下三纵队和二纵队在南线继续阻击和迷惑敌人外，迅速放弃临沂连夜回师北上，直向李仙洲集团扑去，毛泽东在华野主力北移后指示：“为彻底解决北面（敌）三个军二十三个团之众，我韦国清纵队及八师似宜北上参战。”

临沂，是华东解放区的首府。保卫临沂，是全区军民的愿望，如今一旦放弃，许多人思想不通。敌人则得意忘形，狂妄不可一世。国民党宣传部长陈学沛在南京叫嚣：“攻占临沂为国军在鲁南决战的空前大胜。”陈诚更是大吹大擂：“陈毅残部已无力与国军作战，欲与刘、邓会合，国军正追剿中。山东大局指日可定。”其实，这时我华东野战军主力正日夜兼程开往莱芜、新泰一带。

坐镇济南的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发觉我军主力有北上莱芜、新泰的迹象，即令刚进占新泰的李仙洲部急速回师。但陈诚却被我地方武装在西线运河上架桥和主力迅速西进北上之举迷惑住了，他断定：“华东共军迭经重创，无力与国军决战，企图偷渡运河与刘、邓部会师。”因此不顾王耀武的主张，要李仙洲坚决重占新泰，向蒙阴进击，断切我们西退之路。还说什么：

“歼灭华东共军主力在此一举。”李仙洲无奈，不得不再命四十六军和七十三军重新赶回新泰和颜庄地区。正当敌人六七万人往返“游行”之际，我华野大军已由远道赶来，包围了新泰、莱芜之敌——李仙洲集团。

20日夜，我八纵、九纵首先在何庄地区消灭了由博山南下归建的敌七十三军的第七十七师，切断了通往博山的退路；21日晨，我一、四、七、八、九纵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莱芜城及其以北地区，李仙洲率领的七十三军和刚从颜庄撤回的四十六军成了瓮中之鳖。当夜，我六纵歼灭莱芜以北吐丝口的敌十二军新三十六师；李仙洲逃往济南的后路也断了。

经过连日激战，莱芜城东、南、西面的重要高地皆被我军占领。敌人虽然不断抵抗，但越来越无望了。王耀武也感到济南空虚，命李仙洲率部向北突围，向济南靠拢。敌人统帅部也觉悟到所谓“陈毅残部已无力再战”，是自欺欺人的胡说，只好让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亲自指挥大批飞机轰炸、扫射，妄图为李仙洲打开一条生路。但李仙洲也明知无济于事，所以在给王耀武的信中悲鸣道：北撤部队能否安全和胜利，“只祈上帝保佑”。

李仙洲接到王耀武的命令后，于2月23日早晨率七十三军和四十六军的人马，乱纷纷地离开莱芜，分成三路钻进南北不到20里、东西约五六里的山沟里。事先埋伏在西侧的我军战士，根据华野首长的指示，以最大的克制，一直等到敌人全部离开莱芜城，指挥员一声令下，我各纵队的大炮、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敌人的先头部队又遭到吐丝口附近我六纵的迎头痛击。敌人顿时骡马乱窜，车辆狂奔，建制混乱，再也不能有组织地抵抗了。我军乘机从四面发起攻击，将敌人截成数段，经过6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突围之敌，这次战役，我军歼灭了敌人两个军又一个师，李仙洲本人也被生俘，李仙洲被俘之后，还不胜感慨他说：“我早知道你们要找到我头上来，可他们一定要我来碰！”

这时，被我三纵拦阻在南线的敌人，深怕我军“围城打援”，在临沂以北踏步不前，我军趁此机会解放了新泰、莱芜、博山、淄川等13个县城，胶济路南北连成了一片。敌人40天不敢出战，山东局势暂时稳定了。

毛泽东在指导莱芜战役中，表现了高度的灵活性。本来，一开始就确定了保卫临沂的作战方针，并准备集中兵力歼灭南线欧震集团，以部分兵力阻击北线之敌。但由于南线敌人兵力集中，一时难以调动和分割。此时北线之敌已进入莱芜、新泰，如果让敌人长期占领，必然影响我华东战区尔后的作战。同时对于北线冒进分散之敌，也便于我集中兵力各个歼灭。因此，毛泽东果断地批准了华东野战军移师北上的计划。我不惜放弃华东解放区首府临沂，不怕打破坛坛罐罐，直扑李仙洲集团，也是完全符合毛泽东一贯倡导的“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军事原则的，其结果不仅共歼敌6万余人，还收复了13座城市。从而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为我军制定的军事原则的正确性。

胸中自有百万兵 蘑菇战术显神通

1947年3月，蒋介石的“全面进攻”白白送掉65个旅之后，仍然野心不死，被迫改为“重点进攻”，集中兵力进犯我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仅陕甘宁边区，敌人就调集了胡、马军23万多人，妄图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一举消灭西北解放军，夺取延安，摧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枢。当时，解放军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只有2.5万余人，形势十分严重。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定主动撤离延安，在运动中寻机破敌。

对于撤离延安，当时许多战士甚至不少干部想不通，感情上一时转不过弯来。毛泽东耐心地给同志们讲解道理。他说，我们在这里住了10年，挖了窑洞，种了小米，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培养了干部，指挥了全国革命，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有个延安，不能不保，但是延安又不可死保。他反复说明，作战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主要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这是个显而易见的真理。从全国战局、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方面看，暂时放弃延安，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过去8个月内，蒋介石已损失了60多个旅，他能用于进攻解放区的机动兵力越来越少，因此被迫放弃“全面进攻”，改在解放区的两翼：山东和陕北。实行“重点进攻”，这正表示蒋介石已走近穷途末路，离灭亡之日不远了。目前全国正面临着人民大革命高潮的前夜，我们要用百折不回的毅力，去克服所有的困难，促进新的高潮很快到来。对于如何解决对陕甘宁边区进犯之敌，毛泽东说，敌人有23万人，我们才两万多人。两万多人要消灭23万人，是有困难的。要战胜敌人，得有正确的作战方针。现在，就靠你们作“磨心”，牵敌人，磨敌人，让敌人围着团团转。这种办法就叫“蘑菇”战术。陕北山高路隘，你们牵上敌人去爬吧。等它爬够了，疲劳了，饿饭了，就寻找机会歼灭它。毛泽东的话，给大家拨亮了心中的明灯，增添了争取胜利的信心和力量。

3月16日，敌人在付出巨大代价后，进抵垦区金盆湾、南泥湾一带，逼近延安的大门。在敌人兵临城下的时候，毛泽东仍然在那里坚持工作，18日，敌人窜到延安城郊三十里铺，枪声已清晰可闻，毛泽东最后离开办公室。3月19日，我教导旅和警备七团已歼敌5000余人，

胜利完成了掩护中央机关安全转移的任务，而自动撤离延安。在敌人占领延安后，我一纵用少数兵力，故意摆出阵势，漫山撒开，向西北方向的安塞转移，诱敌前进。敌机跟踪侦察，果然以为是大兵团行动，即以其主力五旅之众追扑上去。

敌人占领我主动放弃的延安空城后，就拼命吹嘘“胜利”，而此刻，我新四旅、教导旅和刚由河东过来的二纵，已到延安东北的青化砭一带隐蔽埋伏，毛泽东在离开延安时，就已决定要在这一带打一个歼灭战。而且判断，敌人一定会来，并且是实力较弱，便于歼灭的。

青化砭，30里大川，公路两边都是高山，正象张开一条口袋。只是青化砭有个土寨子，要使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就得让出寨子。但这样一来，就会增加我攻击时的困难；不让出来，又不能全歼敌人。最后决定，拆北墙留南墙。因为敌人由南边来，既可以挡住敌人的视线，又减少了我军攻击时的障碍，这个巧妙的主意立刻被采纳了。

3月24日拂晓，西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神不知鬼不觉，进入指定地区，一纵把敌人牵到安塞后，又掉头向东，赶到青化泛

参加战斗。刚刚布置妥当，就得到情报，敌三十一旅、一三五旅自延安分兵北犯，已进至拐峁、刘家沟了。但战士们等了一天，却不见敌人的到来，原来敌人在拐峁补给粮食，宿营了。

第二天天刚亮，敌人两架飞机到我设伏地点侦察一番，当确信没有伏兵的时候，他们的部队才出动。将近10点：敌人的先头部队闯进了伏击圈，他们虽然得到了“无有伏兵”的报告，但还是例行公事地朝半山腰扫了一阵机枪，火力侦察了一番。战士们一动不动。敌人没有发现目标，前进的胆子更壮了。我军1万多人，就集结在这里，吃饭睡觉，竟没有留下丝毫痕迹。由于有广大群众掩护，封锁消息，传送情报，敌人一举一动我军都了如指掌。敌人得不到群众支持，完全象瞎子一样乱撞乱窜，当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时，我二纵就在尾部打响了，新四旅在前头捏住了敌人的脖子，一纵、教导旅自两侧合击，分割穿插，把敌人斩成数段。顿时，枪炮齐鸣，杀声四起，战士们个个如猛虎下山，似蛟龙入海，向敌人猛打猛冲。由于山高沟深，敌人躲无处躲，逃无处逃，只好等着挨打。

仅仅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敌三十一旅旅部并一个团近3000人全部被歼。旅长李纪云被活捉，并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

撤出延安仅6天，我军初试锋芒，就旗开得胜。这一仗大大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俘获的人员、马匹、弹药、物资，又充实了我们的力量。敌主力5个旅，武装游行到安塞，扑了一个空，听说三十一旅被歼，慌忙赶回救援，而我军已撤往几十里以外休整了。

青化砭战斗的胜利，不仅使敌人大为震惊，就连我军内部许多人也不曾想到会如此顺利。其实，马到成功这是毛泽东预料之中的。为着迎合敌人急于寻找我主力决战的心理，在撤出延安的时候，毛泽东指示西北解放军一部，仓开向安塞方向转移，以调动敌人主力到西北方向，而我主力则隐蔽在延安东北一带寻找战机。毛泽东分析，敌人在延安立足未稳，必然会派出警戒部队，向延安东北方向幡龙一带伸展，以便确保外围。青化砭是去幡龙的必经之路，地形险要，便于我军用兵。就一般而言，敌人会把战斗力较强的部队用来对付我军主力，战斗力较弱的放出警戒。而我军则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事前做好充分准备，以逸待劳，一鼓歼灭之。

三十一旅在青化砭被歼，敌人认为是分兵所致，于是便迅速改变战术，一出动就是八九个旅，一下子摆开几十里的方阵，行则同行，住则同住，以为采用这个新制定的所谓“方形战术”，就不会暴露弱点，被我“各个击破”。其实，分兵也罢，“方形”也罢，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面前都失去了效力。不久，敌人又在羊马河受到一次比青化砭更沉重的打击，一个美械装备的整旅被我完全歼灭。

羊马河战斗是在一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的，青化砭战斗刚一结束，我军主力便转移隐蔽休整，养精蓄锐；只派出小部队作“磨心”，牵敌人，磨敌人，使其暴露弱点，出现过失，便于我们歼灭。果然，当敌人发现我军主力就在延安东北时，立即以董钊、刘勘两个军共八九个旅，紧迫不舍。然而我军主力却按步不动，只由新四旅两个营佯装大兵团，牵着敌人的鼻子，经延长、延川、清涧至瓦窑堡，又来一次长途大游行。我“磨心”由于是小部队，机动灵活，且有广大群众的支援掩护，使敌人到处扑空。敌人的大部队，不仅行动不便，补给困难，还要不断受到民兵游击队的袭扰打击。实在是苦不堪言。

敌人到瓦窑堡，见不到我军的影子，粮食也吃完了。于是留整编一三五旅守备瓦市，主动南下集结于幡龙、青化砭一线，进行补给。4月6日，我军于幡龙附近的永坪地区，给从瓦窑堡哨退的敌整编二十九军重大杀伤。敌人发现我军就在背后，马上又掉头北上。对于敌人这一阶段的行动，毛泽东作了极其精确的估计：“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全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敌三月三十一日到清涧不即北进，目的是让一条路给我走；敌西进瓦窑堡，是赶我向绥、米。现在因发现我军，故又析向瓦市以南以西，再向瓦市赶我北上。”（《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18页）因此，毛泽东指示部队继续在现地区同敌人周旋，然后寻机歼灭它。

根据毛泽东的部署，一纵便乘机诱敌，敌人误认牵制部队即为我军主力，便紧紧追来。敌人在瓦窑堡的一三五旅也急忙南下，企图与其主力会合。我指挥机关发现这是个“可乘之隙”，立刻命令主力部队坚决截击歼敌。在一纵继续牵着敌人向西游行之时，我新四旅、二纵和教导旅则在延榆公路两侧隐蔽集结，准备夹击敌人。

敌一三五旅在14日拂晓进至羊马河附近伏击圈，我军主力立即对敌人进行攻击。我军集中优势人力，层层排除敌人的抵抗。二纵和教导旅由东往西攻，新四旅由西往东压。阵地上，炮弹开花，浓烟滚滚。敌人见势不妙，急忙给胡宗南发电求援，胡宗南一边令一三五旅就地构筑工事，“固守待援”，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我紧紧吸住；一边令董钊、刘绒急速回转同我军决战。其实，他要消灭我军主力只不过是黄粱美梦罢了。这时董钊、刘勘的部队已被我一纵紧紧拖住，要回来已不可能了。只有后卫部队一个旅，跟一三五旅隔着一道山，可是又被我十六团二营顶住。不能前进一步，只好胡乱地打一阵炮，权作“声援”。而一三五旅由于一直等待主力接应，因此连逃跑的机会也错过了。我军以压倒的优势，猛打猛冲。经过6个小时的激战，敌一三五旅的4000余人被全歼，代旅长麦宗禹也被活捉，并缴获大量武器装备。由于我军坚决执行了毛泽东的作战方针，机动灵活，善于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善于制造和利用敌人的“可乘之隙”，在运动中捕捉战机，歼灭敌人。所以，敌一三五旅尽管有9旅之众作为接应，仍然遭到全军覆没的命运。

我军撤离延安还不到一个月，就连打两个胜仗，歼敌近两个旅，鼓舞了士气，改善了装备，补充了人员。敌人连打败仗，士气低落，开小差的屡屡发生。毛泽东正确估计了敌人的情况，要求我军，继续采用“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使其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的程度；并攻击敌人的薄弱部分，断其补给，使其饿饭。这样，下一次战役就是以攻打幡龙最为有利。

幡龙位于延安东北90里，是敌人的大“粮库”。我打下幡龙，就断绝了敌人的补给，无异于釜底抽薪。我军经过两次歼敌的锻炼，炮火大大加强，已具备一定的攻坚力量。幡龙原有敌整编一六七旅把守，周围还有几个旅来往活动，要打，就必须把敌主力调开，使其孤立无援。因此，能不能调动敌人就成了攻打幡龙的关键问题。毛泽东判断，当时敌人正急于赶我向北。因此我三五九旅便“投其所好”，积极出击，诱敌沿咸榆公路北上；同时，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组成南进支队，到延安以南破坏交通，断敌粮运。我军主力则隐蔽集结于瓦窑堡到清涧大路以南，等。敌人一到绥德，就在幡龙打响。敌人再想回援，至少需六七天，胜利就有绝对把握了。

敌人发现我三五九旅，便象鱼看到了诱饵，紧紧追上来，敌人9旅之众，

再加上前面机枪开路，也算得上浩浩荡荡了。敌人主力一上钩，我军主力便立即进入蟠龙周围，严密封锁了消息。经过两昼夜的紧张侦察，加上被敌人抓去挖工事的老乡跑回来提供的材料，我军已基本掌握了敌人工事构筑和火力配置的情况，并按顺序把敌人的工事标为5个阵地。其中的5号阵地是主要支撑点，其人力配备还不十分清楚。为了彻底弄清楚，便在附近的山沟里捉到两个去抓鸡的俘虏。这样，整个蟠龙的防御体系我们都了如指掌了。

4月30日，我担任攻击蟠龙的部队，进入攻击准备位置，一纵在西南，二纵独四旅在东南，新四旅在东北，完成四面包围。一切准备就绪，定于5月1日拂晓打响。不料天不作美，头天突然狂风暴雨，雷电交加。由于山洪暴发，遍地泥泞，部队难于运动，只得推迟一天。

5月2日，云收雨住，天刚拂晓，战斗便打响了。我各路部队在强大炮火掩护下，连续夺取十几处前沿阵地。东线兵团突破鹿砦、铁丝网，以对壕作业迅速逼近敌阵，直捣蟠龙。敌人仓猝应战，也不知我军来了多少，山炮、迫击炮、化学炮，只管乱轰一气。

战斗进展极其顺利，次日即将遍布群山的30多个碉堡外壕大部占领。前来助战的两架敌机，一架被击落，一架慌忙逃走。我独四旅和新四旅七七一团借着炮火掩护，扫除了前沿阵地密布的地雷，接近敌人的主要支撑点5号阵地，敌人依仗纵深工事，和猛烈的炮火配合，进行顽抗，攻击难以奏效。我军重新调整火力，发起猛攻。七七一团一个排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逼近5号阵地前沿，迅速挖好单人掩体，紧紧贴在那里，分批轮流向敌人阵地投掷手榴弹，给敌重大杀伤和消耗，最后敌人不支，慌忙开来一连人换防。我军乘机发起攻击，夺取了5号阵地。接着又攻下了3号阵地，摧毁了敌人的山炮阵地。

4日黄昏，各部队由四周居高临下，向镇内之敌猛攻。敌人狼狈向沟里逃窜，战士们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疲劳的精神，奋力追歼。夜半，敌人的精锐部队整编一六七旅就被我全部歼灭，毙俘敌旅长李昆岗以下6700余人，缴获山炮6门，军衣4万多套，面粉1.2万余袋，骡马千余匹。

与此同时，我教导旅在青化砭以北地区阻敌，歼敌保警队一部。4日驻青化砭之敌整编四十八旅、八十四旅各一个团附坦克两辆，去解蟠龙之围，被我阻于青化砭以北10里处。5日晚该敌才得知蟠龙守敌被歼的消息，连夜冒雨南逃。南进支队也在这以后不久，攻克延安以南的门户金盆湾。我三五九旅则紧紧拖住敌人北上主力，就在我打下蟠龙的当天，他们得知后方告急，仓皇南下，等敌人抵达蟠龙，我军主力已到安塞地区休整了7天。

撤出延安仅仅40多天，西北解放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三战三捷，歼敌1.4万多人，彻底粉碎了敌人打击我党我军首脑机关，并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的妄想。

战争的整个进程，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论断：敌人的优势只是暂时的。在西北战场上，尽管敌人骄横一时，侵占了陕付宁边区的所有县城，但由于我军采用了毛泽东制定的灵活机动的“蘑菇战术”，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对敌人一拖再拖，一磨再磨，使敌人越打越孤立，越打越弱，越打越少，陷入绝境，仅仅过了一年多，革命圣地延安就重新回到人民手中，敌人在损兵折将10万人之后，不得不狼狈逃出边区，落了个“人地皆失”的悲惨结局。正是：胸中自有百万兵，蘑菇战术显神通。

尖刀插进敌心间 千里跃进大别山

到1947年6月，中国人民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进行了整整一年。经过一年的战争，敌人虽然受到很大的削弱，但是，无论在数量上或装备上它都还占着优势。当时，从表面上看，乌云依然弥漫天空，局势依然严重。但是，毛泽东高瞻远瞩，科学地分析了革命形势，认为战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这是因为，经过一年的军事较量，我军已歼灭敌人97个半旅，78万人，伪军、保安队等杂部34万人，共计120万人。敌人被迫把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而且重点进攻也遭到了挫折，成了强弩之末，国民党士气低落，军心动摇。而人民解放军不断取得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军心、民心。人民解放军的队伍不断壮大，装备大为加强。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越来越为更多的指战员所掌握。

在重大变化来临之时，毛泽东认为，我们不应等到敌人的进攻完全被粉碎，我军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超过敌人之后再去看战略进攻，而应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不让敌人有喘息机会，立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泽东及时作出了战略决策：“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战略进攻的矛头指向哪里？毛泽东英明地选定在大

别山地区。大别山，雄峙于国民党首都南京与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这里又曾是老革命根据地，这里的群众对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们的军队容易在这里立足。我军长驱直入，一举插进敌人的腹部大别山，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无疑象是一把尖刀插入敌人心脏。“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蒋介石必然会调动其进攻山东、陕北的部队回援，同我们争夺这块战略要地，这就恰恰可以达到我们预期的战略目的。

为了实现跃进大别山、夺取中原的战略计划，毛泽东作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周密部署。三军配合，即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中央突破，跃进大别山；以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为左后一军，挺进苏鲁豫皖地区；以陈赓等率领的太岳兵团为右后一军，挺进豫西。三支大军在（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的广大地区，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逐鹿中原，机动歼敌。同时实施两翼牵制，即由陕北我军出击榆林，调动敌军胡宗南集团主力北上，山东我军则在胶东发动攻势，继续把山东敌军顾祝同部往东引向海滨，以利三军的行动。

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12万大军在鲁西地区工面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揭开了全国性大进攻的序幕。

敌人惊恐万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称刘邓大军强渡黄河为“六·三事件”，蒋介石慌慌张张于7月7日宣布全国“勘乱”总动员，这也从反面证明，我军渡过黄河，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决策，恰好击中了敌人的要害。

蒋介石不甘心失败，纠集了大批兵力，妄图将我刘邓大军歼灭于陇海路和黄河之间，或将其逐回黄河以北。

面对这种情况，我军应采取怎样的进攻样式？毛泽东指示，进军大别山

不能象北伐时期那样逐城逐地推进，而必须采取跃进的进攻样式：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以半个月行程直趋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当时，毛泽东分析了部队跃进大别山有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他告诫部队要作充分的思想准备，从最坏处着想，朝最好处努力。

渡河大军于7月中旬在鲁西南地区歼敌9个半旅后，8月上旬向南推进，11日越过陇海线，接着陆续跨过涡河、黄泛区、颍河、沙河、淮河，攻占了豫东南、鄂东、皖东大部县城，一路劈荆斩棘，于8月27日到达大别山地区。此后，经过三个多月的战斗，建立了33个县的人民政权，开辟了大别山根据地。胜利地实现了毛泽东估计的三个前途中最好的前途，从而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脏地区——武汉至南京之间，插上一把尖刀。

实行中央突破，采取跃进方式，打向敌人战略纵深，是击中敌人要害、转变战争全局的极其英明的决策。这种以十几万大军远离根据地，一举跃进到敌人的深远后方去作战，这是一种独特的进攻方式，是史无前例的。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我中原三路大军互相配合，机动作战，共歼敌19万余人，解放县城100余座，在4500万人口的江淮河汉广大地区建立了中原根据地，把国民党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战略后方，变成了我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前沿阵地。从而使蒋介石在中原的防御体系被摧毁，被迫由“全面防御”转为“分区防御”。

攻济打援各有兵 守敌援军两哀鸣

济南战役，是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前夕，毛泽东亲自领导和指挥的一次大规模的城市攻坚战。战役从1948年9月16日开始到24日结束，全歼国民党守敌11万多人，解放了国民党部队坚固设防、重点守备的大城市——山东省省会济南市，为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揭开了胜利序幕。

当时，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三年，战争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展开战略进攻已经一年，胜利形势迅速发展。国民党部队由全面进攻转入全面防御，又由全面防御转入重点防御，企图争取时间，恢复与加强军事力量，挽救失败的局面。

处在解放区四面包围中的孤城济南，是国民党部队支撑华北残局的一个战略要点。它位于津浦、胶济两条铁路交会点，南可向徐州呼应，北能与平津声援。蒋介石以他的嫡系军队的所谓“名将”王耀武为司令官，在这里设置“第二绥靖区”，以11万重兵防守，并在日伪原有的城防工事基础上，修筑了以内城为核心，以外城和商埠为基本防御地带，以距城二、三十公里的城镇为外围的永备性防御体系，总面积达600多平方公里。1947年2月23日莱芜战役，解放军歼灭了国民党军队6万余人，蒋介石亲自飞往济南向王耀武面授机宜，指挥王耀武布置防务，固守济南。1948年8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裁并绥区，扩编新的机动兵团”，将每个兵团配备五、六个旅甚至十二、三个旅之多，并命令山东全境的国民党军队与地方保安旅统归王耀武指挥。王耀武则亲自督率所部到处征工征料，大量砍伐树木，加强防御工事，妄图长期坚守。蒋介石为了支援济南作战，夹击解放军，同时为了巩固陇海路东端，以作南京的屏障，在济南战役之前，将其在华东地区的主力编成三个兵团：第二兵团邱清泉部集结于商邱一带，第七兵团黄伯韬部集结于新安镇一带，第十三兵团李弥部集结于宿县、固镇地区，从事整理补充，准备作战。

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在解放战争的第三年里，人民解放军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作战；争取歼敌正规军100个旅以上，以取得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要求华东野战军歼敌40个旅左右，并于八、九月间解放济南。对济南战役的作战方针、目的和部署等问题，毛泽东、中央军委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明确提出了攻济打援的方针，指出：这次战役以既攻济南又歼灭一部分援敌为目的；在兵力部署上，应以一部分兵力攻济南，集中大部分兵力打援阻援。为了策应华东野战军攻济作战，同时对中原野战军作了相应的部署。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和部署是济南战役胜利的根本保证。

1948年8月下旬，华东野战军前委召开了有纵队以

上负责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研究了济南战役的具体部署。根据攻济打援的作战方针，确定以山东兵团全部，加外线兵团一部共7个纵队，组成攻城兵团，统由山东兵团领导人谭震林、许世友、王建安等指挥；另以8个纵队组成打援兵团，主力部署在运河两岸的巨野、嘉祥、济宁、兖州地区，准备阻击和歼灭来援的敌人。攻城兵团又依据济南地形和敌情，划分东、西两个集团，分别由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聂凤智和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统一指挥。主攻方向置于西面，先夺取飞机场，断敌空援，然后东、西两个集团协同攻城。其他部队和地方武装分工配合济南作战和保障解放区后方安全。

战前，华东野战军前委颁发了《攻济打援政治动员令》，响亮地提出了

“打下济南府，活捉王耀武”、“大量歼灭来援之敌，争取战役全胜”的口号。参战部队指战员纷纷表决心，请任务，要求到济南城头、打援前线杀敌立功。

1948年9月16日，济南战役正式打响了。午夜12时，解放军攻城部队东、西两个集团，在南、北、东、西各百余里的广阔战线上，同时向国民党守敌外围阵地发动进攻。

战事以东郊最为激烈。17日上午，解放军以榴弹炮及重迫击炮，集中火力掩护步兵直向济南城东郊的屏障茂岭山、砚池山猛扑，与固守该地的敌十五旅展开激战。解放军以人力封锁敌人堡垒的射击口，战士们奋不顾身英勇向前冲锋，并向堡垒里投掷爆破筒。敌多处堡垒被炮火及爆破筒炸坏。守敌妄图负隅顽抗，他们也集中炮火向解放军还击，掩护防守茂岭山、砚池山的部队反攻。经过一夜血战，王耀武视为济南屏障的茂岭山、砚池山便被解放军占领。

东面战斗最为激烈，王耀武便认为解放军的主力可能在东，便将调往城西的十九旅和五十六旅由西面调回，并令六十三师预备队及十九旅向解放军反扑，企图夺回茂岭山、砚池山阵地，他们曾向解放军数次冲击，激战甚烈，均被解放军击退。

到20日拂晓前，王耀武吹嘘至少能守半个月的外围阵地全部被解放军占领。攻城西集团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包围了济南市的商埠，并占领了飞机场，完全断绝了敌人的空运补给。敌人西守备区的总指挥、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在解放军强大攻势下，率领所属3个旅约两万人起义，撤离战场。

解放军的快速进攻和吴化文的起义，迫使王耀武考虑弃城突围，但蒋介石严令其坚守待援。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战况及时电示：“为预先准备在我军攻入城内，王耀武率其死党突围而出分路逃窜时，全歼该敌勿使漏网起见，你们应在其主要逃路及次要逃路，近距离及远距离，布置多层堵击力量。”并指出除由正规部队负责外，应布置通往各路之地方部队及民兵“节节堵击，是为至要”。华野前委遵照电示即令攻城兵团迅速向商埠及城垣攻击，并部署兵力防敌突围。同时详细研究了徐州之敌北援情况，进一步调整作战方案，随时准备歼击北援之敌。

解放军的高速度的进攻和吴化文的起义严重地动摇了敌人坚守济南的信心。王耀武慌忙调整部署，把主力撤入城内，同时留下较强的兵力防守商埠，商埠是济南城西工商业集中的地区，王耀武的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就设在这里，9月20日晚6时，解放军攻城西集团各纵队同时对商埠实施突击。经过40多分钟猛烈炮火轰击和连续爆破，解放军多路突破守敌阵地，并肩向纵深挺进。第十纵队由商埠北面攻克敌人装甲车防守的济南火车站，直插外城角下，堵死了商埠守敌后退进城的道路，第十三纵队和鲁中南纵队由商埠南面向东北猛攻，切断了城内外守敌的联系，第三纵队从横贯商埠东西的经二路和经三路迅速前进。经过激烈战斗，直追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当时王耀武早已撤入内城，这里仍然有他的精锐部队防守着。防区由几座钢筋水泥的高大建筑组成。四面马路上有明碉暗堡控制，院内院外工事密布，共有100多个机枪火力巢和1000多个步枪射击孔。21日晚，解放军突击队在炮声轰鸣、硝烟弥漫中突破了严密设防的高大围墙，冲进院内。敌人从楼上地下四面八方疯狂反扑，依靠着一切障碍物和工事进行顽抗。解放军火箭炮手和爆破手

大显神威，一处处地迅速摧毁敌人的楼房和工事，为突击队勇士开辟了前进的道路，经过激烈战斗，解放军战士于22日下午冲上了这群高大建筑的最高层，胜利结束了肃清商埠守敌的最后一战。

王耀武以为解放军攻占商埠后需要准备三、四天才能攻城，不料我军当晚6时30分就发起向外城猛烈攻击。我军各纵队在强大炮火掩护下，连续爆破，勇猛突击，迅速多处突破城垣，先后攻入城内，与敌人展开激烈巷战。到23日就占领了外城大部地区，逼近内城。王耀武为了作最后的挣扎，急忙将剩余残部进行整顿，加修巷战工事，并集中炮火破坏解放军攻城准备。为了解济南之危，蒋介石一再督令徐州各兵团迅速北援，并且使用飞机对解放军已经占领的市区进行轰炸。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攻城兵团决定就在23日连续对内城发动总攻。当晚6时，解放军集中炮火向高14米、宽10米的内城墙及敌防御工事猛烈轰击，攻城各部跨过护城河一齐扑向城垣。王耀武督率守城敌军拼死抵抗，战斗异常激烈。我军攻城东集团第九纵队一部由城东门南侧突破，一个多连英勇登上城头，与敌人展开激烈搏斗。由于护城河上临时架设的渡桥被敌人的炮火打断，影响了后续部队登城。攻城西集团第十三纵队两个营突破西南角，其中两个连击退敌人反扑，迅速入城，与敌人展开巷战，其余部队在突破口上与疯狂反扑的敌人进行激烈争夺，在这关键的时候，各部队领导干部深入到前线各主要方向，帮助基层干部总结攻城的经验教训，研究克敌制胜的措施。经过认真的准备，24日夜间2时25分再次发起猛烈进攻。在各突击点，枪炮声、爆炸声响成一片，火光冲天，浓烟弥漫。攻城东集团的第九纵队七十三团经过反复冲击，首先突破城垣，占领了黑虎泉对面的城东南角，并连续打退敌人多次反扑，巩固了突破口，把代表人民心愿的“打下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红旗插到了高踞城头的敌人的制高点——气象台上，纵队主力和渤海纵队一部从这里涌进内城。攻城西集团的第十三纵队一九团顽强坚持在突破口上，浴血奋战，终于在先突入城内的两个连接应下，击溃敌人的拼死反扑，控制了突泉附近城西南角。第十三纵队主力和第三纵队相继冲进城内。入城部队东、西对进直插纵深，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守敌步步顽抗，节节败退。这时，王耀武看到覆灭已在眼前，就留下他的参谋长指挥，自己悄悄地溜走了。

解放军东、西两路大军，迅速肃清了内城东半部和西半部的守敌，象一把大铁钳，从东、西两侧有力地合拢起来，紧紧钳住王耀武撤入内城企图顽抗待援的指挥所——山东省政府。守敌利用坦克、装甲车以及各种轻重武器垂死挣扎，省政府附近一片烈火浓烟。四面包围过来的解放军勇猛地冲破多层防御工事，冲进省府大院，消灭了顽抗的敌人。躲藏在地下室的第二绥靖区参谋长罗辛理等被迫派出代表请求投降。

敌人的最高指挥部投降了，济南宣告全部解放。原来预定20天时间，结果只用了8昼夜，便攻克济南，全歼守敌。

为了贯彻毛泽东“攻城打援，分工协作”的指示，解放军在攻打济南的同时，集中了占参战部队半数以上的8个纵队，采取了夹运而阵的部署，在运河东、西设置了多道防御阵地，积极准备阻击和歼灭可能从徐州、商丘、肠山地区北援的敌人。中原野战军也严密地注视着中原战场的敌人，策应济南战役。国民党的援军，虽经蒋介石再三督促，但在解放军打援部队严阵以待的威慑下，迟迟不敢前进。到济南解放时，有的才前进了短短一段路程，有的还在集结。蒋介石的所谓“北援”和“会战”计划彻底破产。

济南守敌最高头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敌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山东省保安司令王耀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第二绥靖区副司令牟中珩等，也都在逃亡路上被解放区军民一一捕获。

这次战役歼灭了国民党 1 个绥靖区司令部、1 个省保安司令部、2 个师部、11 个整旅、2 个总队、5 个团，共毙伤俘敌 8.4 万多人，起义 2 万多人，俘虏敌人旅级以上军官 23 名。

济南战役的伟大胜利，严重地打击了蒋介石的“重点防御”计划，动摇了国民党据守大城市进行顽抗的信心；锻炼和加强了解放军的力量，特别是攻坚能力。基本上解放了山东全境，从而控制了胶济铁路和津浦铁路北段，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完全联成一片，解放区后方更加巩固，生产建设和支援战争的力量都大大增强。这一切，都为伟大的战略决战——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在济南战役中，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制定的“攻城打援，分工协作”的作战方针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济南守敌虽已处于孤立地位，但兵力较多，工事坚固，有较强的防御能力，徐州附近又有敌人的 3 个机动兵团，随时可以北援。如果我们只顾攻城，那就很有可能在城还没有攻克之时敌人的援兵就已到达，攻城计划就会落空。我们把攻城与打援阻援结合起来，就可以应付自如，始终处于主动地位；而迫使敌人处于守城者无力守住，层层崩溃，增援者犹豫徘徊，不敢放胆赴援的被动局面，从而把济南战役的胜利放在一个稳妥的基础上，正是：攻济打援各有兵，守敌援军两哀鸣。

太原城下巧攻坚 提前拖后各有缘

1948年10月5日至1949年1月24日，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由徐向前具体指挥，我华北野战部队进行了太原战役。这个战役共歼敌12.4万多人，俘敌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楚及太原防守司令王靖国等，解放了山西省会太原，从而结束了封建军阀阎锡山对山西人民近40年的反动统治。

1948年7月晋中战役的胜利，进一步鼓舞了我军的士气，我参战部队接着便直逼太原，将阎锡山的残部压缩至太原及其近郊的狭小地区。这时，山西省除太原和大同外，广大地区均告解放，太原敌军已陷入极端孤立的境地。

太原位于晋中平原北部，濒汾河东岸。城南、北地形稍有起伏，城东5公里有罕山，地形复杂而隐蔽，并高出太原城500米，可俯瞰全城，为太原主要屏障。汾河以西6公里有石千峰一线高地。城南武宿和城北新城有机场，是敌人获取外援的主要途径。

蒋介石和阎锡山企图依托太原易守难攻和能够生产自给的工业条件，作困兽之斗。他们除由西安空运1个师另1个团增援外，还抓工人、学生、商人和职员补入军队。经过两个月的整顿补充，共有正规军16个步兵师、3个特种兵师和其他勤务部队，以及一些保安团和民卫军等非正规军，总兵力10万余人，火炮约600门。阎锡山企图利用和依托太原的有利地形，坚固的筑城工事，优势的兵力和装备，与我决战于外围地区，固守太原。因此，在兵力的部署上，除了直属部队驻守城区外，其余部队全都部署在城周围各据点内，从而形成了一个中心防御区和东南西北四个外围防御体系。

1948年7月，我华北野战部队第一兵团等部追歼晋中溃逃之敌后，乘胜逼进太原。16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及时致电徐向前，指出：“……太原已成孤立，我军有提前夺取太原之可能”，你们“全军即位于太原附近休整，并于此次休整中完成攻击太原之准备”。根据这一指示，我军积极进行了夺取太原的战役准备工作，并制定了“围困、瓦解、攻击，逐步削弱，然后一举攻下太原”的作战方针。战役拟于10月18日开始，争取三个月内结束。并向中央军委报告了详细的作战计划。

正在我军进行紧张的战役准备之时，太原守敌却集中9个步兵师，于10月2日脱离筑城地带向南出犯，目的是向外扩张，抢劫粮食，并破坏我军的战役准备工作。敌情的变化在我准备工作不充分的情况下对我不利的，但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敌人离开巢穴，则便于我野外分割围歼。于是兵团决定提前发起太原战役，首先歼灭出城南犯之敌。这一决定得到中央军委批准后，于4日夜，我第六十、六十一军迅速包围了小店、巩家堡和南畔村等地敌第四十四、四十五师。5日10时至6日9时，我将敌人的两个师歼灭。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得悉后致电徐向前：“歼敌两师甚慰”，“你们现有良好机会可以全歼南面及东面之敌，得手后敌必震动。望你们乘胜扩张，逐一全歼外围之敌，占领一切机场。”根据这一指示，我前线部队经过11个昼夜的战斗，突破敌人南面的防线并向纵深推进约6公里，完全占领了南机场，以火力控制了北机场，在东面打开了敌军防御体系的缺口。为进一步扩张，兵团决心乘东面敌军防御薄弱之际夺取东山，以控制和夺取城垣基地。10月17日至19日，我第七军占领敌人的防御要点牛驼，其他部队也相继占领了敌人的一些据点。敌人为夺回牛驼，在炮火的支援下，连续多次进行猛烈反扑，由于阵地被毁，我军只得于21日下午暂时撤出牛驼。此时，由于马庄和双塔寺一线敌人的工事坚固，不宜作为攻城的主要突击方向，所以我军

决心继续夺取东山山麓的牛驼、淖马、小窑头和山头敌军东面一线屏障，然后从东面攻城。自 10 月 26 日开始，经 19 个昼夜的连续攻击，完全占领了牛驼、小窑头、淖马和山头四个要点。就在我攻打这四个要点的日日夜夜里，敌人乘机在汾河西岸西铭附近构筑了临时机场，使敌人得以再从榆林空运第八十三师来援。加上敌人的第三十军军长黄樵松准备起义未成，这就给我们夺取太原增加了新的困难。

这时，全国军事形势愈来愈有利于我，不利于敌，华北我军主力和东北入关部队，即将发起平津战役。为防止北平、天津、张家口和唐山之敌逃跑，以利于我军就地歼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及时电示徐向前等：“估计到太原攻克过早，有使傅作义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平、津、张、唐南撤或分别向西向南撤退，增加尔后歼灭的困难，请你们考虑……再打一二星期，将外围要点攻占若干，并确实控制机场，即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待明年一月上旬东北我军入关攻击平、津时，你们再攻太原。”根据这一指示精神，我军即暂缓进攻城垣，只继续夺占必要要点，控制南北机场。为彻底切断敌人空中外援，我军于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 日，占领了西铭临时机场周围的一些要点，以便对机场进行火力控制。此后转入围困，并向守敌展开了广泛的政治攻势。至此，战役第一阶段以歼敌 3.4 万余人胜利结束。

1949 年 3 月，太原敌军为增强其防御，除得到空运第八十三师增援外，又慌忙将保安团、民卫军和警察补入正规军，并以第四十四师和第八、九总队残部为基础，强征厂部分工人、学生、商人和职员，编成“铁血”师、“神勇”师和“坚贞”师。另编成第十、十五两个兵团部，仍保留 6 个军部 16 个步兵师和 3 个特种兵师，共有各种火炮约 900 门。同时，重新调整了部署，划分为北、西、南、东北和东南五个防御地域据守太原。

平津战役结束之后，我华北野战部队第十九、二十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炮兵第一师，于 1949 年 3 月底迅速开到太原前线，连同久围太原的第十八兵团等部共约 30 万人，准备会攻太原。为统一指挥太原前线作战，中央军委决定组成党的总前委和前线司令部，徐向前分别担任书记和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根据敌人把主要兵力配置于城外第一线阵地，企图依靠集团堡垒和强大火力与我外围决战的特点，我太原前线司令部决心以全力首先攻歼敌军主力于外围，然后攻城垣和市区，并对各部队规定了攻击任务。在攻击准备期间，我军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 1949 年 4 月 3 日关于“注意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如有接洽机会应利用之”的指示，多次向敌人劝告，按照北平方式解决太原问题，但均被守敌所拒绝。

1949 年 4 月 20 日，太原战役第二阶段的进攻正式发起。在城东北，我第二十兵团 1 个军突破丈子头，迅速西进，占领了新城以南的北机场；另有 1 个军的兵力，由兰村沿汾河两岸向南攻击，直插北机场以西的汾河铁桥，配合由丈子头西进之军，切断了北机场以北之敌的退路，另有西北第七军 1 个师配合第二十兵团，同时攻占了牛驼（城东北），进而向黄家坟之敌进攻，并钳制该敌，在城西，我第十九兵团和晋中军区部队，一路于汾河以西接连突破各据点，迅速进至万柏林地区，与由此向南插的 1 个师会合，切断了汾河以西敌人的退路，并将其包围；另一路于汾河以东突破杨家堡防线，攻占东西寇庄等地，并切断了双塔寺与太原城的联系。同时，我第十八兵团一部在城东南肃清了双塔寺以南以东之敌，进而占领城南面粉公司等地。在城东，

我第十八兵团主力和西北野战军第七军主力，连续攻占城东的剪子湾、仓库区等地，进而又攻占黑土港、大东关等地。到4月21日18时，城周围除双塔寺和黄家坟两个据点，尚在敌人手里之外，其余全部被肃清，我军各部均逼至太原城下，并积极进行攻城之具体准备工作。4月22日9时，敌人的双塔寺和黄家坟两个孤立据点分别被我攻克。至此，城外敌人全部被肃清，共有13个师被我歼灭。

太原敌军在外围兵力被歼后，残部慌忙调整部署，企图据守城垣作最后挣扎。为迅速攻占城垣，我军也根据情况变更了部署，组织协同，并构筑了进攻阵地。同时，又向守敌提出和平解决太原问题的劝告，但敌人一意孤行，决心顽抗到底。于是，4月24日5时30分，我军分为十二路，在强大炮兵火力的支援下，从东、西、南、北四面同时发起总攻，到6时30分均突破敌人防线，突入市区。战斗到10时结束，全歼守敌，太原遂告解放。

在太原战役中，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奠定了我军胜利的基础。这个战役是在我军在各个战场正在进行战略决战的三个最大战役的时间内进行的，毛泽东一面指挥其三大战役，一面安排着太原战役，充分显示了他非凡的军事才能。“有提前夺取太原之可能”，是毛泽东通过客观分析，作出的预言，而最后战役的胜利证明了他的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当时，我华北野战部队刚进行了晋中战役，很需要进行休整，如何解决休整与夺取太原的矛盾呢？“在休整中完成攻击太原之准备”，这实在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在我歼敌两个师后，“乘胜扩张，逐一全歼外围之敌，占领一切机场。”这样就陷太原残敌于绝境。在我大军兵临城下，太原能迅速攻克的情况下，又要拖后攻击太原，这是因为“太原攻克过早，有使傅作义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平、津、张、唐南撤或分别向西南撤退，增加尔后歼灭的困难”，因此，命令太原前线待“东北我军人关攻击平津时”，再攻太原。“提前”包围太原，是为了及时捕捉战机，而拖后攻克太原，又为了照应平津战役，因此，提前与拖后，都显示了毛泽东卓越的军事艺术才能，这是一般军事家所办不到的。

战略决战方向明 东北战场克群雄

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毛泽东及时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指挥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战略决战。三大战役，共歼敌 154 万余人，使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基本归于消灭，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而这三大战役的第一个战役便是辽沈战役。

在决战前夕，战争双方军事力量对比进一步发生了有利于解放军的变化。到 1948 年秋，人民解放军已增加到 280 万人，经过新式整军运动和实际战争的锻炼，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大大提高。人民解放军从敌人手中缴获了大量的现代化武器和装备，建立了炮兵和工兵，提高了攻坚能力，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解放区的面积已发展到占全国的四分之一，人口占三分之二以上。经过土地改革，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后方更加巩固，人民解放军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支援。

国民党军队这时虽然仍有 365 万人，但第一线兵力只有 170 余万人，而且大部分受到过解放军的歼灭性打击，士气低落，战斗力下降。这时敌人已经被迫放弃“全面防御”计划，而进行所谓“重点防御”，企图以他们现有的兵力和工事，固守战略重要点线。他们以精锐部队为核心，兵力靠拢，涸集一团，妄图使人民解放军“吃不掉，啃不烂”。这时敌人有 5 个战略集团，分别被牵制在 5 个战场上。东北战场为卫立煌集团，共 55 万余人，分布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依靠北宁线的锦、榆段作为他们和关内水、陆联系的通路。华北战场为傅作义集团，共 60 余万人，分布于张家口、北平、天津、唐山、山海关等要点，依靠塘沽港作为他们海上补给的通路；太原孤城的守敌，已被围困。华东战场为刘峙集团，共 60 余万人，集中在以徐州为中心的的地区。中原战场为白崇禧集团，共约 75 万人，分布于平汉线南段以及汉口为中心的的地区。西北战场为胡宗南集团，约 30 万人，分布于以西安为中心的的关中地区。除上述五个战场外，敌人后方的军队约 23 万余人，由于人民游击战争的发展，很难机动。这种敌我力量对比的形势表明，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要大量歼灭敌人，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政府，人民解放军就必须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必须同敌人的强大机动兵团作战。因此，敢不敢打我军从来没有打过的大仗，敢不敢攻克敌人的大城市，敢不敢歼灭敌军的强大集团，敢不敢夺取更大的胜利，已经成为我军当时战略决策上的重大问题。就在这时候，国民党 1948 年 8 月南京军事会议曾谋划撤退东北、确保华中、经营华南，但仍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这时候，如果让敌人实现他们把现有兵力撤至关内或江南的计划，就会给我军以后的作战增加麻烦。如果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决策逃跑之前，我们当机立断，抓住大好时机，

组织战略决战，就可以各个消灭敌人的强大战略集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泽东根据对战争形势的科学分析，毅然决然地决定抓住这个决战时机，组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毛泽东在紧紧地抓住决战时机的同时，又正确地选择了在东北战场首先进行战略决战的决战方向。当时全国各战场虽然都有利于解放军的作战，但敌人在战略上却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立要点的的时间，牵制东北人民解放军不能入关作战；同时敌人又准备把东北敌军撤至华中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军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北战场，则会受到华北、东北敌人的两大战略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如果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敌

人迅速撤退，而实现他们的战略收缩企图。只有首先将东北之敌就地歼灭，才能粉碎敌人战略收缩的企图，又能使人民解放军获得战略上的总后方，有利于东北野战军实施战略机动，支援华北、华东战场上的作战。另一方面，东北战场的形势对我又特别有利。敌人有正规军 48 万人，我主力部队连同地方武装共有 70 余万人，敌人孤立分散，补给困难，我地区广阔，关内各区均可支援。毛泽东将战略决战方向，首先指向东北战场的卫立煌集团，这就将战略决战的初战胜利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战争指挥艺术。

在辽沈战役开始前，东北战场敌人据守于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我军进攻的主要方向应首先指向哪里，是关系到全局的关键问题。从局部看，长春孤敌，为我久困，是东北战场敌人的弱点，消灭该敌比较容易，同时也可以解除我们的后顾之忧。但敌人却企图以长春来牵制我军，掩护沈阳、锦州之敌改善态势，并且进行撤退的一切准备工作。我军如先攻长春，便正中敌人下怀；而攻克长春，又会吓跑沈阳、锦州之敌，影响战役和全国战局的发展。锦州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虽然锦州的敌人比长春多，但锦州至山海关段上各点的敌军，孤立分散，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在北宁线上作战，可以吸引长春、沈阳的敌军来援，有利于战役发展；还可分割敌人在华北战场和东北战场的两大战略集团，华北敌军的增援则将因我华北解放军的牵制而削弱。锦州是东北敌军通向关内的咽喉之地，打下锦州这一战略要地，就关闭了东北的大门，形成了“瓮中捉鳖”“关门打狗”之势，而且控制了北宁线，更有利于我军向两翼机动作战。因此，从本质而言，锦州是敌人的致命弱点。毛泽东在《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中要求东北野战军“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同时又指出，攻克锦州是战役胜利的关键，要求“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辽沈战役是完全按照毛泽东制定的作战方针和部署进行的，当时，东北人民解放军除以 1 个纵队和 7 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之敌外，以 6 个纵队和 1 个炮兵纵队、1 个坦克营围攻锦州，另以两个纵队配置于锦州西南的塔山、高桥地区，3 个纵队配置于黑山、大虎山、彰武地区，分别阻击由锦西、葫芦岛方向和沈阳方向救援锦州之敌。锦州地区的作战是 9 月 12 日开始的。正当我军攻克义县，扫清锦州外围时，蒋介石慌忙飞到东北亲自指挥，嚷叫“东北局势好坏，就在锦州一战”。并急调北宁线华北“剿总”的 5 个师和山东的 2 个师来援，连同原来在锦西的 4 个师，共 11 个师，于 10 月 10 日起向我塔山阵地猛攻，但始终未能突破我军阵地。廖耀湘兵团（国民党第九兵团）11 个师又 3 个骑兵旅由沈阳驰援锦州，被我阻击在黑山、大虎山东北地区。

10 月 14 日 10 时 15 分，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对锦州发起了总攻。首先是炮火准备，顿时炮声怒吼，震耳欲聋。敌人的汽油库爆炸了，霎时间烈火熊熊浓烟滚滚，卷过半城：弥漫天空，太阳立刻暗淡无光。炮弹落在城垣上，掀起了泥土和石块，摧毁了钢筋水泥工事，炸开了缺口。尖刀连的战士跳出战壕，向小凌河飞快奔去。他们涉过齐胸深的河水，奋勇向前。我后续部队也迅速突破了敌人的前沿主要阵地。

敌人把小凌河当作守护锦州城的重要屏障，因此，极力阻止我过河。敌

机在小凌河上投着炸弹，掀起高大的水柱；敌人的机枪扫射着河面，溅起成串水花。我指战员不顾弹片纷飞，在我军火力的掩护下，爬上了陡峭的河岸。敌人从两旁的暗堡里猛烈射击。我英勇的指战员奋不顾身，在敌人的交叉火网下，托着炸药和鞭炮筒向暗堡匍匐前进。霎时间，敌人的暗堡化为一片灰尘。

10时28分，九纵左翼师尖刀连已从南门侧面登上了突破口。敌人疯狂反扑，企图作垂死挣扎。我军尖刀连的战士们奋勇还击，打退了敌人七次冲锋。敌人越来越多，从一个排增加到一个营，堵住了突破口。战士们同敌人展开肉搏战，刺刀打弯了，用枪托打，用石块砸，使得敌人尸满突破口，终于杀开一条血路，继续前进；我军炮火实施拦阻射击，护送战士们一步一步向敌人纵深发展。在战斗中，各级指挥员亲临火线指挥，九纵的两个主攻师刚刚各进去一个多营，师级干部便跟着进了城。

虽然我军已冲进城去，但顽固的敌人仍然利用地形地物拼命抵抗。他们预先在每个街口都设了地堡群和沙袋工事，组织了交叉火力，能够互相支援。他们把抢来的门板、铺板、桌椅等物，堆在街道中间；在每条重要的道路上，都预先埋了地雷；利用每一座大楼、每个窗口，喷射着恶毒的火焰，企图阻挡我军前进。

但敌人无论怎样也休想阻止一往无前的战士们的脚步，地雷一个个被查出，地堡一个个被攻克。突破入城的各路纵队同时迅速向前推进。

敌人的部署被我军完全打乱了，通讯联系也中断了。

天色渐渐黑下来，但城内依然是鏖战正激。爆破声、枪炮声、喊话声此起彼伏。

这时的东北“剿总”中将副司令范汉杰再也无心指挥手下的一帮残兵，而是在苦苦地思索着逃跑之路。夜间10时，九纵左翼师攻到敌六兵团司令部附近。右翼师一个团由欢乐街向牡丹街、富和街、国和街猛力发展，打退敌人多次反击；另一团切断了敌六兵团司令部之退路，并包围了铁路管理局。

夜12时，敌六兵团司令部以猛烈的炮火，阻挡了我一个团；又在离兵团部以东300米远的陆军医院大红楼，阻挡了我向敌侧翼迂回的另一个团。

我军战士组织突击组、火力组、爆破组，使用了大量的黄色炸药，连续炸破了9个地堡、12道铁丝网，冲进大红楼，将敌全歼。

不久，敌六兵团司令部便被我包围，几支赶到的部队互相配合同时向敌人展开攻击，终于在凌晨4时10分攻克了这一核心据点，全歼守敌。

就在锦州城内打得火热的时候，范汉杰化了装带着一帮人趁黑夜溜出城去，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被我在山口担任警戒的战士活捉。同时被活捉的还有国民党中将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少将政训主任方济宽等。范汉杰这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在惨败面前不得不承认我军战略指挥上的英明，他说：“贵军神机妙算，弃长春，舍沈阳，突然闪击锦州，扼住我军战略咽喉重地，乃出我军意料之外。锦州，犹如一条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负华北，贵军夺下锦州，恰好象从中间折断扁担，使东北与华北分离，棋着厉害。但贵军孤军深入，非雄才大略之人，不敢作此贸然行动……”

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东北战局沿着毛泽东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迅速发展。锦州10万守敌在31小时内全部就歼以后，长春守敌一部起义，其余全部投降。此时，东北国民党军全军覆灭的命运，已成定局，但蒋介石仍然梦想夺回锦州，打开关内外的联络，严令廖耀湘兵团继续

向锦州前进。东北人民解放军在攻占锦州后，就立即向东北方面回师，从黑山、大虎山南北两翼合围廖耀湘兵团。10月26日将廖兵团包围于黑山、大虎山、新民地区，经过两日一夜的激战，全部歼灭该敌，俘虏敌兵团司令廖耀湘、军长李涛、白凤武、郑庭笈以下10万余人，我军乘胜猛追，11月2日解放沈阳、营口，再歼敌14.9万余人。至此，解放了东北全境。

辽沈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到11月2日，共历时52天，歼敌47万余人。经过辽沈战役，中国的军事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战争的双方力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也已超过了国民党军队。敌人总兵力下降到290万人，解放军总兵力增至300余万人。这一变化使五年胜利的预计进程大为缩短。

辽沈战役开始前，在敌人的兵力还处于优势的情况下，毛泽东就下决心向国民党的战略集团开战，表现了他那卓越的无产阶级军事家的宏伟气魄。而把决战方向选在东北战场，则显示了他胸怀全局、高瞻远瞩的雄才大略。

毛泽东为辽沈战役制定的“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的作战方针，规定了战役的主攻方向，抓住了战略和战役枢纽。从战略上看，我军把主攻方向指向锦州及其附近诸点，是对东北卫立煌集团和华北傅作义集团的中间突破。攻克锦州，隔断了东北、华北两敌的联系，使之成为两个孤立的集团，并关闭了东北敌军撤向华北的大门，造成了“关门打狗之势”。从战役上看，我军攻克锦州以后，可以向两翼侧动，不但掌握了战略主动权，而且能取得战役主动权。锦州是联结东北与华北的枢纽，是东北通向关内的咽喉。攻锦不但能引起长春守敌的恐慌，而且能吸引沈阳之敌大举增援，从而创造在野战中大量歼灭援敌的战机。应当说，这个方针是一个无比英明的方针。

在这个战役中，毛泽东把歼灭战原则首次用于战略范围，是对我军军事学术的一个发展。

辽沈战役战场宽阔，兵力众多，情况非常复杂。毛泽东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指示东北我军因地制宜地采取了奔袭战、攻坚战、运动战、阵地防御战和运动防御战等战斗形式。各种战斗形式的综合运用，为以后组织实施大型歼灭战积累了丰富经验。

可以说，在指挥辽沈战役中，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已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地，他的卓越的统帅才能已达到“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高度。

千军万马战淮海 运筹帷幄展英才

正当辽沈战役方兴未艾之时，毛泽东抓住有利时机，又立即部署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三个有决定意义的最大战役之一——淮海战役。

当时，由于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蒋介石反动集团不得不采取以退为守的战略，把部队龟缩成几团。在徐州方面，以刘峙为首，集结了邱清泉、李弥、黄伯韬、孙元良、个兵团以及刘汝明、李延年两个绥靖区的部队，沿陇海线布防于徐州两翼，并以第三绥靖区冯治安的五十九军、七十七军置于徐州东北地区，妄图守住中原，屏障南京。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要求中原、华东全体军民与敌人进行战略决战，分批歼灭徐州地区之敌，不让敌人主力退据江南，以影响今后我军横渡长江、解放全国的进程。10月11日，发出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我华东野战军遵照毛泽东“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的指示，根据“攻济打援”原则，首先集中以7个纵队向新安镇、阿湖地区的黄伯韬兵团突击；以3个纵队南北对进向运河车站方向突击，割裂黄伯韬、李弥兵团的联系；以3个纵队攻占韩庄、台儿庄，促使冯治安部起义，尔后直出陇海线，阻击可能由徐州东援的敌人；以两个纵队从两面侧击徐

州。

与此同时，我中原野战军主力向徐州、蚌埠段津浦路突击，攻占宿县，切断徐州之敌向南的联系，孤立徐州，保障初战胜利。

徐州，南屏京（南京）、沪（上海），北通冀、鲁，为华北、华中的交通枢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当蒋介石发现我华野、中野大军纵横驰骋津浦、陇海、平汉线之间时，便决定把所有可能集中的兵力蜡缩于徐州地区，准备全力与我决战，进行垂死挣扎。

由于战局迅速发展，敌军主力都向徐州集中，毛泽东曾指示：第一仗力争歼灭黄伯韬、李弥等21至22个师，如果能够完成这项任务，整个形势即将改变，华野、中野即有可能向徐蚌线迫近。如果敌人不将徐州及附近的兵力撤至蚌埠以南，我们就可以打第二仗歼灭黄维、邱清泉，使徐州的敌人完全孤立起来。根据情况变化，毛泽东又调整了部署，由陈毅、邓小平直接指挥中野4个纵队出宿县，截断宿蚌路；华野两个纵队于萧县地区从南面向黄口、徐州线攻击，以便与宿县中野部队联结，如果徐州敌人向南退却，就集中6个纵队将他们歼灭。华野以3个纵队由北向南，1个纵队由南向北，以全力向李弥兵团攻击，控制徐州运河车站间的铁路，运河以东的主力则歼灭黄伯韬兵团。这样就把蒋介石的兵力割裂开来，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并占领徐州。

华野与中野主力，根据毛泽东的意图，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从徐州东、南、西、北几个方向同时发起攻击。华野13个纵队从山东境内齐头向南挺进，横扫陇海铁路北侧300里广大地区的敌军阵地，苏北兵团3个纵队则由徐州东南向西北攻击。几个晚上将敌人分割成为互不联系的好几块，东面的黄伯韬兵团被我包围。黄伯韬不敢应战，仓皇西逃，企图靠拢徐州。

我主要突击集团勇猛追击，逢山过山，遇水过水，不怕饥寒，不畏艰苦，人不歇脚，马不停蹄。

经过三天冲击，逃敌被我歼灭近两万人。黄伯韬部逃过运河西岸，准备继续西逃。殊不料往徐州的去路已被我山东兵团截断，而我追击部队迅速渡

过运河。终于在 11 月 11 日这一天，将黄伯韬所率几万逃兵前堵后追，全部包围在徐州以东的碾庄地区。

11 月 11 日，碾庄攻坚战开始了！

我军根据毛泽东“必须力求调动敌人打运动战，但同时必须极大地注意学习阵地攻坚战术”的指示，采取了“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的战法，发扬我军夜战的特点，利用夜间对壕作业，隐蔽接近敌人，插入各村之间，加强侦察，充分准备，集中兵力兵器，逐个夺取，逐个歼灭。

位于包围圈西部的敌一军和位于南部的敌四十四军，战斗力比较薄弱，经过 4 天的战斗，即被我全部歼灭。敌二十五军和六十四军也被我打得焦头烂额，伤亡过半。

19 日傍晚，我对敌兵团司令部所在地碾庄圩发动总攻。经过一夜激烈战斗，20 日凌晨 5 时，碾庄圩被我全部攻占，歼灭敌人的兵团部及二十五军军部，俘虏敌人 1 万多名。黄伯韬东逃至大院上，继续负隅顽抗，但终于没有逃脱败亡的下场。至 22 日黄昏，经过 17 天运动战和阵地战，蒋介石嫡系的第七兵团黄伯韬部 4 个军及其指挥下的第九绥靖区 1 个军，共 10 个师，约近 10 万人，至此即宣告全军覆灭。

为保障碾庄地区全歼黄伯韬，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徐州以东、以南，我强大的阻援与打援部队进行了英勇顽强的阵地防御。

为了挽救黄伯韬，蒋介石一而再、再而三地命令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杜幸明全力驰援，兼程前进。于是，徐州“剿总”以其所谓主力军邱清泉兵团，加上李弥兵团，共 5 个军，在 20 架飞机、百余辆坦克、百余门重炮的掩护配合下，沿陇海铁路两侧向东增援。同时，以孙元良兵团增防徐州，令平汉铁路上的黄维兵团迅速向徐州、宿县一线前进。

我徐州东侧阻援部队一面以 3 个纵队正面顽强阻击，一面以 5 个纵队侧击徐州，威胁敌人翼侧。到黄伯韬被我全部围歼时，邱、李兵团虽然付出了万余人、30 余辆坦克的重大代价，但仍被阻在距离碾庄地区 50 余华里之外的大许家一线。蒋介石眼睁睁地看着黄伯韬兵团覆没，无可奈何。

在两大野战军的密切配合下，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胜利了。

初战既败，徐州守敌恐慌万分，为预防重蹈黄伯韬的覆辙，迅速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 3 个兵团紧缩徐州，加强防御，不敢轻举妄动。南线李延年兵团遭到我严重打击后，唯恐被歼，迟迟不敢北进。而这时，黄维兵团已进入我中原野战军预设的“口袋”中了。

毛泽东根据战局发展的有利形势，决定乘胜扩大战果，采取南北堵中间围歼的方针，以中原野战军为主，华东野战军一部配合，围歼黄维兵团，毛泽东特别指出，在黄维兵团被围之后，徐州敌人可能倾巢南逃。他重申歼灭敌人主力于长江以北的决心，指示总前委和华野要对此作出妥善的部署，以便贯彻“分割敌人，各个歼灭敌人，坚决不让敌人跑掉”的既定方针。

11 月 25 日，中原野战军在双堆集地区完成对黄维兵团的合围，华东野战军主力一部进逼任桥、固镇。蒋介石此时却错误地判断我军可能先聚歼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所以命令这两个兵团于 26 日星夜南撤蚌埠，据守淮河，阻止我军继续南下，并同时令黄维兵团向蚌埠靠拢，令徐州杜幸明放弃徐州倾巢南窜，策应其行动。他仍然在做“守江必固淮”的好梦。

在中原野战军的铜墙铁壁似的合围之下，黄维已碰得头破血流，到 28 日再也不敢想“突围”了。徐州之敌连续向南猛攻 7 天，仍被我军阻滞在四堡以北地区。我华野

另一部追击南逃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歼其一部。蒋介石这时急召杜幸明到南京密商，让其避开我津浦路防御正面，从徐州西南绕道南下。同时又令徐州“剿总”司令刘峙飞返蚌埠，另组指挥所，督李、刘兵团再次北犯。企图南北对进，攻击我中原野战军侧背，解黄维兵团之围，尔后合伙南逃，以保存力量。

12 月 1 日夜晚，杜幸明派杂牌军孙元良、李弥两兵团打头阵，以王牌邱清泉兵团殿后，共率 27 万人马弃守徐州，向西南狼狈逃窜。

我华东野战军立即命令南线机动兵团进行追击。我强大解放军对溃窜的敌人实行平行追击，多层拦击，多处兜捕，经过 3 天猛烈追击，终于在 12 月 4 日拂晓，将杜幸明所率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 3 个兵团全部合围在徐州西南 130 华里处的陈官庄地区。孙元良兵团企图突围，被我军全歼，仅孙元良只身逃去。

我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各围住的一大堆敌人，都是建制较完整、兵力很大的精锐兵团。黄维兵团是蒋介石嫡系部队，辖 4 个军，其中有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十八军。杜幸明更是蒋的亲信，两个兵团中也有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蒋介石的所谓五大主力，其御林军七十四师已于山东战场被歼灭，新一军、新六军于东北战场被歼灭；现在就剩下这两个本钱了。蒋介石从空中每天大量接济这两大堆人，空军轮番地向我轰炸袭击，包围圈的敌人在空军的掩护下，以步兵坦克协同，不断向我实施反扑。

毛泽东精辟地分析了当时形势，为加速战役进程，决心采取“集中兵力歼灭黄维兵团，围住杜幸明，阻止李延年”的方针。

6 日晚至 15 日，中原野战军以坚韧不拔、前仆后继、无比勇猛的精神，采取紧缩饿困，“攻占一村，巩固一村”的打法，经过反复争夺，连续对被围敌人实施攻击。虽然敌人猖集一团，以房屋为依托，地堡为骨干，作困兽之斗，并数度在空军掩护下企图向南突围，但已无力阻挡我军总攻的铁锤。经过 20 余天的鏖战，在 12 月 15 日将黄维兵团全部消灭在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敌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吴绍周为我生俘。黄维兵团的被歼，是蒋介石在淮海战场上，继黄伯韬兵团被歼之后遭到的又一次致命打击。它不仅使蒋介石丧失了包括五大主力之一的十八军在内的 12 万精锐之师，而且也最后地孤立了被围在徐州西南的杜幸明集团，造成了我迅速全歼杜集团的大好形势。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胜利，又一次证明了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方针的无比英明和正确。

在第二阶段之初，集结在徐、蚌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与我兵力对比大约是一比一。我军装备还处于劣势。因此，毛泽东指示，第二阶段仍应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既定方针，对敌人 3 个集团应是各个歼灭。遵照这一指示和根据北有杜、邱、李，南有李、刘，中间有黄维，分三路向我军前进的情况，总前委选择了孤立的又是立足未稳、经过中野长期消耗的黄维兵团作为第二阶段作战目标，使用了约 10 个纵队，并以华野主力作围歼黄维的总预备队，在歼灭黄维的主要突击方向上集中了绝对优势的兵力。在保障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灭黄维兵团的前提下，对辅助方向，令华野以保障主要方

向作战和为下一步作战创造有利条件为原则，围困杜幸明集团，堵住李延年兵团，作为中野打黄维兵团的南北屏障。正是由于这种部署，使黄维陷入绝境，而杜幸明、李延年又不能相援，只好眼看着黄维兵团覆灭。

黄维兵团被歼灭后，人民解放军机动的兵力越来越多。蒋介石所下的杜幸明这一着棋，好象围棋一样已成为死子了。我们完全可以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一举将其歼灭。

但是，毛泽东于12月22日指示：只要社部不大举突围，应休息到1月5日左右开始攻击，较为适宜。毛泽东为什么指示围而不攻呢？原来这是毛泽东胸怀全局，从整个战略决战的高度考虑才作出的这一决定。

当时，蒋介石在中原战场上，继黄伯韬兵团覆灭之后，黄维兵团又遭全歼；在华北战场上，平津战役已开始，傅作义所指挥的60多万国民党军队，为东北野战军解放全东北的胜利所震惊，加上大沽与天津之间交通已经全被截断，赶忙收缩兵力，企图海运南逃或西窜绥远。蒋介石在这种情况下，于12月20日要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从速完成江防准备，又指示刘峙将总部不必要人员及笨重辎重适时南运，企图将主力转运到江南预定位置，守备江防。对华北方面的敌军，蒋介石打算“俾万不得已时撤回江南”，派船接运。在国民党部队将要南撤而未实行的时候，我淮海前线与华北战场部队采取“围而不攻”或“隔而不围”的办法，互为呼应，推迟攻击，“缓和”局势，就具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这样可以麻痹敌人，使蒋介石暂不海运平津地区之敌南下，促使他们下决心在江北“拼”下去。这样，我军就有充分的准备时间，以便淮海、平津两战役互相配合，达到大量歼灭敌人的目的。淮海前线暂留杜幸明余部，又好比是扔出一块“鱼饵”，在我们歼击杜幸明战况紧急之际，李延年兵团可能再次北上救援。届时担任南线防御的中野各部，便可诱敌深入，围歼其一部。加上正值严冬，加强对敌围困，可以利用大时进一步造成敌人的困难，我们则可以养精蓄锐，以逸待劳。

杜幸明所率部队被我军围困期间，断草绝粮，饥寒交加，陷入了绝望的深渊。粮食吃完了，后来只好剥树皮、啃马骨头充饥，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状况。

正当包围圈内的敌军处于外无援兵、内无粮弹、日益走向死亡的时候，我解放区的广大人民，和以往支援任何战役一样，不辞一切劳苦，踊跃支援前线，保证我军在大风雪侵袭的严寒季节里，始终粮草充足，兵强马壮。从而也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说过的“人民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的话的无比英明和正确。

我军在围困敌人期间，同时开展了群众性的火线劝降、瓦解敌军的强大的政治攻势。毛泽东亲自为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写了《敦促杜幸明等投降书》的广播稿。从1948年12月16日到1949年1月5日的20天内，敌军相继向我军投诚者就有14000多人，约等于敌军两个师的兵力。

1949年1月初，东北、华北两野战军分割包围傅作义部队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之敌南下的任务已经完成，毛泽东立即命令淮海战场对敌人发起总攻。1月6日15时30分，我军开始了对杜幸明集团阵地的猛烈炮轰，顷刻之间，敌人的地面工事和制高点火力层均在隆隆的炮声中毁灭。

我早已摩拳擦掌的各主攻突击队的爆破手，纷纷跃出工事，在炮弹爆炸烟雾隐蔽下，机智熟练地朝着早已摸透了的爆破点冲去，迅速地将阻碍我步兵前进的大小碉堡一一炸毁。16时，指挥号发出总攻信号，突击部队象锋利

的钢刀一样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勇猛地插向敌人纵深。

激战到 10 日下午，我军摧毁了敌人最后的一个孤守点——刘集。这样，杜聿明的包括王牌新五军在内的“南下兵团”约 20 万人全部覆没，杜聿明也被我军俘获，邱清泉被当场击毙，只有李弥只身化装逃跑了。

淮海战役从 1948 年 11 月 6 日开始，到 1949 年 1 月 10 日结束，历时 65 天。根据毛泽东的计划我中原、华东两野战军及地方部队共歼国民党精锐部队 22 个军 56 个师（内有 4 个半师起义）共 55.5 万人，并击退由南京方面来援的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彻底粉碎了敌人“力争华北，坚守中原，经营华南”的防御计划，至此我华东、中原和华北三个解放区连成一片。它的胜利连同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的胜利，从根本上动摇了蒋介石集团继续盘踞中国大陆的信心，为我军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在淮海战役的指挥中，毛泽东那高超的军事艺术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为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他根据华东战场敌军部署的特点，在兵力的使用上，采取了极为巧妙的部署，指示我军：“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阻击和歼敌一部，以对付邱李两兵团，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从一般情况说来，主要兵力应集中使用攻歼的目标上，毛泽东却在我有足够兵力及敌军兵力集中的情况下，采取了相反的方法，创造性地处理了战役目的和手段既统一而又有区别的辩证关系，灵活地运用了集中兵力的原则，因而顺利地牵制、阻击了徐州敌军强大兵团的东援，取得了歼灭黄伯韬兵团的胜利，切断了敌人海上逃路，为战役尔后的阶段，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为隐蔽我军首先割歼黄伯韬兵团的意图，毛泽东要求我军从四面八方同时展开攻击，既“使各处之敌同时受攻，同时认为自己处于危险境地，互相不能照顾”，又使敌人不能“及时查明我主攻方向”。这样，就为我以后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毛泽东亲自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广播稿，对于瓦解敌军起到了重要作用。

神兵天降围平津 解决方式各不同

当解放战争中三个有决定意义的最大战役的第一个战役辽沈战役刚刚结束，第二大战役淮海战役正酣之时，毛泽东又马上组织了第三大战役——平津战役。可谓是环环相扣，妙不可言。

当时华北战场的敌军，在华北人民解放军的牵制与打击下，又受到了辽沈、淮海两大战役的震撼，已成惊弓之鸟。国民党这时在战略上唯一可能机动的兵力就是华北的部队。因此，蒋介石一方面企图利用这个集团阻止我军南下，以便掩护他们在江南重整军力；一方面又企图诱使这个集团经清沽海运江南，增援华东战场，以解刘峙集团之围或扼守长江，进行垂死挣扎。而这个集团本身当时还有沿平绥线西撤绥远的企图。敌人无论撤退还是收缩，都将对战局的发展不利。因此，不使敌人撤退、不让敌人收缩就成为平津战役的主要关键。毛泽东利用了华北敌军认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后必然进行休整，不能迅速入关的错觉，命令东北人民解放军于辽沈战役结束之后，不进行休整，迅速秘密入关，配合华北人民解放军的两个兵团，出敌不意地对华北敌人实施战略包围，力求将敌人全部就地歼灭。毛泽东在《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因此，在目前两星期内一般应采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为了不使敌人逃跑，又着重指出：“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为了造成敌人的错觉，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的敌军南下，又命令华东战场我军对杜聿明集团残部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的部署，又命令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要点，作好防止敌军向青岛逃跑的准备。这样，就可以稳住敌人，完成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使华北敌人完全陷入收不拢、逃无路的绝境。

根据毛泽东制定的作战方针，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从1948年11月29日至12月21日，首先将敌人分割包围在北平、天津、塘沽、新保安和张家口五个孤立据点上，截住其西窜南逃的通路。

12月22日，人民解放军攻克新保安。24日，解放张家口，歼敌傅作义部“王牌”第三十五军和第十一兵团。

1949年1月14日，我军向天津发起总攻。15日解放天津，活捉敌警备司令陈长捷。

天津东临大海，整个市区被永定、大清、子牙、白河、运河诸水切成许多片断，易守难攻，国民党天津防守司令陈长捷，早从1947年起即开始征调大批人力、物力，增修城防。市区内街垒层层，直达核心区域，构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环绕全城，还挖掘了水深3米、宽5米、长近50公里的护城河，并且把护城河和防御前沿5里内的房屋完全烧毁，遍设碉堡群。陈长捷凭借着所谓“大天津堡垒化”的工事，指靠着深沟高垒、河流障碍，依靠着10个正规师、4个特种兵团及地方部队共13万守备兵力，固守顽抗。

我人民解放军在天津前线集中了绝对优势的兵力5个纵队共22个师，还有野司警卫团及特司大量的炮兵，坦克和工兵，另外，以1个纵队警戒塘沽守敌。

天津是一个南北长、东西窄的城市，敌人的防御特点是：北部“兵力强”；南部“工事强”；中部“皆平常”。我军加强东、西两面的攻击力量，把敌人拦腰截断，就能打敌人的整个防御体系，又能自由地将兵力向两翼扩展。

关于对天津的攻击，我天津前线指挥部确定了东、西对进，拦腰截断，先南后北，然后分割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的方针。

1月14日10时，我军向拒不投降的天津守敌发起了总攻。刹那间，炮弹呼啸着从头顶飞过去，气浪象暴风。几百门大炮、几千发炮弹倾泻在城墙上、堡垒上、暗堡上。城墙的突破口烟尘滚滚，砖石、泥土飞上半空。城墙摧毁得只剩下一溜漫坡，碉堡、暗堡纷纷倒塌，地雷爆炸，铁丝网节节粉碎。敌人的大炮被我们的炮火压制住，根本不能还击。敌人两架飞机向我阵地飞来，在我高射炮的痛击下拖着两股长串的浓烟坠了下去。

没等我军炮火袭击敌人阵地的时间结束，我一纵左翼主攻师的两个尖刀连便跃出战壕，提前发起了冲击，涌向和平门突破口。

尖刀连提前冲击的行动，牵动了城西主攻的所有部队的行动。前沿战士们，看到尖刀连在城墙上插上了红旗，立即象潮水一样，冲过护城河，涌向突破口。

各主力部队都向天津城垣发起猛攻，城西2个纵队，城东2个纵队，4个主力纵队向天津拦腰杀去。城南1个纵队也在冲击。

各突破口都展开了恶战，在城西和平门城垣两侧的几个突破口，战斗最激烈。敌人被炮弹震昏了，但他们一清醒过来，立刻从残破的地堡里钻出来，向我军反击。在楼房上，在地下室，在各地堡群，敌人反击的队伍涌出来奔向突破口。突破口刺刀闪动，杀声震天。市区敌人坦克也出动了，我军用反坦克炮射击。在和平门内敌人拆毁的房基上，形成一片开阔地。敌人涌过开阔地，我们就用化学迫击炮向那儿轰击。敌人一次又一次反冲锋……

突破口里面的开阔地上堆满了敌人的尸体和散乱的枪支。离突破口不远的房子里，挤满了缴枪的俘虏。后续部队以迂回、包围动作，经小巷转大街，开始分割敌人。向纵深不断推进。

巷战，街垒战，在紧张地进行。枪声、炮声、坦克的轰鸣声响成一片，敌人还在顽固地抵抗。他们从街心的碉堡里喷射出交叉火力，封锁着道路；从高楼顶上掷下手榴弹；从窗口丢出炸药。市区进行着逐屋逐街的争夺战。战士们编成四组一队队形，交替掩护，穿插分割。爆破手爆破碉堡，工兵在墙壁上掏开洞口，开辟道路。

一纵副司令员曹里怀和左翼主攻师师长贺东生乘坐坦克到战斗最激烈的前面去指挥，他们的坦克开到一幢大楼跟前，发现步兵正分队包围着大楼向前猛攻。大楼里的敌人凭借坚实的钢筋水泥墙壁，继续顽抗，我们的战士送上炸药去炸，炸不动，一见自己的坦克来了，高兴极了。曹里怀和贺东生本来是到前面指挥的，看到这种情况，立刻指示坦克为步兵们开路。他们坐在舱内，让坦克往大楼上撞击。坦克冲一下，退一下，猛然又冲一下。几阵猛烈的撞击，终于把大楼撞开一个大窟窿，步兵们欢呼着随坦克冲进了大楼。

在我军西路两个纵队攻占敌人第一线阵地金汤桥一带不久，东路两个纵队也杀开了民权门，东、西两路在金汤桥会师。从此，天津守敌被分割成数块，陷于极度混乱状态中。从天津南面攻坚的一个纵队，也早从南面突破。我各路大军乘势穿插、分散追捕，火速席卷全城，在15日8时攻占了敌人最有力的支撑点海光寺。一纵右翼主攻师，在15日拂晓首先打到天津警备司令部，敌我双方利用院内的墙角、沙袋，展开激烈的拼杀战，逐屋争夺，从院内打到屋内，从楼下打到楼上，抓了大批俘虏。后来，战士们冲进地下室，活捉了天津警备司令官陈长捷。

就这样，经过 29 个小时的战斗，陈长捷自以为固若金汤的天津城即被我大军攻破，他的 13 万人全部被歼。这个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第一次回到人民的怀抱。天津战役的胜利，展示了我军强大的军事威力，教训了傅作义及其他国民党残余军队，如果他们执迷不悟，继续坚决与人民为敌，必将在人民解放军的铁锤下彻底毁灭。

天津战役结束后，我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共 90 万大军，兵临北平城下，将 20 万守敌团团围住。我们把炮兵全部集中起来，敌人惧怕的具有强大摧毁力的一五五大炮，对准了北平城墙。在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我人民解放军向北平守敌发动了政治攻势，与傅作义的代表进行谈判，积极争取守敌接受和平改编，争取和平解放北平。在这个过程中，我全军将士以战备姿态积极进行整训，随时准备攻城。

事实上，早在 1948 年 12 月中旬，我军包围北平的那一天起，傅作义的代表就和我方代表开始接触，进行和平谈判。在政治上，我军一直积极主动地争取和平改编敌军，争取和平解放北平；在军事上，我军丝毫没有松懈，随时准备投入战斗，一旦敌人最后拒绝放下武器，不愿意归向人民，毛泽东主席一声令下，我军就坚决、彻底、全部地把敌人歼灭掉！当然，敌人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它是决不会轻易放下武器的。起初，傅作义依靠着几十万军队和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等城市和战略要地，企图同我军较量一下，进行顽抗；当我东北野战军全部进关以后，他又梦想着卒部跑到绥远、太原或者青岛、上海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所以，和平谈判虽然进行了一个多月，傅作义一直采取敷衍的态度，谈判时断时续，没有结果。我军在全部歼灭了平绥线的敌人以后，毛泽东于 1 月 14 日宣布了八项和平条件，15 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天津，16 日平津前线司令部向傅作义送出关于和平解放北平办法的通牒。直到这时，傅作义对和平谈判的态度，才算实际一些了。

最后，傅作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决定接受和平改编。

22 日上午 10 时，北平的国民党部队，按照计划分别从各城门开出，到指定地点集结。正午 12 时，北平广播电台播发了傅作义将军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27 日，守城的国民党部队大部分开出城外。31 日，我一个师入城接替北平守备事宜。

2 月 3 日，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举行轰动世界的北平入城式。

这一天，北平城所有的大街小巷，人山人海，一片欢腾。人们穿红披绿，熙熙攘攘，手里捧着鲜花和彩旗，狂歌欢舞。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热烈欢呼占都的新生！

10 时整，入城式隆重开始。坦克，装甲车、牵引炮车发出震耳的隆隆声，从水定门滚滚而来；随后是全副武装，浩浩荡荡的步兵行列。顷刻之间，欢腾的人群蜂拥而上，有的和战士们激动地拥抱在一起，有的跨上坦克、装甲车和炮车，贴上了花花绿绿的大字标语。鲜花插在英雄们的胸前，彩纸纷纷洒落在英雄们的身上；鞭炮、锣鼓响声连天。人民和战士融合在一起，在这一千多年古老的城市里，第一次欢度盛大的人民的节日。

平津战役从 1948 年 12 月 5 日开始，1949 年 1 月 31 日结束，历时 56 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 52 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至此，蒋介石的精锐部队被消灭殆尽，人民革命已处于全国胜利的前夕。

平津战役，充分展示了毛泽东的高超战争指挥艺术。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淮海战役鏖战正酣，毛泽东便命令参加辽沈战役的东北野战军迅速秘密入

关，配合华北野战军的两个兵团，出其不意对华北敌人实施战略包围。“兵贵神速”和“出敌不意”的军事原则，为一般军事家所熟知，但毛泽东运用之妙，却超乎寻常。“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作战方针，以及延缓华东战场对杜聿明集团残部最后歼灭部署的指示，稳住了华北的敌人，为歼灭和平改编华北敌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真是棋高一着、匠心独运，实在是一般军事家所望尘莫及的。在平津战役中，创造了解决敌军的两种方式，这就是“天津方式”和“北平方式”，在我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劝告平、津守敌接受和平解决，天津守敌陈长捷等拒绝投降，我军便以战斗方式，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了该敌。在天津解放之后，迫使北平守敌不得不接受和平解决的方法，这就使北平这一文化古都以不流血的方式获得解放。天津方式、北平方式以及平津战役之后的绥远方式，对于解决残余敌军发挥了重要作用。用三种方法解决敌军，是毛泽东关于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思想，在敌军主力被歼后的新条件下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和谈阴谋怎能骗 百万雄师下江南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下，国民党为了进行垂死挣扎，又一次玩弄起和谈阴谋。蒋介石要求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但他在1949年元旦发表的文告中，却提出了以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项为全国人民所不能接受的条件为和平谈判的基础。显然，这个建议是虚伪的。蒋介石之所以在这时发表要求和声明，是由于以下几种因素：第一，为了争取喘息时间，以便组织残余军事力量，卷土重来。他在发表求和文告前后，积极进行了战争部署：以其心腹将领汤恩伯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负责长江防务，妄图凭借长江天堑阻挡解放军渡江南进；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警备司令，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同时还拟定了一项利用和谈争取在三至六个月时间内，在长江以南重新编练200万国民党军队的计划。第二，美国的策动和压力，美国眼看蒋介石惨遭败北，众叛亲离，因此，阴谋策动由反动面目尚未暴露或在人民中有某些幻想的人物来代替蒋介石，装扮起和平“面孔”，欺骗人民，借以保存反动势力。同时，利用某些既同反动营垒有联系，又同革命营垒有联系的“自由主义人士”，鼓动他们呼吁和平，并竭力让他们混进革命阵营，组织反对派。第三，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国民党内一些地方系军阀，企图利用对蒋介石的不利形势，取蒋而代之。1948年12月24日，桂系首领之一、国民党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从汉口致电蒋介石，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目的是逼蒋下台。随后，在白崇禧操纵下的湖北省参议会也打电报给蒋介石，要蒋“改弦更张”，“恢复和谈”。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才发了求和文告，以退为进，向我发动和平攻势。

为了揭露美蒋的新的和平欺骗，以及他们策动搞所谓“南北朝”、“三分天下”、“划江而治”的政治阴谋，争取革命的彻底胜利，毛泽东在1949年元旦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里指出，只有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才能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一起掀掉，才能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为真正的独立国，才能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的局面，也才能造成使中国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先决条件。相反，如果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会给反动派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晨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所以，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毛泽东指出，敌人将继续用各种方法力图破坏革命势力，而保存反动势力。他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象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彻底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并向中外宣告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针对蒋介石求和的声明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蒋介石求和的欺骗性、虚伪性。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毛泽东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及任何其他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这样一来，就把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和谈阴谋完全揭穿了。

蒋介石被迫于1月21日宣告“引退”。李宗仁代理南京政府总统后，发表声明，同意以中国共产党所提条件为和谈基础。但是李宗仁的声明也是虚伪的。他企图通过谈判，阻止解放军渡江，与中国共产党划江而治，使桂系掌握半壁河山。而且，蒋介石名曰引退，实则幕后指挥。毛泽东洞察其奸，并且深信，只要人民解放军向着残余的国民党军队再作若干次重大的打击，国民党的统治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但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拒绝这个谈判，这是因为，国民党还有一部分军队，如果它真能（部分地也好）接受八项条件，达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和平解放，使战争时间缩短，人民减少痛苦，地方减少破坏，这是有利于人民革命事业的。况且，部分地区的和平解放也是可能的。如果以后国民党拒绝实行八项条件，那便恰好暴露了他们要求“和平”谈判的欺骗性。

4月1日，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等为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等，在北平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谈判，经过努力拟定了以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的国内和平协定，但是，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在协定上签字。

1949年4月21日，即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的第二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各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和南方各游击区的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当日，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在西起江西的湖口，东至江苏的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分东、西、中三线发起渡江战役。21日，长江风平浪静，我解放大军千船竞发，以摧枯拉朽之势，直取对岸。中路大军首先在芜湖至贵池之间突破敌阵。东路在江阴至镇江间，西路在贵池至彭泽间，也相继登上南岸，仅两天两夜即彻底粉碎了敌人所谓不可超越的“长江防线”。4月23日，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接着，各路大军向南挺进，转入战略追击阶段。5月3日解放杭州，并控制了浙赣线。22日解放南昌。27日攻占全国最大城市上海。在此期间，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于5月14日从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200余里的地段上强渡长江。15日，争取了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在贺胜桥、金口等地起义。16日、17日，先后解放武汉三镇，渡江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歼敌43万余人。接着，各路野战军分别向南方和西北各省挺进，用战斗与和平两种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当年毛泽东曾满怀豪情写下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光辉诗篇，赞扬我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宣告蒋家王朝灭亡的壮举：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在中国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蒋介石一面玩弄和谈阴谋，一面加紧组织残余军事力量，妄图卷土重来。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针锋相

对，采取以谈对谈、以打对打，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的方针，可谓是有理、有利、有节。尽管知道你和我谈毫无诚意，还是与你进行谈判，算得上有理。所谓有利，对于那些对国民党还抱有幻想，受他们和平欺骗的人们是最好的教育。所谓有节，先礼而后兵，做到仁至义尽，你不在和平条约上签字，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在南京政府拒绝签字的第二天，毛泽东、朱德一声令下，我百万雄师便横渡长江天堑，冲破国民党的长江防线，向全国进军。敌人不放下武器，就让他彻底灭亡，这也是以打对打的必然结果。

为国一统定大计 势如破竹扫残敌

1949年五、六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已经夺取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都城南京，并且已经解放了上海、杭州、南昌、武汉、西安等主要城市。我党中央一方面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要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面指示第一、二、三、四野战军，在1949年下半年，继续向西北、西南、东南、华南进军，全部歼灭祖国大陆上的国民党残余军队。

当时在祖国大陆上的国民党残余军队，绝大部分猖獗集在华南和西南。据守广东的是余汉谋集团，据守湖南、广西的是白崇禧集团，据守西南的是胡宗南集团和川、云、贵等省的地方军阀。这几个集团的军队总数还在100万以上，并且互相勾结，组织所谓湘粤联防和西南防线，企图建都广州、重庆，进行顽抗。

必须迅速地歼灭这些残余的敌人。但是怎样去歼灭这些敌人呢？毛泽东在进军的指示中指出，必须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对西南的作战，又强调指出：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这是一个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是一个极为英明的决策。这个方针，和那种赶着敌人，放走敌人，使敌人逃至海外或云贵地区得以负隅顽抗的办法完全不同，因为，这些残余的敌人虽然还有100余万，但是，整个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土崩瓦解，他们是抵抗不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进攻的；在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下，他们很可能逃往海南岛或猖獗集云贵；这样，那就会增加以后解放海南岛和云贵地区的困难。采取大迂回的作战方针，先切断敌人的退路，才能全部、彻底地消灭这些敌人，免遗后患。

怎样来实现这个作战方针呢？毛泽东还精心规划了整个的作战计划：首先以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等部，由江西到广东，争取于10月下半月占领广州，歼灭敌余汉谋集团；然后在11月，第四兵团由广东进入广西南部，迂回白崇禧集团的右侧背，第四野战军主力则进至柳州、桂林地区，形成对白崇禧集团的大包围，同时，第二野战军主力进入贵州，占领贵阳，既切断白崇禧集团和胡宗南集团的联系，防止两敌逃入云贵，又在陕南的十八兵团形成对胡宗南集团的大包围；最后，在12月，第四野战军的主力在第四兵团的配合下，歼灭白崇禧集团，第二野战军主力由贵州迂回川南，在第十八兵团的配合下，歼灭胡宗南集团，而第四兵团则在歼灭白崇禧集团以后，再由广西进军云南，解放云南。

毛泽东所规划的这个作战计划，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周密的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计划，以后战争的发展完全是按照这个计划的顺序、时间和预想进行的。

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要实现大迂回的计划，首先让第四兵团、第十五兵团等部进军广东，歼灭敌余汉谋集团。

余汉谋集团在残余的国民党军队中是较小的一个集团，其正规军有3个兵团共约12万人。在当时大势所趋的情况下，敌人仍然进行垂死挣扎，以苟延残喘，余汉谋集团和白崇禧集团组成了所谓湘粤联防，也就是以湖南衡阳、粤北韶关等为重点布防，企图借以保障两广。我第四野战军根据毛泽东所拟定的作战计划，决定以十二兵团、十三兵团等部在湖南衡阳、宝庆地区发起衡宝战役，寻歼白崇禧集团一部；同时，以四兵团、十五兵团等部攻占韶关等地，然后直下广州，歼灭余汉谋集团，以便下一步全歼白崇禧集团。

9月上旬，第四兵团各部先后开进到江西南部，而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欢呼声中向广东进军。

这时，四野主力已开始衡宝战役，正在围歼白崇禧集团的一部，原在湘粤赣边区布防的白崇禧的另一部被迫北调增援。这样一来，粤北余汉谋的部队就孤立了，其所谓湘粤赣联防就破碎了。因此，当四兵团和十五兵团跨过五岭出现在粤北时，韶关等地的敌人便弃城南逃。敌人弃守韶关等，正好为我军大开了广东门户，四兵团和十五兵团便勇猛追击，迅速向广州前进。

在追击作战中，我两个兵团的指战员发扬了不怕困难勇敢战斗的革命精神，各个部队每天行程130余里。敌人为了阻止我追击，他们在许多桥梁上安放了炸药，准备破坏桥梁，迟滞我军前进。但是大部分还没有爆炸，我们的追兵便赶到了，在那里执行炸桥任务的敌军不是当了俘虏，就是仓皇逃窜。

为了抵抗我军的猛烈进攻，敌人还企图在清远、源潭一线布置防守广州的最后防线，但这种部署还没有完成，又被我们分路追击的部队所击破，部署防御的敌人转而溃逃，广州的敌人也不得不仓皇逃走。14日晚，我们两个兵团进抵广州，提前完成了毛泽东争取于10月下半月占领广州的计划。

当时，余汉谋的3个兵团，除十二和十三兵团已为我军歼灭一部分外，其主力二十一兵团还未遭受打击。必须迅速判明这些敌人的逃向，加以歼灭。

为弄清敌人的逃向，我第四兵团1个军的主力在两岸还有敌人的情况下，顺北江乘船南下，一夜行进160里，直插广州西面的三水、高要等地。这样一来，就卡住了北江、西江的汇合点，控制了由广州到广西的要道；并且在占领三水、高要的战斗中，歼灭了敌人的两个师，查明了敌人的二十一兵团等部是在向雷州半岛逃跑。

10月17日，毛泽东亲自发电指示，要乘胜直追，歼灭逃敌，既便于解放海南岛，又为进入广西歼灭白崇禧集团创造条件。

我第四兵团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以惊人的顽强精神，继续以每天150多里的速度进行了5天的英勇追击，终于在24日，在广东南海边上的阳江、阳春地区追上了逃敌。

逃敌二十一兵团等部共4万余人，当发现我部队追上以后，便将大批辎重和汽车焚毁，夺路向西逃跑。我们追击的先头部队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却毫无犹豫地抢占要点，阻止敌人逃跑，一天之内击退敌人的多次进攻，我们追击的后续部队也逐渐赶到。25日，我军组织了对被围敌人的进攻。敌人为了逃命，在这一天之内，以3个师的兵力向西发动了八次绝望的进攻，但除去尸体越积越多之外，其他毫无进展。于是敌人便转而向南，企图在海横乘船逃跑，我军就势分割包围，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到26日，全部歼灭了敌人，胜利地结束了广东作战。

四野的主力在衡宝战役中歼灭了白崇禧集团一部，陈兵在湘桂边境；四兵团和十五兵团在广东作战中，歼灭了余汉谋集团的主力，四兵团陈兵在广东西部。这就形成了能够南北合击白崇禧集团的有利形势。这种有利形势，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作战计划的英明。

当时退入广西的白崇禧集团还有5个兵团，余汉谋的十三兵团残部也逃入广西，共约17万人。其逃跑的道路，一是西入云贵，一是南逃海外。四野执行毛泽东全歼敌人的计划，决定：以十三兵团为西路，沿黔贵边境迂回前进切断敌人逃往云贵的道路；以四兵团和十五兵团的一部为南路，进入粤桂边境的廉江、茂名、信宜地区，防止敌人向海南逃窜；以十二兵团等部为中

路，首先牵制敌人，便于西路、南路断敌人后路；等西、南两路切断敌人的退路后，即由北向南，围歼敌人。这样就使白崇禧集团陷入我人民解放军的天罗地网之中。

11月上旬，我东、西两路迅速前进。到东路大军到达廉江、信宜一线布防时，西路十三兵团已占领金城江，开始追歼敌人的十六兵团；我中路十二兵团等部已开始进攻，解放了桂林。白崇禧看到中路军步步紧逼，退往云贵的道路也被切断，只有夺路向海南岛逃窜，其实，在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面前，夺路谈何容易。

但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白崇禧只好孤注一掷了，或鱼死，或网破，二者必居其一。为了夺取逃路，白崇禧以第三、第十一兵团为先头，以第一、第十兵团为后继，在逃向廉江以西的余汉谋的第十三兵团残部配合下，向我担任阻击任务的第四兵团发动了猛烈的所谓“南线攻势”。从11月25日开始，敌人以集中的兵力，在飞机的配合下，向我阵地连续猛烈地攻击，拼命夺路。但是，在我指战员勇猛顽强的抵抗下，敌人的每一次进攻都遭到了重大的杀伤，不得不遗尸而退，当敌人的气势开始下降之时，我担任阻击的第四兵团开始反击，从而使进攻夺路的敌人转向了全线溃退。

夺路逃向雷州半岛不成，白崇禧便先乘飞机逃往海南岛，并命令其部队迅速逃向合浦、钦州，乘船逃命。我第四兵团立即沿着粤桂边境和广西的海岸，开始猛烈追击，四野主力也分路兼程南下。

这次追歼战，异常猛烈。部队昼夜不停地前进，许多指战员脚上起了一层一层的泡，不少人腿也肿得老粗；在追歼中一直“马不停蹄”，指战员都没有领到棉衣，在严冬的旷野，翻山越岭地追歼敌人，寒冷异常。但是，指战员以惊人的顽强毅力，战胜疲劳和寒冷，毫不停息地追击敌人。这样，从11月28日到12月1日，我四野部队在第四兵团的配合下，追歼了敌人第三、十一、十三兵团的残敌，活捉了敌华中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三兵团司令张淦，控制了合浦；接着又向钦州急进。我广大指战员继续发扬惊人的顽强精神，翻山涉水，勇猛前进，4天行军600里，敌人前脚刚到，我先头部队便赶到钦州。6日，四野主力在第四兵团一部的配合下，在钦州以北的小董圩、大寺圩地区歼灭了敌人的第一、第十兵团。我第四兵团的另一部围攻了钦州，歼灭了敌华中长官公署。

就这样，按照毛泽东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计划，四野主力在第四兵团的配合下，顺利地全歼了白崇禧集团。

毛泽东在指挥华南和西南的大歼灭战中，曾多次指出不能让白崇禧集团和胡宗南集团退入云南，指出如两敌或两敌之一退入云南，则不仅易于逃向国外，并且由于云南的地理形势，我们不可能派几个兵团入滇作战，歼敌就要时日。因此，毛泽东就十分强调首先夺取贵州，既切断敌人胡宗南与白崇禧两集团之间的联系，又防止了敌人退入云南。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力和第四野战军执行了毛泽东的这些指示，使敌人这两大集团都未能退入云南，这就形了解放云南的有利条件。同时，在党的

领导下，滇桂黔边区纵队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已开创了广大的根据地，武装力量已发展到了3万多人。

1949年12月上旬，敌人的白崇禧集团被歼，胡宗南集团已陷于我二野主力和第十八兵团的夹击之中，卢汉将军在昆明宣布起义。但是，盘踞在云南的国民党第八兵团却继续与人民为敌，企图进占昆明，控制云南。为了打

击敌第八兵团的这种企图，中央军委即令滇桂黔边区纵队结合当地人民，保卫昆明，又令解放贵阳的第五兵团以其一部迅速进入云南支援。

敌人的第八兵团进攻昆明不成，便南下退集于蒙自、个旧地区，控制滇南，准备负隅顽抗。敌人自以为抵抗不成，还可以逃跑，因为拥有蒙自飞机场，况且离国境线不过 100 多里。毛泽东为了歼灭这些敌人，除令驰援昆明的部队暂行停止前进以麻痹敌人外，即令驻百色的四野的一个军以一部速向滇越边境前进，占领金平、河口一线，切断敌人向越南的逃路，又令第四兵团以一部迅速向蒙自前进，协同滇桂黔边区纵队歼灭该敌。这样，毛泽东又布置了一个迂回、包围、歼灭敌人的作战计划。

第四兵团接到毛泽东的命令后，在 1950 年 1 月 1 日派一个军昼夜兼程向蒙自前进。南宁到蒙自约两千里，要翻越许多大山，但部队轻装急进，半个月就到达蒙自，首先袭占了敌人的飞机场，使敌人由空中逃跑的幻想成为泡影。

敌人完全没有料到解放军行动如此神速，他们的陆军副总司令汤尧还刚刚从台湾飞来，准备把其第八兵团的二十六军空运到台湾去。但他的部队还没有飞走，我第四兵团的一个军便从天而降，这就使聚集在蒙自地区准备逃跑的敌人一下子乱了阵脚，纷纷向西、向南逃窜。这个军立即配合已经到达河口的我四野的部队和滇桂黔边区纵队进行追歼，先在个旧、屏边地区歼灭了敌人的二十六军，又向西追击向滇西南逃跑的第八军。

滇西南地区山高路小，形势险峻，易守难攻，大部队行动、作战都十分困难。根据这种情况，追击部队以营、团为单位，分多路追击。经过十几天的艰苦作战，终于在元江、镇沅地区歼灭了敌人的第八军，活捉了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

至此，人民解放军围歼华南、西南的敌人划上了非常圆满的句号。

我军围歼华南、西南敌人的胜利，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战争指导路线的正确，再一次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正是毛泽东为歼灭华南、西南的敌人所确定的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和作战计划，才使得敌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有在人民解放军的天罗地网中束手就擒。如果不是采取这个方针，就不可能这样迅速地歼灭敌人。如果余汉谋集团的主力、白崇禧集团的主力逃到海南岛，就会大大增加解放海南岛的困难；如果白崇禧集团或胡宗南集团逃入云南，也会大大增加解放云南的困难；就是滇南的敌二十六军、第八军，如果大部分跑到台湾或国外，也会造成许多不利影响。正是由于毛泽东胸怀全局，高瞻远瞩，作出英明的战略决策，从而使我军在广东作战、广西作战和滇南作战中，势如破竹力克群雄，进而为我军进一步解放国民党当时仍然占据的地区扫清了障碍。

审时度势谁能比 不拘一格捣“天涯”

1949年12月，两广战役胜利结束，中南地区全部解放，毛泽东及时发出命令：准备解放琼崖。毛泽东特别指示，要在春夏之交解决海南岛问题。

海南岛是南中国的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时已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妄图以舟山、金门、万山、海南诸岛互为犄角，构成一道防卫台湾的海上屏障，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蒋介石任命薛岳为“海南防御总司令”，纠集残敌约10万人，仗着50多艘军舰，30多架飞机，加紧巩固其所谓“陆海空立体防御”，不断派军舰到大陆沿海骚扰破坏，派飞机窜入广州、武汉等地狂轰滥炸，严重地威胁着中国南部的安全。

毛泽东发出及早解放海南岛的命令，这是一个英明的战略决策，早日发起海南战役，可以乘敌立足未稳，打烂其妄图赖以反攻大陆的海上部署，确保我国南方的安全。这对于巩固国防，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解放海南，是我军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渡海作战。雷州半岛至海南岛最短距离为40里。部队登陆需要绕过暗礁及敌火力点，这样，最近距离也有120里左右。当时我军一无渡海作战经验，二无机械化渡海工具，三无海空军支援，面对茫茫大海和敌人的陆海空“立体防御”，打这样的仗确实困难重重。毛泽东在部署攻打海南的电报中明确指出，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作战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毛泽东的指示，透过错综复杂的关系，紧紧抓住了渡海作战的主要矛盾。就当时的条件看，渡海的困难很多，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动员木船，立足现有装备，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可是，林彪却同毛泽东的指示唱反调，不切实际地主张到港澳购买登陆艇和改装机器船，并要求军委准备飞机配合。

毛泽东批驳了林彪的错误主张，指出这次战役有琼崖纵队配合，敌人战斗力差等有利条件，教育大家坚定用木帆船渡海作战的信心。毛泽东的指示，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一个海上练兵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仅用两个多月的时间，部队就基本掌握了潮水、风向的规律，学会了一套海上作战的本领。

为了大举登陆，参战部队首先以一个加强团的兵力从涠洲岛夺得了敌军的400只大帆船，解决了部队当时船只不足的困难。

薛岳发现我准备解放海南的意图后，一面加紧海岸设防，一面调集兵力“围剿”我五指山根据地，增加了琼崖纵队的困难。为加强海南岛我之内应力量，同时为对我们的海练进行一次实战检验和战役侦察，我军决定先组织一个加强营向海南岛偷渡。3月5日黄昏，800名勇士分乘14只战船，顺风扬帆，直扑海南岛。6月14时，潜渡营在海南岛两侧的自马井登陆，海峡天险跨越了！潜渡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战斗情绪，坚定了大家渡海作战的必胜信心。同时也初步显示出毛泽东制定的作战方针的英明。

3月26日晚，我部队又以一个团的兵力组织了第二次偷渡。部队起航时，非常顺利。不料，后来风向突然变化，海上又起了大雾。联络信号失效，大部分船只漂流到敌人正面防御较强的地段，情况极其险恶。但勇士们毫不退缩，他们以猛烈的火力回击着敌人军舰、飞机、陆上的三面阻击，英勇奋战。有的班排是靠单船冲破敌人的严密封锁强行登陆的。全团上岸后，猛打猛冲，先后打垮了敌人10个营的层层堵击，毙伤俘敌800多名，击伤敌舰1艘，击落敌机1架，胜利地进入了五指山根据地。

一只单船也可以登上海南岛的事实，揭开了敌人正面防御的“秘密”，使作战部队看到了解放海南岛的时机已经成熟，坚定了大举登陆的决心。那时对下一步如何打法，有两种主张：一是万船齐发，大举登陆；一是继续组织小型潜渡。其实，毛泽东在下达解放海南作战命令时就明确指示：必须集中一次，运载一个军的全部兵力与三天以上的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巩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进攻，而不要依靠后援。

林彪却顽固地坚持后一种主张，硬是电令部队继续组织小规模偷渡。当时如果按照他的主张去做，必然会贻误战机，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参战部队几次要求抓住有利时机大举登陆，迅速解放海南，林彪都置之不理。是毛泽东亲自批准了渡海作战计划。4月16日，全军齐发，直捣“天涯”。

4月16日，东风拂面，平潮伏流，下午6点半，一声“起航”命令，我东西线部队分乘千百只战船顺风而下，直指海南。船行30余里，敌人的飞机、军舰发现了我船队，拼命向我军轰炸、扫射和炮击。我船队一面还击，一面急速推进，凌晨两点半左右，一片黑乎乎的山峦出现在眼前，这就是战士们日夜盼望的“海南岛”。

敌人拼出全力作“困兽之斗”，岸上、海上、空中的各种火器，一齐向我船队射击。船队离岸还有五、六十米，战士们就跳进齐胸深的海水，勇猛地向岸上扑去。薛岳苦心经营了几个月的“立体防线”，不到1个小时就被突破了。仅用4个小时，我军就全部登陆完毕。部队发扬了连续作战的作风，迅速向敌纵深推进，很快就同接应的潜渡部队和琼崖纵队胜利会师。

第二天午夜，我登陆部队包围了临高城。但不见敌人反扑，不见薛岳早已组织起来的机动部队“围剿”。敌人主力到哪里去了呢？

登陆部队对敌情作了认真分析：根据敌人的部署和行动，薛岳很可能首先集中主力于东线，企图歼灭我东线部队于登陆滩头，然后各个击破。因此登陆部队当机立断，将临高城交给琼纵和潜渡部队继续围困，迫敌投降。我军主力则甩开临高，东进澄迈。部队赶到澄迈以北，就得知澄迈敌人1个师已调往美亭。澄迈方面已结束了隆隆的炮声。我军部队马不停蹄，冒着敌机的轰炸，迅速向美亭急进。原来我东线部队登陆后，马上包围了美亭之敌。薛岳闻讯迅速集中了4个师的兵力对我实施反包围，东线部队腹背受敌，态势非常严峻。西线部队当即分两路采取钳形攻势，以主力将敌人“反反包围”。敌我双方包围，反包围，内线外线，犬牙交错，展开了反复的肉搏战。战斗打得异常残酷。激战持续到23日拂晓，敌人的主力被歼，我东、西两线部队胜利会师。薛岳看到大势已去，急忙于当天下午发出总撤退命令。薛岳乘飞机逃跑，敌人兵败如山倒，溃不成军，拼命逃窜，急急如丧家之狗，惶惶似漏网之鱼。我西、东两线部队相互配合，乘胜追击，势如破竹，歼灭了大量敌人。逃跑的敌六十二军（欠1个团），被我徒步追击部队赶上，不到两个小时就全部被歼灭，副军长罗懋勋被我活捉。半个月的时间，残敌尽扫，全岛解放。

海南战役的实践充分地证明，毛泽东指挥作战，从来都是审时度势，不拘一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立足现有设备，刻苦进行训练，努力提高军事艺术，灵活运用战术和变换战术，有什么敌人打什么仗，有什么地形打什么仗，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这种按照情况活用原则的战争指导艺术，对于今天提高我军的军事艺术，巩固国防，抵御外来侵略，仍有

着重大的意义。

密过江攻敌不备 初入朝旗开得胜

1950年，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百业待兴。而美国武装入侵朝鲜和中国领土台湾，同时把战火燃到了我东北鸭绿江边。面对美国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挑战，毛泽东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决定派志愿军入朝参战。并为志愿军制定了扬长避短的作战原则，指示志愿军要广泛地实施夜间作战和寻机同敌人打运动战，并把敌人飞机对我军活动的妨碍程度和我军利用夜间行动作战的熟练程度，作为争取转变朝鲜战局的决定条件之一。

1950年10月，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的率领下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始了同朝鲜人民军一起打击美国侵略者的斗争。而我志愿军过江后的第一个战役就打了一个漂亮仗。出国前，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示的作战方案是，我军入朝后，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地。第一阶段只打防御战。待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转入攻击。

但是，敌人的进展比我们预计的要快。就在我军10月19日渡江之夜，敌军已占领平壤，并迅速越过了我们预定的防线。由于这时敌人尚未发觉我志愿军入朝，还在继续分路前进，兵力逐渐分散。这种形势的出现，为志愿军利用敌人认为中国出兵可能性很小的判断错误和分兵冒进的弱点，在运动中实施突然袭击，各个歼灭敌人造成了有利条件。

毛泽东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于10月21日电示志愿军放弃原定组织防御的计划，改取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方针。他指示：此时是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后开始作战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毛泽东又几次电示：首战一定要对准态势突出而战斗力较弱的南朝鲜第二军团。第一仗如不准备打东线南朝鲜军，则以第四十二军的1个师置于长津阻敌即够，该军主力则宜放在孟山以南，以便切断元山、平壤间的铁路线，牵制元山、平壤两地之敌，使之不能北援，这样即可集中3个主力军，各个歼灭南朝鲜第二军团之第六、七、八师。他还指示志愿军在打法上以利于主力插到敌人的后面和侧面，全歼敌人原则；要注意诱敌深入山地然后围歼之。并反复叮嘱，敌进甚急，捕捉战机至关重要，迟则恐来不及。

彭德怀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立即集中第四十军集结于温泉以北、北镇以东，待机攻歼南朝鲜第六师于温井西北；第三十九军集结于云山西北，待南朝鲜第一师东援第六师时将其歼灭；第三十八军和第四十二军一二五师集结于熙川以北，准备歼灭南朝鲜第八师；第四十二军主力集结于黄草岭、赴战岭一带，阻敌北进，牵制东线敌人，配合西线作战。同时命令志愿军第五十军、第六十六军入朝参战。

10月25日，西线“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由于未遇到有力的抵抗，便头脑昏昏，便以师甚至以团或营为单位分兵冒进，逐渐逼近志愿军第四十军部队；其先头部队南朝鲜第六师第七团已进至古场洞并继续向鸭绿江边楚山前进。25日凌晨，进至北镇东南的志愿军第一一八师，奉命采取同敌预期遭遇的姿态占领温井以北两水洞至丰下洞东北侧高地，准备伏击向北镇进犯之敌；进至云山以北的第一二师也奉命以其第三六团进占云山东侧的玉女峰等高地，准备坚决阻击从云山向温井北犯之敌。7时左右，南朝鲜第一师

先头部队，以坦克为先导，气势汹汹地沿云山至温井公路北进至志愿军第一二师第三六团阵地前，该团突然开火，敌人猝不及防，遭一顿痛击后落荒逃回云山。

10 时左右，南朝鲜第六师的 1 个营和 1 个炮兵连乘汽车由温井迅速向北镇方向开进。当进到两水洞与丰下洞一带时，志愿军第一一八师第三五四团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一阵激战之后，立即分路冲向公路，将敌人分割成三段。第三五三团的两个营也立即从右翼出击，配合第三五四团的战斗。这股敌人遭此突然打击，顿时乱作一团，火炮未及开架，弹药未及开箱，即被全歼。志愿军一开战就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缩回云山的南朝鲜第一师先头部队经整顿后又发起进攻，企图抢占有利地形，掩护主力继续前进。志愿军第一二师第三六团坚决阻击，战斗十分激烈，多次打退了敌人。

当夜，志愿军第一一八师、第一二师各队以两个团乘胜攻占了温井，并歼敌一部。

志愿军在玉女峰、两水洞及温井所进行的战斗，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鉴于敌军过于分散，志愿军想一仗聚歼敌人两三个师也很困难，彭德怀临机应变，果断决定从 25 日开始以军和师分途歼敌一两个团，求得在第一次战役中以数个战斗歼灭敌人一两个师，制止敌人乱窜，稳定人心。毛泽东当即复电指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

26 日凌晨，第四十军攻占了温井，歼灭南朝鲜第六师一部；29 日拂晓，他们又在龟头洞、立石洞将南朝鲜第六师、第八师各两个营大部歼灭。当晚，又将从楚山回窜的南朝鲜军第七团大部歼灭于古场洞、柳良洞、龙谷洞地区。与此同时，第三十八军已进占熙川，守敌南朝鲜军第八师仓皇南逃；第三十九军也已对云山之敌构成三面包围。

吃了败仗的美军并未因此而接受教训，当年太平洋战场的五星上将、如今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一面调整部署，以美军代替溃退的南朝鲜军；一面继续分兵冒进，做起感恩节（11 月 23 日）以前结束朝鲜战争的美梦。

此时，作为司令员兼政委的彭德怀敏锐地发现，敌人虽然调整了部署，但仍处于分散状态，利于志愿军各个击破，于是决定采取向敌后实施迂回，结合正面突击的战法，割断其南北联系，集中兵力，将敌各个歼灭于清川江以北。

志愿军总部于 11 月 1 日 9 时下达了作战命令。西线志愿军各军便陆续开始了对敌人的进攻。

第三十九军于下午 5 时对云山之敌发起进攻。这时，云山已由美骑兵第一师第八团换防，担任正面攻击任务的第一一六师在炮火的支援下发起冲击，沿途遇美军一部顽强阻击，战士们猛打猛冲，于 23 时攻占云山西北的龙浦洞、二六二高地，直取云山。激战至 2 日 3 时，第一一六师占领云山后，即以 1 个团继续向云山东南上九洞方向攻击。第一一七师从东北方向云山以东的三巨里进攻，围歼南朝鲜第一师第十二团一部，于 2 日凌晨与第一一六师会合。从云山西南方向进攻并担任断敌退路任务的第一一五师主力，于 2 日拂晓截住并包围了从云山撤退的美骑兵第八团直属队和第三营共 700 余人。2 日、3 日，被围之敌在飞机、坦克支援下，多次拼命突围，均未得逞。

3日晚，第一一五师乘被围之敌疲惫绝望之际，发起猛烈攻击，将其全歼。

云山战斗，是志愿军首次以劣势装备歼灭了具有现代化装备的美骑兵第一师第八团之大部及南朝鲜军第一师第十二团一部，共歼敌 2046 名（其中美军 1840 名），缴获飞机 4 架，击落敌机 1 架，击毁与缴获坦克 28 辆，缴获汽车 176 辆，各种炮 190 门及大批枪支弹药、器材和物资。

在取得云山大捷的同时，志愿军在西线的其他部队也连战告捷。第四十军歼灭南朝鲜第八师、美骑兵第一师的炮兵各一部，逼近宁边。第三十八军攻占球场后，主力随即沿清川江左岸攻击前进，占领院里，构成了对西线敌军侧后的很大威胁。第六十六军进到龟城近郊，阻击与牵制了美第二十四师。第五十军由安东（今丹东）过江，进至新义州以南，准备阻击窜至南市洞的英国第二十七旅。

11月3日，西线敌军在志愿军的连续打击下，特别是其侧后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深恐后路被切断，对其不利，开始向清川江以南实施全线后撤。志愿军为不让敌人撤逃，采取了多种办法，千方百计想堵住敌人，终因次日下雨，徒步追击行动困难，使敌军得以乘车逃脱。至此，在西线战场敌军除以少数兵力扼守清川江北岸滩头阵地阻击志愿军进攻外，主力部队均退逃至清川江以南。志愿军总部鉴于歼敌机会已失及其他考虑，遂命令西线各军于11月5日停止进攻，结束第一次战役。

在西线敌军猖狂北犯的同时，东线敌军也分路向江界和图们江边推进。为保障西线主力作战，阻敌不得西援，志愿军第四十二军主力在东线的两个师，在朝鲜人民军一部协同下，从10月25日开始，分别在黄草岭、赴战岭地区，以英勇顽强的精神与北进的南朝鲜首都师、第三师和美军陆战第一师展开猛烈的战斗。经几天激战，志愿军粮弹消耗殆尽，伤员不断增加，处境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指战员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革命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坚守阵地。他们粮食吃完了就以草根充饥，弹药用完了就以石块作武器，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敌人在飞机、大炮、坦克支援下的凶猛进攻。经13昼夜苦战，歼敌2700余人，终于制止住了敌人的进攻，守住了阵地，粉碎了敌人迂回江界的企图，有力地配合了西线志愿军作战，为整个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英勇奋战，共歼灭敌人1.5万余人，粉碎了敌人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企图，并将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了清川江以南，取得了初战胜利，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并取得了同美军作战的初步经验，增强了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的信心，为尔后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志愿军初入朝作战就旗开得胜，是与毛泽东的正确决策分不开的。首先，他能够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及时改变作战方案，变先组织防御作战半年后再进行反攻为争取运动战为主的方针。其次，指挥志愿军秘密入朝，出敌不意，攻敌不备，保证了战役的突然性。再次，为志愿军制定的先打伪军、后打美军、由弱及强、各个歼灭的作战原则保证了这次战役的胜利。

再进攻兵至“三八” 战局变世界震惊

1950年11月5日，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胜利结束，“联合国军”被迫从鸭绿江边退至清川江以南，其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彻底破产了。

虽然志愿军取得了第一次战役的胜利，但战争形势尚未根本好转。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又在酝酿大举北侵的所谓“总攻势”。当时，他们在前线的地面部队已有5个军13个师3个旅和1个空降团，总计22万余人，比第一次战役增加9万余人，且主要增加的是美军，并拥有飞机1200余架，坦克1000余辆，火炮1万余门。而且他们海军的大量舰艇也驶向朝鲜北部海域。当时，我志愿军仍没有空军，没有海军，没有坦克。敌人发起空中战役后，每天出动1000余架次飞机，轰炸和封锁鸭绿江与图们江上所有桥梁，并摧毁由北往南直至战线的所有交通工具、军事设施、工厂、城市和村庄。敌军的狂轰滥炸，给我志愿军的兵员补充、粮弹供应造成很大困难。

毛泽东高瞻远瞩，指出：给“联合国军”第一个打击后，总的形势对中朝方面有利，只要抓住战机再给敌人一至两个较大的打击，就能从根本上改变朝鲜战局。他决心利用敌人恃强骄傲的心理和对志愿军入朝实力及意图判断上的错误，采取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的方针，争取在11月至12月初的一个月内，东西两线各打一、二个仗，共歼敌七八个团，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一线。为保证这一战役切实取得胜利，确定迅速调第九兵团入朝，进至长津地区，转变东线战局；东北军区用一切可能办法，保障东西两线粮弹、被服（保障御寒）之供给。……

11月6日，“联合国军”开始试探性进攻。7日，志愿军开始诱敌深入。21日，西线“联合国军”进至预定发起总攻势的“攻击开始线”；东线进至长津湖地区及鸭绿江边的惠山镇。

在“联合国军”兵力日益分散冒进的同时，亦即在其严密封锁鸭绿江和中朝人民后方每条道路的时候，志愿军第九兵团3个军12个师15万余人，悄悄地进入东线长津湖和厚昌江口地区，接替了第四十二军的东线作战任务，使志愿军在东线也拥有绝对优势的兵力。随后，第四十二军隐蔽地转入西线，又加强了西线兵力。这样，西线共拥有6个军23万余人。

11月24日，“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认为其“钳形进军的东路大军已进入包围态势”，战争已临“决定阶段”，便于当天上午10时在东京发表《公报》，宣布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开始。他集中在朝鲜的全部美、英、土耳其军和大部南朝鲜军共22万余人，以美军主力部队为东、西两线的主要突击力量，陆海空军联合向中朝边境大举进攻，这一天，麦克阿瑟还飞到朝鲜临空指挥，并沿鸭绿江飞行，窥视了中国领土。与此同时，敌人还大量散布了美蒋要联合“反攻大陆”的谣言。

就在“联合国军”忘乎所以地继续做他们圣诞节“庆祝胜利”的黄粱美梦之时，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根据战役前毛泽东关于“德川方面甚为重要”的指示及其在战役开始时拟定的作战方案，吸收第一次战役的经验教训，充分考虑当时敌情我情，制订了志愿军第二次战役反击作战方案。毛泽东对方案又作了重要修改。

25日黄昏，按照毛泽东和彭德怀制定的反击计划，西线第三十八、四十二军，乘敌军立足未稳，出其不意，首先对进到德川、宁远的南朝鲜第七师、第八师发起突然而猛烈的反击。南朝鲜这两个师与美军相比，装备较差，战

斗力也较弱；这里靠近两城间隔区，翼侧暴露；又是山区，不便机械化部队运动，便于步兵穿插。虽然这些条件对志愿军有利，但志愿军仍将这两个较弱的师作为“强敌”对待。毛泽东与彭德怀决定各以志愿军1个军的绝对优势兵力全歼；同时以第四十军攻击进入新兴洞、苏民洞地区之美第二师，以割断美军与该两师的联系；还电令第五十、六十六、三十九军，梯次东移，分别进入定州、泰川、云山地区阻击，吸引其当面之敌继续向北向西攻进，共同保障德川、宁远方向作战。担任攻歼任务的作战部队，对这两个师也非常重视。攻击德川的第三十八军，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法，为了形成对敌人的包围之势，战士们夜间爬过陡峭的七五五高地，徒涉岸边已结薄冰的大同江，一夜前进100余里。最后终于将南朝鲜第七师5000余人大部歼灭，驻该师的7个美国顾问全部被俘。攻击宁远南朝鲜第八师的第四十二军，采取了南北夹击的战法，也将敌人歼灭其大部。担任割裂任务的第四十军，则将美第八师主力钳制于新兴洞及其以南地区，并歼其一部分。至此，志愿军按照毛泽东、彭德怀的部署，一举打开了战役缺口。26日晚，担任正面阻击的3个军向其当面之敌发起猛烈地攻击。

“联合国军”为堵战役缺口，急调土耳其旅和美骑兵第一师一部，从军隅里和顺川地区向德川方向机动，彭德怀判断，在当晚东线志愿军发起攻击后，西线敌军可能退向清川江南岸。随即按原来方案，令第三十八、四十二两个军于当晚向军隅里和三所里、顺川和肃川攻进，实行双层战役迂回，以利切断进入清川江北敌之后路，配合正面4个军首先歼灭美第九军两个师，尔后在敌撤退中，抓住并歼其一部。

美军第九军是美侵朝部队的主力。它辖下的美第二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过著名的诺曼梯登陆，自称“永远不是第二的美二师”；美第二十五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马尼拉登陆作战的主力，曾获得过不少勋章、奖章；美骑兵第一师是美军中历史悠久、战功卓著的老部队，全师已无一匹马，但仍沿用其老称号；土耳其旅也是以剽悍著称。这些部队都是战斗力较强的。

27日黄昏，志愿军第三十八军主力两个师沿德川—军隅里公路及其北侧平行急进。在前进中他们分别遭到土耳其旅和美骑兵第一师的阻击，该军第一一三师经安山洞小路向军隅里南三所里迂回，这个师除去留下打扫德川战场和去安州南执行炸桥的人员以外，全师实际只有两个团插向三所里。一路上他们克服重重困难，14小时前进140余里，于28日8时前到达三所里，切断美第九军由军隅里向顺川的后路，一举震撼了敌人整个阵势。

当天夜间，东线第九兵团以第二十七、二十军两个军7个师的兵力，向进入长津湖地区的美军发起突然攻击。到28日早晨，完成了对柳潭里、新兴里之敌的包围，同时切断了各被围美军之间及其与黄草岭以南美军的联系，还逼近社仓里，与美第三师第七团对峙，东、西两线大量美军主力陷入困境。

为摆脱朝鲜战场困境28日夜晚，麦克阿瑟在东京召开了有朝鲜西、东两线指挥官及美远东空、海军司令参加的紧急会议。但大伙一筹莫展，毫无良策。最后，麦克阿瑟指示沃克，“为避免被从东面迂回包围”，可于“必要时自行撤退”，扼守平壤一线。美第十军撤往咸兴、兴南一线。

朝鲜战局也震惊了华盛顿美国最高决策当局，他们连续召开会议，但均没有找到能挽回败局的灵丹妙方。11月30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为扭转朝鲜局势，“我们一直在积极考虑”在朝鲜战场“使用原子

弹”。他的讲话意味着，有可能马上要开始一次包括使用原子武器在内的世界大战。于是在全世界立即引起轩然大波。

在华盛顿无法挽救朝鲜战场危机的时候，28日，毛泽东致电志愿军领导人，祝贺志愿军歼灭南朝鲜第二军团主力的大胜利。同时指出，已出现大举歼敌的极好时机，要集中我西线主力歼灭美第二师、第二十五师、骑兵第一师3个师的主力。并指明：“只要这三个师的主力歼灭了，整个形势就有利了。”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电令，一面激励第一一三师坚决堵住逃敌，打退援敌；一面令第三十八军主力迅速向第一一三师靠拢；第四十二军迅速向顺川、肃川进攻；正面各军速向安州、价川方面攻进。

28日，志愿军第一一三师分别布防于三所里和龙源里，他们在这两地堵住了大量南逃之敌，将军隅里南通顺川的两条公路全部切断。

与此同时，我第四十二军、第三十八军一一二师一路冲杀，按时到达预定地点，正面的4个军也已进至博川、宁边、球场以南，从而使美第九军所属的美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土耳其旅全部和美骑兵第一师一部，以及南朝鲜第一师一部，陷入志愿军三面包围之中。只有经安州南逃肃川的路，尚未堵住。

29日，西线敌军开始全线退却，美第一军由清川江北撤至安州，准备经肃川向平壤方向逃跑。美第九军收缩在军隅里地区，企图经龙源里、三所里向顺川的两条公路突围。于是志愿军在平院里、军隅里、三所里、龙源里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围追堵截战。

敌军为了逃脱被围歼的命运，在大量飞机、坦克和炮兵掩护下，向我第三十八军第一一三师龙源里、三所里一线阵地猛烈冲击，企图夺路突围。同时急调英第二十九旅与美骑兵第一师在顺川的部队北上救应。面对敌人强大的炮火，众多的兵力，我第一一三师广大指战员发扬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精神，坚守住了阵地。29日下午，我第二十八军第一一二师于凤鸣里地区将美第二十五师1个团大部歼灭，随即与第一一四师分别向云龙里、龙兴里地区攻进，与第一一三师一起与南逃之敌展开激战。

30日，第四十军又歼美第二师1个营，攻占军隅里，军主力继续向安州攻进。第三十九、六十六军于凤舞洞地区歼敌部分，迫敌溃逃后，第三十九军于凌晨时分由军隅里西渡过清川江，向龙源里以西攻进；第六十六军尾随第三十九军渡江，于军隅里地区肃清残敌。第五十军从博川东南逼进清川江。

30日，敌人以百余架飞机、百余辆坦克、数百门火炮，向龙源里、三所里以北我第三十八军堵击阵地进行更加猛烈轰炸，掩护大批撤退下来的美军拼命夺路，反复突围。敌人并调来B—29型轰炸机，大量投掷重磅炸弹、子母弹、凝固汽油弹、掠地杀伤弹。志愿军阵地犹如火海。许多指战员不仅负伤坚持战斗，而且在烈焰焚身最痛苦的生命最后一刻，仍顽强歼敌。可谓是英雄精神跃日月，革命豪气贯长虹。作家魏巍在他的著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对第三十八军第一一二师第三三五团第三连在龙源里以北松骨峰堵击作战曾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从那以后，中国人民就以“最可爱的人”来称呼志愿军。

在龙源里把守这场堵击战最后一道“闸门”的第三十八军第一一三师第三三七团第三连的指战员们，也是以这种精神，卡在南逃与北援敌人中间，使南北之敌相距不到1公里而可望而不可及，不得不放弃从这里突围的企图。该连在打退敌人1个连至1个营兵力的多次冲击后，阵地上弹坑累累，

树干遍地，全连仅剩 50 余人。敌人在发起最后一次集团冲击时，连长张友喜带领战士与敌人反复争夺，打退了敌人，守住了阵地。后来志愿军领导机关给该连记集体特等功。

后来，美第二师师长凯泽少将曾谈到“永远不是第二的美第二师”在龙源里以北被堵击的惨状：

“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沟里和公路上。大部分活着的，甚至那些还未受伤的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得麻木不仁，呆若木鸡。中国人的子弹犹如冰雹一样落到岩石中间，他们有的站在车旁，有的趴在车底下嚎哭……由于脸上落了厚厚的尘土，或者是由于膛目结舌而变了脸型，看上去他们好象戴了假面具。”“步二师在穿过敌人 5 英里长的伏击圈时所经受的可怕的严峻考验就是这个样子，受到伏击的 7000 多人中大约有 3000 多名伤亡——还损失了大量车辆。”

30 日夜，第三十八军 8 个步兵团向被包围的敌人英勇出击。第四十军的 1 个师也进至青谷里，协同三十八军作战。战至 12 月 1 日 8 时，敌人被迫遗弃大量辎重装备，分散突围。志愿军随即转入各个围歼。

12 月 1 日，司令员彭德怀亲书嘉奖电对第三十八军通令嘉奖，电文最后的两句口号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第三十八军万岁！”

西线作战至 1 日 19 时，被围的敌人大部被志愿军歼灭，残敌折转西逃经安州奔向肃川以南。志愿军第四十军尾追敌人到安州，并于当晚占领安州。

志愿军在西线发起反击之后，东线的美军第十军和南朝鲜第一军团仍在积极地执行麦克阿瑟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计划，继续北进，并将美第七师主力与美第三师向陆战第一师靠拢，进一步增强其主要方向的突击力量，以影响与制约西线战局的发展。

志愿军第九兵团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同敌人作战的。当时预备队第二十六军尚在厚昌江口，需 6 天时间方能到达前线，部队难于机动和加强兵力；尤其不利的是由于第九兵团是紧急入朝，对战区气候不了解，穿着单薄的棉衣来到朝鲜北部高寒山区，由于敌机猖獗，大批粮食、被服、弹药直到临战前夕还没有运到前线。战区普降大雪，最低气温为零下 30 摄氏度左右。志愿军面对的不仅是具有现代化装备的敌人，而且还有环境的严峻考验。在这种情况下，我志愿军指战员充分表现了英勇顽强不怕困难的革命精神。27 日夜，东线第九兵团第二十、二十七军同时时攻长津湖地区美军发起攻击后，第二十六军第七十九师、第八十师和第二十军第五十八师，分别对柳潭里、新兴里、下碣隅里的美军实施包围。第八十师趁夜杀伤新兴里之敌千余人，第七十九师歼柳潭里之敌一部。28 日，第五十九师歼敌千余人，第五十八师攻占下碣隅里机场大部，歼敌 800 余人。

经过连续两天的作战，查明被围诸点之敌共有一万余人，比我原估计的敌军数量多出一倍，原来在我开始攻击之前，敌人在各地已增加了兵力。兵团根据新的敌情和我军的具体情况考虑，决定集中兵力各个歼敌。首先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新兴里之敌，然后再逐个歼灭柳潭里、下碣隅里之敌。

第二十军集中第六十师和第五十八师部分部队，于小民泰里、富盛里地区，把在 50 余架飞机掩护下，由黄草岭以南北援的美陆战第一师 1 个陆战营、1 个坦克营，英皇家海战陆战队第十四特遣队及南朝鲜陆战队一部，共 1000 余人，坦克、汽车 100 余辆放进阵地，采取拦头、断尾、截腰的战法，将其大部歼灭，240 人被迫投降。

当第二十军主力在富盛里地区聚歼北援之敌时，下碣隅里的美军也向南攻击，企图南北对进打开通道。第五十八师第一七二团第三连连长杨根思带领第三排在小高岭顽强阻击敌人，敌人向我阵地倾泻了大量炮弹，阵地上浓烟滚滚，烈火熊熊。敌人多次抢夺小高岭，都被三排击退，最后全排仅剩两名伤员仍坚守阵地。当敌人发起第九次攻击时，有 40 多个美军爬近山头，在支援分队尚未赶到的危急关头，已负伤的杨根思抱起一个 5 公斤重的炸药包冲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

相继，第二十六军主力于 12 月 1 日在极其困难条件下，在新兴里全歼美军 1 个加强团。

新兴里战斗后，毛泽东致电第九兵团，“庆祝我第九兵团的两次歼敌大胜利”，提出“应加紧歼灭被困之敌”，“并应准备与必然增援”的美军与南朝鲜军作战，“切实注意增强黄草岭南北阻援和阻止突围之力量”，12 月 1 日，在全歼新兴里美军的同时，西线“联合国军”南逃，东线敌人也全线动摇。进入清津、惠山镇及新架坡之敌相继撤退，被围于柳潭里的美陆战第一师第五、第七两团，也全力进行突围。当第九兵团正调集兵力进行围歼时，他们在大量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在付出重大伤亡后，于 4 日逃到下碣隅里。在我担任围歼任务的第二十六军由于大风雪所阻刚到达一部时，他们便突围南撤了。

在朝鲜西、东两线的沉重打击下，麦克阿瑟认识到，如不急速后撤，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他于 12 月 3 日命令西线部队立即撤出平壤，东线部队立即撤到咸兴，然后向“三八线”实施总退却。

根据这一情况，12 月 4 日，毛泽东指示志愿军准备先打平壤，“如平壤敌已退，则向三八线攻进”。根据毛泽东这一指示，我西、东两线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忍着饥寒英勇地截歼和追歼退却中的“联合国军”，给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东线的美陆战第一师，在强大的陆海空火力掩护下，于 24 日乘船从海上逃向“三八线”以南。此时，志愿军西线 6 个军已进至“三八线”。至此，战役遂告结束。

此次战役的胜利，大大超出了志愿军的预期目的。志愿军在朝鲜军民配合下，从 11 月 6 日至 12 月 24 日，连续作战 49 天，歼敌 3.6 万余人，其中美军 2.4 万余人。收复了除襄阳之外的“三八线”以北的全部领土。这一战役的胜利，震惊世界，给美国为首的侵略集团以沉重的打击。

诱敌深入、寻机破敌是毛泽东一贯的战略战术。在这次战役的指导上，他利用了敌人恃强骄傲的心理和对志愿军判断上的错误，指示志愿军一步步把敌人引向我有利战区，给敌人以出其不意的打击，从而打开了缺口。在战役中同时实施迂回包围战术，为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追究寇连续作战 再推进攻占汉城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沉重打击下，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发动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彻底破产，变成了圣诞节向“三八线”

以南的总崩溃、总退却。这种情况的发生，立刻使美国朝野陷于一片混乱。美国政府连忙召开了一系列高级会议。会议承认朝鲜形势的发展使美国“面临一场严重的危机”，但仍然决意坚持其侵略政策。其具体措施是，一方面在政治上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成立所谓“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打出“先停火，后谈判”的幌子，企图争取

时间，准备再战；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加紧扩军备战，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要求美国人民为侵略战争做出“任何必要的牺牲”。于1950年12月23日，命令刚刚接任败退中因车祸身亡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职务的马修·李奇微（原任美国陆军副参谋长）组织“联合国军”和南朝鲜13个师又3个旅，约20万人的兵力，加筑“三八线”上原有阵地，建立纵深防线和整顿军队，准备抗击志愿军和人民军新的进攻。

毛泽东早在“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开始向平壤和向“三八线”溃退的时候，就对战争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对应采取的方针进行了充分的考虑。他认为，虽然取得了两次战役的重大胜利，扭转了朝鲜战局，但尚未大量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要赢得这场战争还必须做出很大的努力。当得知“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退守“三八线”，美国当局玩弄“先停火，后谈判”的缓兵之计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要求志愿军必须克服和忍受一切困难，协同人民军打过“三八线”去，他指出，目前美、英等国正要求志愿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志愿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我们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他还指示志愿军：此次南进，希望在开城南北地区，即离汉城不远的一带地区寻歼几部分敌人，然后根据情况，如果敌人以很大力量固守汉城，则志愿军主力退至开城及其以北地区休整，准备攻击汉城条件；如果敌人放弃汉城，则在平壤、汉城间休整一个时期，然后再战。

志愿军由于连续进行了两次战役，部队已相当疲劳，后勤补给也更加困难。彭德怀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根据部队当时的情况，对战争形势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朝鲜战争仍然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自然加强了纵深，对联合兵种作战不利。敌军士气，虽然比以前低落，但仍然有26万左右有的兵力。政治上，敌人如果马上放弃朝鲜，对于帝国主义阵营说来是很不利的，英法两国也不要求美国这样做，敌如再吃一两个败仗，再被消灭两三个师，可能退守几个桥头阵地，也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所以，志愿军目前仍应采取稳进。

毛泽东同意彭德怀对战争形势的分析，但同时指出，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进行休整是必要的。不过在战役发起前，只要有可能，即应休息几天，然后投入战斗。因为主动权掌握在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手里，可以从容不迫地作战，不使部队过于疲劳。毛泽东又于12月24日、26日两日，就战役的部署问题再次电告彭德怀。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下定决心发起第三次战役，集中志愿军6个军，并建议人民军新到前线的3个军团同时实施进攻，粉碎敌人在“三八线”的防御，如发展顺利，就相继占领汉城、洪川、江陵一线，尔后转入休整，

准备春季攻势。同时根据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地形特点，定下了具体作战部署：志愿军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五十军并加强6个炮兵团组成右纵队，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指挥，于高浪浦里至永川地段正面实施多路突破，并分别从两翼向七峰山、仙岩里迂回，断敌退路，首先集中兵力歼灭涟川以南的南朝鲜第六师，再歼汶山地区的南朝鲜第一师，得手后向议政府方向发展胜利；志愿军第四十二、六十六军并加强1个炮兵团组成左纵队，由第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政委周彪指挥，在水平至马坪里地段上突破，首先集中主力于永平至龙沼洞地段歼灭南朝鲜第二师1至2个团，得手后向加平、清平里方向扩大战线，切断汉城、春川间交通，另以1个师由华川渡北汉江向春川以北的南朝鲜第五师积极佯攻，策应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南进。建议人民军第一军团主力于东场里以东地区向汶山方向佯攻，配合志愿军右纵队歼灭南朝鲜第一师；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由杨口、麟蹄间突破，向洪川方向攻进，配合志愿军左纵队围歼南朝鲜第七师。

为了达成战役的突然性，还决定把发起战役的时间定在1950年除夕—12月31日17时，志愿军和人民军按照预定计划，经过短促的炮火准备之后，在全线发动进攻。当时，天不作美，“三八线”附近突然寒风呼啸，大雪纷飞，但英勇的志愿军和人民军战风雪斗严寒一往无前。

志愿军右纵队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军各担任突破任务的部队，冒着敌人的炮火，迅速徒涉冰冷刺骨的临津江、汉滩川。突破了南朝鲜军的前沿阵地后迅速向其防御纵深发起进攻。第三十九军从南朝鲜第六师与第一师的接合部突破后，军主力于1951年1月1日拂晓前占领了位山东北的大村、武建里，前进了10公里，并策应了第五十军渡过临津江。该军第一——七师向敌纵深猛插，于1日拂晓到达指定位置东豆川里以南的仙岩里，截歼了南朝鲜第六师600余人。从南朝鲜军右翼突击的第三十九军越过汉滩川后，军主力向抱川方向攻进，1日晨占领抱川及其西侧的新邑里，该军担任穿插任务迂回任务的第一一四师于1日中午进到指定位置七峰山后，发现西侧有1000余名南朝鲜军正在南逃，立即展开阻击，歼其400余人。从南朝鲜军第六师正面突击的第四十军突过临津江和汉滩川后，其前峰第一一九师占领了东豆川里东山。当晚，志愿军右纵队继续发展进攻，人民军第一军团也渡过了临津江向坡川里前进，到2日晚，志愿军右纵队和人民军第一军团进到坡川里、议政府东北至抱川以南一线，已突入南朝鲜军防御纵深15至20公里。

志愿军左纵队第四十二军涉过永平川，一举突破南朝鲜军第二师道城帆、峨洋岩阵地。该军第一二四师不顾山高雪深，不怕敌机威胁，继续猛攻，沿途打破敌人10次阻击，于1月1日12时前到达济宁里以南的石长里，切断了南朝鲜第二师的退路，2日协同第六十六军主力将上南淙、下南淙地区之敌歼灭，圆满完成了断敌退路、围歼敌人的任务；该军主力在突击中于加平里以北地区歼灭南朝鲜第二师1个多营，然后向加平方向发展进攻，2日10时占领加平。第六十六军主力克服重重困难，突破敌人一道又一道防线，不断向敌人防御纵深猛插，在第四十二军第一二四师协同下，在上红磧里、下红磧里、上南淙、下南淙等地歼灭南朝鲜第二师两个团、第五师1个团大部 and 南朝鲜炮兵1个营，共毙伤俘敌32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60余门，各种枪1500余支（挺），胜利地完成了预定任务。

在志愿军、人民军的打击下，作为“第一梯队”在“三八线”附近组织防御的南朝鲜部队争相南逃，狼狈不堪。李奇微看到大势已去，担心志愿军

会实施深远包围，使其聚集在汉城附近的 10 多万部队和全部重装备陷于绝境，1 月 3 日即令除以一部兵力在汉城以北高阳、道峰山、水落山一线进行掩护外，其余部队向北纬 37 度线迅速南撤。

1 月 3 日晚，志愿军和人民军转入追击作战。志愿军第五十军一部在碧蹄里击退美第二十五师约 1 个营的抵抗之后，进至高阳以南佛弥地截断了英第二十九旅的退路。经一夜激战，全歼这个旅的皇家奥斯特来机枪团第一营及第八骑兵（坦克）团直属中队。缴获和击毁坦克 31 辆，装甲车和汽车 24 辆。第三十九军先头部队于回龙寺与美第二十四师第二十一团遭遇，歼其一部，之后又在议政府以西釜谷里歼灭英第二十九旅两个连。第三十八军、第四十军追击至议政府东南水落山地区，击溃美第二十四师 1 个团。志愿军左纵队由加平、春川渡过北汉江，向洪川方向发展。人民军第二、五军团继续向洪川、横城方向攻进，截歼南逃之敌。

4 日，志愿军第三十九军、第五十军各 1 个师和人民军第一军团先后进入汉城。

为了不使“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据守汉江南岸，5 日志愿军右纵队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军在汉城东北和议政府东、西地区待命，第五十军和人民军第一军团（留 1 个师守卫汉城）继续向南追击。第五十军在果川、军浦场歼敌一部，7 日进占水原、金良场里。人民军第一军团 5 日占领金浦，8 日占领仁川港。志愿军左纵队也继续向南追击，6 日占领龙头里、砥平里；到 8 日，又先后占领杨平、梨浦里、骊州、利川。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于 6 日占领横城，8 日占领原州。

至此，志愿军和人民军已将“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驱逐到北纬 37 度线附近的平泽、安城、堤川、三陟一线。第三战役结束。

这次战役，志愿军和人民军齐心协力，并肩作战，经过连续 7 昼夜的艰苦奋斗，以每小时前进 1 公里的进攻速度前进了 80 至 110 公里，毙伤俘敌 1.9 万余人，占领了汉城，粉碎了“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据守“三八线”，整顿军队，准备再犯的企图。

本来，我志愿军入朝进行两次战役之后，进行一个阶段的休整是十分必要的。但毛泽东从政治上考虑，从战略高度认识问题，要求志愿军克服和忍受一切困难，连续作战，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以期最大限度地争取主动，应该说，毛泽东作为我军之统帅，实在是棋高一着，技高一筹。

争短期调兵遣将 为停战以打促谈

1951年1月底，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恢复了攻势，3月下旬，在付出重大代价之后，将战线推进到“三八线”附近地区。这时，美国同英、法等侵朝参战国之间及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对“联合国军”是否再次越过“三八线”和用什么方式结束朝鲜战争，再次发生分歧。后来美国经过与英、法等国磋商，决定在不扩大战争范围的前提下，稳步向朝鲜北部推进，待占领有利地区后，即以“实力政策”为基础，或与中朝进行外交谈判，或继续其军事行动，以保持美国在亚洲的地位。

侵朝敌军根据美国政府的这一政策，于4月初再次越过“三八线”，并计划以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将战线推进到北纬39度线及其以北地区，认为这样政治上可取得谈判的有利地位。这时，“联合国军”地面作战部队共34万余人。

横城反击战胜利之后，我军为集结兵力准备新的反击战役，持续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异常艰苦的防御作战，这一行动是根据毛泽东3月1日在对朝鲜战争形势的精辟分析的基础上实行的，毛泽东指出：根据一、二月份的作战经验，我因有3个军在咸兴以北战役中损伤较大，从事休整，致前线作战的只有6个军，减员甚大，未获补充，因之我无后备力量，在战役胜利时不能扩张战果，在敌人增援时不能打敌援兵。同时，我军南进，后方线长，供应很困难，还应留守备。故在敌人未被大量消灭及我尚无空军掩护条件下，我如过早追敌南退，反不利我分割歼敌。鉴于此种情况，在我第二番部队于4月上旬到达前线以前，在敌之陆军还较我占优势的情况下，我应避免战役性冲击。毛泽东提出：如敌逼我应战，就让敌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9个军到齐后再进行有力的新的战役。4月初，我志愿军第二番部队由国内及朝鲜北部咸兴地区开始向前线集结，争取在新的反击战役中能有志愿军9至11个军和人民军之至3个军团参战。与此同时，我后勤部队亦增至18万人，后勤保障工作虽作出很大努力，但敌人空中突击更加疯狂，因此，供应情况尚未好转，只能保障最低限度的供应，不能满足作战需要。

4月初，敌军未在“三八线”上停止，继续北犯。4月6日，中共志愿军委员会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着重研究和决定举行第五次战役问题。会上，彭德怀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战争指导方针，并且指出：目前抗美援朝战争仍处于艰苦紧张阶段。为消灭“联合国军”几个师，粉碎其侧后登陆计划，夺回主动权，会议决定趁敌人实施登陆之前，进入“三八线”南北地区立足未稳之机，实施新的战役反击。在战役指导上，彭德怀提出：根据敌人战役布势上只有战术纵深，其主要兵力来自横方向的特点，采取战役分割包围与战术分割包围相结合的方针，以第四十军从金化至加平线劈开战役缺口，协同第三十九军及人民军第三、第五军团东、西割裂，不使敌东、西增援。集中第九、第十九、第三兵团分别从东、西两翼迂回，结合正面突击，将敌人几个师分割包围于德川、水平、议政府、抱川地区，各个歼灭之。置第三十八、四十二、四十七军及人民军第二十一、第六军团于肃川、元山、平壤地区，以对付敌侧后登陆。

4月中旬，敌人发现我军战略预备队集结后，积极准备抗击我军的进攻。志愿军便决定提早发起进攻。

4月22日黄昏，中朝军队各突击集团按预定计划向敌人发起全线反击。左翼突击集团由宋时轮、陶勇指挥的第九兵团3个军及第三十九、四十军一

举突破“联合国军”防线，当面之敌在我军猛烈突击下，逐步后撤。我军乘机多路猛进，发展顺利。23日夜进占上海峰、白云山地区，歼灭美第二十四师和南朝鲜第六师各一部，完成了第一步任务。25日占领清溪山、中板里地区。“联合国军”右翼受到威胁。担任战役割裂任务的第四十军以勇猛的反击，打退南朝鲜第六师的进攻，乘胜直捣敌师主阵地，打乱了该敌部署，歼敌一部，缴获坦克12辆、汽车50余辆。尔后，分两路直插敌纵深。第四十军坚决地阻击了敌人的西援，于25日胜利完成了战役割裂任务，在此期间，共歼敌2200余人，缴获汽车230辆、火炮60余门。第三十九军前出到华川以南，将美陆一师隔于北汉江以东不得西援。

担任中央突击的第三兵团，由王近山、孙德信指挥突破敌前沿阵地后，23日将土耳其旅击溃，突破了美第三师防线。在哨城里、永平地区与敌人形成对峙。

右翼突击集团由杨德志、李志民指挥的第十九兵团和人民军第一军团，在扫清了临津江西岸之敌后，第一梯队师于23日晨冒着敌人的炮火，勇猛地冲过百米宽、齐腰深的临津江。第六十二军第一八八师迅速占领了英第二十九旅第一线阵地后，与敌人展开反复争夺，战斗十分激烈。担任战役迂回任务的第六十四军，突破临津江后，由于炮兵被隔在临津江以北，未组织有效的炮火支援，在江南岸进攻受阻，此时第十九兵团二梯队第六十五军两个师也渡过临津江。此间，由第六十四军第一九一师侦察支队和第五六九团第三营组成的先遣支队，经过20个小时的连续作战，突破敌人的七次阻拦，俘敌100余人，于24日下午突入敌纵深25公里，胜利地占领了议政府西南的道峰山。这个先遣队在道峰山坚守三天四夜，象一把尖刀插入敌人胸膛。威胁着敌人的左翼。25日18时，第十九兵团向当面之敌发起猛攻。经过激烈战斗，攻占了南朝鲜第一师和英第二十九旅主阵地，勇猛地向着议政府方向突击。在追击中歼灭了南朝鲜第一师一部和英第二十九旅格特斯特第一营及坦克团大部共4000余人。

西线“联合国军”在中朝人民军队的连续突击下，两翼受到威胁，且战且退，并在要点上顽强抵抗，以优势炮兵和航空兵火力迟滞志愿军和人民军的行动。中朝军队连续奋战了三昼夜，虽在加平方向上打开了战役缺口，对敌翼侧造成了严重威胁，但第六十四军未按时完成战役迂回，中央集团战术割裂任务晚了一步，战役发展形成平推，未歼灭成团师建制的敌军部队。

26日，彭德怀司令员就战役发展和下一步作战打算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作了报告，中央军委同意志愿军的作战方针和部署，并指出：从此次敌人且战且退和在此以前沿海袭扰的情况看来，敌人确有诱我军南下然后在北部登陆的企图。但敌主力如停在“三八线”及其以北地区，而我只有1个兵团及人民军向南进逼，估计敌人在未得到大量补充或援兵能使用以前，还会有一个犹豫时间，而仍然与我进行拉锯战，企图消耗我们。此种情况如果出现，对我并无不利。只要我们避免主力消耗，转而消耗和分散敌人，则推迟敌人登陆和向北进攻，便于我们完成各种准备，倒是合乎理想的。不过目前自应以敌人会很快登陆作准备，免得被动。

依照上述精神，26日西线我军继续向敌纵深发展进攻，占领了敌军锦屏山至加平的第二线阵地。28日右翼突击集团逼近汉城，第十九兵团占领汉城西北锦屏山、白云里地区，人民军第一军团在梧琴里歼南朝鲜第一师1个营的大部。中央和左翼突击集团占领了汉江北岸地区要点退溪院里、金谷里

和磨石隅里、清平川。人民军金（雄）集团以积极行动钳制了东线之敌。敌军主力撤至汉城及北汉江、昭阳江以南组织防御。美骑兵第一师西调汉城，并在汉城周围组成了绵密的火力控制地带，妄图诱我攻城，乘机给我以大量杀伤。这时虽然在汉城以北歼敌战机已失，但是，经过第一阶段作战，出现了敌军由西南伸向东北的斜线防御形势，而且由勿老里以东至东海岸整个东部战线由南朝鲜6个师防守，态势突出有利于我各个歼击。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根据26日的作战方针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为继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坚决贯彻多歼灭南朝鲜军的精神”，以孤立分散美军，创造今后消灭美军的有利战机，28日即停止第一阶段的作战，立即转兵东线，决心以南朝鲜军为歼击目标，集中第九兵团（欠第二十六军，附第十二军）及人民军金（雄）集团（第二、三、五军团）在勿老里至雪岳山地段上发动第二阶段作战。遂于29日决定停止进攻，准备新的作战。为对付敌人可能的登陆，将第四十、二十六军北调沙院里及平康以北地区。至此，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即告结束。

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后，第九、第三兵团用稍事整顿补充后即在第39军掩护下东移。5月6日，彭德怀经与人民军协商决定，东线作战集中第九兵团和人民军金（雄）集团，取正面突破，两翼迂回，双层包围，多路钳制的战法，首先歼灭磷蹄东南县里地区之南朝鲜第五、七、三、九师，然后视情况继续歼灭南朝鲜首都师和第十一师。以第三兵团（欠第十二军，附39军2个师）向九城浦里突击，割裂美军与南朝鲜军的联系，阻止美第一军不得西援；西线第十九兵团及人民军第一军团以汉城为重点，在高阳至加平段宽大正面上实施佯动，钳制西线美军主力。

5月12日晚，西线我军开始对议政府、汉城、春川地区之敌实施佯动。李奇微被佯动所迷惑，惊呼“汉城面临第二次危机”，并判断我军在中线即将发起攻势。遂调美第七师，南朝鲜第二师增强中部防线。同时，第三、第九兵团于15日相继隐蔽进入作战地区，完成了战役展开。

5月16日18时，我各突击兵团在短促的炮火准备后，向敌人发起猛烈的突击，敌军防线土崩瓦解，南朝鲜第五师、第七师仓皇溃退，我第九兵团之第二十军、二十七军及人民军第五军团以摧枯拉朽之势直插敌人纵深。

第二十军第六十师主力于17日晨攻占了后坪里、美山里、旺威谷等战略要点，歼敌500余人，切断了县里地区南朝鲜第三师、第九师南逃退路。人民军第五军团也于17日占领了县里东南之镇东里、芳台山各要点，切断了县里之敌东南退路，与第二十军对县里之敌构成了合围。

第二十七军在突破南朝鲜第七师防御后，第七十九师和第八十师攻歼了于论里之敌，尔后向院巨里方向进攻。担任迂回任务的第八十一师不停息地交互攻击前进。师长孙端夫亲率第二四二团第二营为先导，迅速向敌人纵深猛插，于17日5时突入敌纵深28公里，切断了县里之敌西南退路。该师主力在第六十师的协同下，在上南里地区将南逃的南朝鲜第五师、第七师击溃，全歼南朝鲜军5个营3000余人。

担任战役迂回任务的配属第九兵团的第十二军，突破南朝鲜第五师防御后，于三巨里歼灭其第五师一部，继续在自隐里北侧与美第二师以及法国营展开激战，经两日艰苦的围歼战斗，全歼美第二师第二十三团两个营及法国营大部。向深远纵深沙里地区迂回的我第三十一师主力被敌阻隔，只有1个团从敌左翼绕道插入敌人纵深，并于18日拂晓攻占长水院，因而未能达成向

东沙里迂回的目的。

18日晨，县里地区南朝鲜军第三师、第九师动摇溃乱，开始向南及东南方向突围。我第二十军由西向东，人民军第五军团由东向西，对敌两面夹击，将该敌大部歼灭，缴获敌人全部重装备。志愿军第二十军与人民军第五军团在围歼作战中胜利会师后，又分数路共同进山搜剿残敌。为继续歼灭南逃之敌，第十二军、第二十六军和人民军第五军团一部于20日前进到丰岩里、下珍富里、东沙里一线。但因战役退路未被我按时切断，致使溃逃之敌未能被堵击包围全歼，从而使溃逃之敌和增援之敌又迅速形成了东西相接的完整防线。于是，21日结束了第二阶段的作战。

在这一阶段作战中，我第三兵团第十五军发起进攻后，第四十五师攻占沙五郎峙，歼美第二师200余人。第四十四师迅猛插入敌纵深，经一夜激战，将美第三十八团大部歼灭，毙伤敌1800余人，俘敌240余人，有力地牵制了当面美军。第十五军歼灭美第三十八团大部之后，继续向纵深发展，因美第二师与美陆战第一师继续顽抗，前进受阻。第六十军第一八师以积极行动攻击当面之敌，19日夜占领洪川以北法所里，牵制了美第七师不得东援。

西线我第十九兵团以4个师的兵力于17日分别攻歼了高阳、金谷里、清平川、上泉里等地之敌。18日，第六十三军南渡北汉江，攻占通芳山、凤尾山诸要点，在抗击敌人反扑中，歼灭美军1个营和南朝鲜军3个连的大部，有力地牵制了西线敌人。20日，西线敌军为减轻我军对其第九军、第十军的压力，开始以美第一军3个师又3个旅的兵力向我第十九兵团展开进攻。第十九兵团随即转入了防御。

中朝部队为改善补给，争取主力集结休整、补充，总结作战经验，造成尔后有利战机，以便更多地歼灭敌人，决定将各兵团主力北移“三八线”南北地区。正在中朝部队主力开始转移之时，“联合国军”乘机以4个军13个师的兵力，有计划地全线实施猛烈反扑。他们利用技术装备的优势，以摩托化步兵、炮兵、坦克组成“特遣队”，在航空兵掩护下，多路猛烈地向中朝部队纵深突击。25日，“联合国军”主力全面展开沿汉城、涟川、春川、华川、洪川、麟蹄公路稳步向北推进。

中朝人民军队向后转移，本是胜利回师的主动行动，但是，由于对“联合国军”有计划地组织以机械化“特遣队”的形式向纵深穿插割裂，迅速展开主力实施全线反扑估计不足，因而转移的组织计划不够周密，全线出现多处空隙，使敌“特遣队”得以乘隙而入，造成中朝人民军队在转移初期十分被动的局面。

中朝人民军队的争取主动，于27日将北移途中的志愿军第六十三、六十四、十五、二十六、二十军及人民军第五、二、五军团等8个军陆续展开于“三八线”南北地区组织防御。28至30日，第六十五军对进攻涟川的美第一军，第二十军对进占华川地区之美第九军，实施强有力的反击，歼敌一部，并收复华川。6月1日，志愿军4个军于新幕、鸡雄山、黑云吐岭一线构成了纵深防线。随着反击作战的胜利和全线防御布势的完成，“联合国军”的反扑行动被制止。6月10日，中朝部队主动撤出铁原、金化，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的位山、涟川、铁原、金化、杨口、明波里一线。交战双方均转入防御，至此，第五次战役胜利结束。

这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投入15个军(军团)的兵力，奋战50天，取得了歼敌8.2万余人的重大胜利，粉碎了敌人妄图侧后登陆配

合正面进攻，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计划，夺回了战场上的主动权。这次战役结束后，“联合国军”不得不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停战谈判。从此，朝鲜战场上出现了长达两年的战略相持阶段。

要使战争“尽量争取短期”，就必须靠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来实现。因为对于战争的发动者来说，是不会轻易接受停战谈判的。只有把他打得锐气全消，打得无招架之力，才有可能使其坐到谈判桌前。第三次战役，贯彻了毛

泽东“以打促谈”的军事思想，使停战谈判终于被“联合国军”所接受。

巧用敌人书报 展我武略文才

毛泽东年轻时，便胸怀世界，心忧天下，又为了调查研究，所以，酷爱读报。这种习惯，使他了解国内外大事，调查实际，研究问题，较快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位坚定的革命者，并通过读报，帮助决策，指导战斗，推进革命。

毛泽东曾回忆说：“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花了一百六十块钱——其中包括我的许多报名费；在这笔钱里，大约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订阅费每月约一元。我还常常买报摊上的书籍和杂志。”这种读报习惯，直到上井冈山，即使在国民党包围封锁的情况下，也从没间断过。所以，他熟悉国内外形势，分析时事，具体透彻，有说服力。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利用各种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有时，“文武”兼用，获得大批国民党的报纸刊物，精心阅读，了解信息，分析现象，把握本质，甚至建立起自己独特的情报系统，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革命，消灭敌人。

1929年初，当毛泽东率领红军向赣南、闽西进军时，急需判明尾追的敌人和瑞金城内敌人的动向，以制订下一步作战计划。在当时没有健全、得力的情报系统的情况下，于是决定派宋裕和带领一个连到瑞金县城“抢”报纸，弄到一批《国民日报》、《中央日报》和广东、上海、福建、江西的地方报纸，经过分析，印证了关于敌人的实力、动向和企图，他同朱德、陈毅商量后，决定利用大柏地以南10里左右的麻子把山高坡陡，竹茂林密，谷地两头窄，中间宽，易于隐蔽埋伏的有利地形，把死命追赶红军的敌人诱入“口袋”阵，速战速决，打得特别漂亮，歼敌两个整团，活捉匪团长肖放平、钟桓，俘敌800余人，缴获枪械800余件。这就是著名的大柏地之战。粉碎了湘赣反动派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所谓“会剿”。毛泽东欢欣鼓舞，豪情满怀，唱道：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菩萨蛮·大柏地》）

毛泽东就是这样，利用读报所组织的特殊的情报系统，制订了正确的战术，打败了敌人，壮大了革命的声威。

毛泽东把读报看作是间接的调查研究，他曾说：“问题的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无须实地调查，及一时不能实地调查者，则从书册、杂志、新闻报纸三项着手研究。”

1935年秋，红军突破甘南的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9月18日，占领哈达铺。毛泽东亲自率领的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原计划要经过甘肃东北，以游击战争打通国际通道，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建立根据地。现在占领了哈达铺，怎么办呢？红军指向何方？真是个重大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9月21日下午到达哈达铺，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找到所有弄到手的报纸，聂荣臻、叶剑英也派通讯员送来报纸，和中央其他同志一起进行翻阅，查找信息，发现《晋阳日报》报道，陕北有红军5万余人。《大公报》也报道关于陕北，甚至陕南农村“赤化”问题；还报道陕北红军完全占领着延安、延长、保安、安塞等县城。从而了解到，陕北确是和敌人周旋的好地方，又有刘志丹的根据地，红军的力量还不小；还知道了徐海东的二十五军也在这里。他们所建立的根据地，是红军长征后唯一的一块完整保存下来的

根据地。毛泽东认为，陕北地域辽阔，群众生活艰苦，又是穷乡僻壤，还有几万红军，是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的好地方。

于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彭德怀等研究，作出重大而英明的决策，改变初衷，到陕北去！并立即召开干部会议，他说：“我们要北上。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要北上抗日，首先到陕北去。到陕北只有七百里了，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现在改称陕北支队，由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我兼政委。”红军整编，继续北上，10月19日，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吴旗镇，与陕北红军会师，胜利结束长征。全军上下，欢欣鼓舞，有诗赞道：

红军越岷山，哈达大整编。
万里云和月，精兵存六千。
导师指陕北，军行花道妍。
革命靠路线，红星飞满天。

毛泽东不但借读报，了解天下大事，进行间接调查研究，作出重大决策，消灭敌人，夺取胜利，而且利用报纸，阐述革命道理，指导解放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1948年7月至1949年1月，我胜利结束了辽沈、淮海、平津大决战之后，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妄图阻止中国革命继续前进，想拖延时间，重整军队，卷土重来；不得逞，也要使中国划江而治，分裂中国。为此，毛泽东亲自写了元旦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揭露敌人，教育人民，绝不能骄傲，半途而废，一定要彻底埋葬蒋家王朝。

另外，在革命发展到即将全面胜利的时候，也易产生骄傲情绪。所以，毛泽东1949年3月23日把进北平谐称之为“进京‘赶考’”，还说：“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大军摧毁敌人长江防线，歼灭守敌，胜利渡江。为此，4月22日，毛泽东亲自写了《新华社长江前线二十二日电》的电讯稿，赞扬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摧枯拉朽，渡过长江，并赞扬解放军正以自己的英雄式战斗，直捣南京。

4月23日，解放南京。下午，毛泽东起床后，坐在院落凉亭里的藤椅上，阅读《人民日报》号外，心情高兴，触发灵感，诗兴勃发，遂进屋写下寓意深沉、气象宏伟、格调崇高的珍贵诗篇《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毛泽东以神来之笔，点铁成金，总结历史的教训，阐述深邃哲理，明确地告诫大家，占领南京是伟大的历史事件，标志着蒋家王朝的覆灭，新中国即将诞生，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必须防止骄傲自满的情绪和停顿下来不再前进的情绪，革命历程辽远，同志仍须努力，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鼓舞全党全军永葆革命青春，保持旺盛斗志，继续前进。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著名诗篇：《七律二首·送瘟神》，可知道，这两首诗熔铸了毛泽东多少对人民的深情挚爱啊！

仅以江西余江县兰田坂为例，方圆50里，近50年内，患血吸虫病而死

亡的竟达 3000 余人，20 个村子完全毁灭，14000 多亩田地变成荒野，严重危害人民的健康，影响生产，有首民歌唱道：

兰田权的禾，亩田割一箩。

高兴两人抬，不高兴一人驮。

对血吸虫病，国民党“治”了 20 年，日本也搞了几十年，都没搞出什么名堂来。解放后，毛泽东在 1955 年冬农业合作化高潮期间，就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1956 年还亲自制定了消灭血吸虫病的规划。1958 年夏毛泽东视察杭州，7 月 1 日子夜，读到《人民日报》关于余江县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开展群众运动、两年消灭血吸虫病的报道：《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和《反复斗争，消灭血吸虫病》的社论，十分高兴，一连读了几遍，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连声说：“好！好！全国都这样那该多好。这种小虫可害人哩，余江人民消灭了血吸虫病，我看了高兴。”他心潮澎湃，极为激动，伏案疾书：“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遂成《七律二首·送瘟神》。

第一首写小虫肆虐，人民苦难。第二首，则是写欢欣鼓舞的心情，颂扬人民群众改天换地的伟大斗争，以及非凡的创造性，谨录于后：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调动敌我兵力掌握战局主动

战争、战役和战斗，都是敌我双方各种因素的较量，诸如人力、军力、财力等等。虽然不能要求指挥员超越客观物质条件，去创造奇迹，却可以而且应该要求指挥员，充分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条件，多打胜仗。所以，打仗的胜负往往不完全决定于诸多物质因素，而取决于对战争、战役、战斗的主观指导正确与否。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又取决于指挥者对敌我双方能否有真实的了解，从而作出符合战争规律的决断，正确地指挥战斗。古人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这已是中外军事家所公认的真理，也为许多著名战例所证实。

延安保卫战中，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23万人，美式装备，飞机、大炮、坦克车，物资条件不能说不优越，军势不能说不“强大”。而我军仅两万多人，还包括中央机关，装备很差，小米加步枪，物资条件不能说不“低劣”，军势不能说不“弱小”。然而作战的结果，却是敌人败了，败得很惨；我们胜了，胜得很伟大。关键全在于毛泽东知己知彼、决策的英明，不仅善于指挥自己，而且善于指挥敌人。

战争中的指挥者，能在全面、深入、正确地了解敌我的前提下，指挥自己的军队，取胜于敌，已是高明的指挥员。若不但善于指挥自己，而且善于指挥敌人，百战百胜，则需要指挥员具有精湛的军事理论和高超的指挥艺术。在延安保卫战中，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便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1946年7月，蒋介石反动派撕毁国共两党的和平协议，置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渴望于不顾，悍然挑起内战。到1947年7月，蒋介石损兵折将100多万。几个月消灭共产党的牛皮吹破，可又不甘心失败，“全面进攻”破产，又来“重点进攻”。毛泽东胸怀全局，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明察秋毫。并清楚地知道，敌人表面气势汹汹，其实已是强弩之末，战争已到了发生重大转折的历史关头，所以他作出了“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决策。为达到此目的，一方面指挥我军开始全国性的战略大反攻，另一方面则指挥敌人，步步趋于灭亡。其指挥艺术的神妙，令人惊叹不已。

毛泽东顾全大局，兼及局部，不失时机，着着神机妙算。你不是气势汹汹重点进攻我山东吗？好，我大踏步后退，把几十万敌军引入胶东半岛；你不是险恶毒辣，要打击我首脑机关，破坏我神经中枢吗？好，给你延安，也把几十万敌军引入陕北。然后摆开“品”字阵，顺利作战略展开，令我刘邓大军实行中央突破二过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把一把尖刀插进敌人心脏。毛泽东就这样将计就计，使敌人重点进攻阴谋破产，为我军的全国大反攻的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

不但指挥自己，而且指挥敌人，是毛泽东的指挥艺术，向来如此。在胡宗南占领延安前，毛泽东就预计好，要在青化砭先消灭一部分敌人。开始一部分同志不同意撤离延安，并要“不放弃一寸土地”，“誓死保卫延安”等。毛泽东说：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蒋介石打仗争地盘，要延安，要开庆祝会；我们打仗是要俘虏他的兵，缴获他的武装，消灭他的有生力量。他打他的，我打我的。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等蒋介石算情这笔帐，后悔也迟了。蒋介石占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等他背上这个很重的包袱，然后我们收拾他，他就要倒霉了。我军官兵思想通了，于是群情激昂，上下同心同德，积极主动。

毛泽东神机妙算，料定胡宗南这头蠢驴占领延安之后，会不可一世，必寻我主力决战，延安立足不稳，就会向蟠龙镇伸展。青化砭是延榆公路的咽喉，形势险要，非常有利于我隐蔽，消灭敌人。

所以，毛泽东派一支部队，佯装主力，“指挥”敌人主力“追”向延安西北，集中我军优势兵力，埋伏于青化砭，布好口袋阵，以逸待劳，打则必胜，而且速战速决。等敌人主力发现上当，急忙折回，敌三十一旅3000多人，已被我聚歼，还活捉了敌旅长李纪云，我军已无踪影，不知去向了。

20天以后，又在羊马河消灭了敌一三五旅，歼敌2000余人，活捉敌旅长麦宗禹。敌人气急败坏，更急于找我主力决战，毛泽东又顺势，布署了蟠龙镇战役。

毛泽东先命令我军以1个旅的兵力，把敌人9个旅，由蟠龙——瓦窑堡一线，引向绥德，敌人果然乖乖听从指挥。尔后，毛泽东指挥我主力部队，抄敌人后方。两天两夜的激战，收复了蟠龙镇。这里的弹药、物资、军衣、白面，堆积如山，正好充实装备我军，壮大军力，等敌人发现再次上当，要赶回蟠龙镇，得六七天路程，已是来不及了。胡宗南只好呼天抢地，叫苦不迭了。又一次证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伟大，是不可战胜的。

出于全局考虑，为配合陈谢大军出师豫西，威胁西安，支援刘邓大军南下，直取大别山，毛泽东决定我军出击榆林，且攻战激烈，进一步指挥敌人北上。

蒋介石的牛鼻子果然又被毛泽东牵动了，胡宗南慌忙把主力调往北线：一路钟松，率三十六师顺长城东进；一路刘勘、董钊统7个旅，顺咸榆公路北上。蒋介石也大驾亲征，亲飞延安督战。

敌人被我调动之后，毛泽东又顺势命令我军撤出榆林战斗。赶到榆林的钟松骄横不可一世，欲追击我主力决战。战机又来了。我军把钟松包围在沙家店之后，首先围歼了由乌龙铺向常家高山龟缩，想救钟松的敌第三十六师一二三旅，仅用两小时，就活捉敌旅长刘子奇。

被包围在沙家店的钟松，更加惊恐万状，舍命突围不成。胡宗南大骂钟松无能，命令他死守待援，又大加申斥破我阻击于霞县的刘勘援榆不力。敌人象被捣了的马蜂窝，乱糟糟，好不热闹。沙家店战斗，从黄昏打响，我西北野战军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发起猛攻，到天黑便结束战斗，也仅仅用了两个小时，便全歼了胡宗南的看家铁师第三十师6000余人。几天前钟松还凶焰万丈，叫嚣一战结束陕北战争，沙家店一战，却土崩瓦解，一命呜呼了。

至此，我西北战场，连连告捷。敌人乖乖听我指挥，被牵着牛鼻子转悠，晕头转向，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被我狠狠地揍了致命的几拳，敌人的嚣张气焰已被我完全打掉了。西北战场，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以后我军又取得宜川、瓦子街等战役的胜利，浴血奋战一年又一个月零三天，延安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毛泽东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撤离延安时，毛泽东在枣园对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说：“胡宗南和我们不是一个想法，他拼命要来延安，我们只好走。再过一年，最多两年，我们回到延安，再请你来，那时，你愿住多久就住多久。”现在她听到延安重新解放的消息，赞不绝口，连连说：“毛泽东英明！毛泽东英明！”毛泽东英明，就英明在“知己知彼”、“多算胜，少算不胜”（《孙子·计》），善于在历史关键时刻作出正确决策上；就英明在指挥艺术高超，不但指挥自

己，而且成功地指挥敌人上。毛泽东自己也曾风趣他说：“我们怎么想，敌人就怎么做，有什么办法？”

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这样的战例很多，如井冈山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震惊中外，使敌人目瞪口呆的“四渡赤水”战役；辽沈战役中首战攻歼锦州；淮海战役中首战歼灭黄伯韬兵团；平津战役中首战攻歼张家口、天津等等，都证明毛泽东胸怀雄兵百万，料敌如神，既指挥自己，又指挥敌人，用兵如神的军事艺术的高明。

《孙子·谋攻》曰：“知胜之道”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中心便是“知己知彼”，既指挥自己，也指挥敌人，也是以此为理论基础的。

看来毛泽东是深谙此用兵之道的，岂但熟谙中华民族优秀的军事传统，而且能在现代化战争中，加以创造性的丰富与发展。不仅熟“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并且熟知，可以战，则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每战必胜；不可以战，则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我时，让你打不着，我打你时，就一定吃掉你。不仅“识众寡之用”，并且熟识变战略上的劣势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最后转化为战略上的优势，以寡敌众，以少胜多，取胜敌人。不仅了解“上下同欲者胜”，并且有整套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和制度，又有“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保证。不仅熟知“以虞待不虞者胜”，并且形成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军事原则。不仅深知“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并且能做到有贤必知，知贤必用，用贤必任。延安保卫战中，决策由毛泽东和党中央，而战役指挥则完全交给毛遂自荐的彭德怀将军。在华东战场，决策由陈毅，而战役指挥则完全交给较年轻却是常胜将军的粟裕。

不过，归根结蒂，还是“知己知彼”。1949年5月2日，毛泽东约柳亚子先生同游颐和园，泛舟湖心，谈起中国革命即将胜利时，柳亚子先生说：“共产党要胜利，这是肯定的。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正确，合乎民意，人民拥护支持，这就是胜利的基础，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胜利会这么快。人民解放军很快渡江成功，并且占领了南京，我们不知道毛主席用的是什么妙计。”毛泽东却说：“打仗没什么妙计，如果说有妙计的话，那就是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还有，就是先生说的，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

所以，无论是延安保卫战的胜利，还是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都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军事思想与中国革命的军事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人民战争的胜利，也是毛泽东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军事传统，高超的指挥艺术的胜利。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一党的领袖，一军的统帅，他的成败，绝不在于做成功某项事业，打赢某一战役，而在于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作出切合历史与战争规律的决策，把革命逐步引向胜利。毛泽东就是一位能在历史关头作出英明决断的伟大领袖和军事统帅。

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发展到危机关头。蒋介石反动派磨刀霍霍，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又使党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毛泽东虽有“保存武力”，才有办法应付事变，“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的主张，但却得不到肯定与实行。待到“八七”紧急会议举行，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确立了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的

路线之后，当时的党中央负责人瞿秋白要毛泽东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毅然决定：“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决然回湖南，组织领导了决定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秋收起义，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却又不受所限，陷于教条主义，而是走自己的路，创造性地开辟了以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占领城市的“井冈山道路”，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34年底，“左”倾机会主义先是以拒敌于国门之外的阵地战，代替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使30万红军惨遭失败，损失百分之九十，根据地也丧失殆尽，被迫作战略转移；继之以“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的逃跑主义，使红军损失惨重，仅存3万多人。

又是一个历史的危机关头。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他当机立断，作出决策，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导演了历史上威武雄壮、光彩夺目的四渡赤水战役，把红军从四五十万敌人重兵围追堵截、重重包围的绝境中解救出来，机动灵活，连打胜仗，恢复了主动，摆脱了敌人，从而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长期统治，也使蒋介石反动派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的图谋破产。又一次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1936年，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蒋介石却坐镇西安，迫令张学良、杨虎城进攻陕北。张学良出于民族大义，多次“哭谏”，要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蒋介石却冥顽不化，张、杨遂进行了“兵谏”，活捉蒋介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这又是一个关系到中华民族和国家命运，也关系到我党我军命运的关键时刻。

毛泽东高瞻远瞩，顾及民族危亡之大局，不计一党一人之恩怨，并以十月革命活捉绞杀尼古拉·拿破仑兵败滑铁卢被擒充军作比较，说服党人国人，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不但不杀蒋介石，而且主张释放蒋介石。这就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冷静监视”、“以华治华”、“不战而胜”的阴谋，也使汉奸何应钦挑起更大规模内战的狡诈伎俩破产。遂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共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毛泽东语）就连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也看透了其中的高妙：“中国得了利，日本失了利。”

毛泽东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范，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胸怀，所作出这一的英明决策，这一历史壮举，民族义举，再一次震惊中外，不知感动了多少爱国、正直的中华热血男儿和世界上有远见卓识的和平友好人士！

毛泽东以政治家的宏大气魄，关键时刻作出英明决策的先例很多，如重庆谈判，靠反共起家、双手沾满革命人民鲜血的蒋介石，居然戴起和平的假面具，在1945年8月14日到23日，一连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毛泽东系党、国家的安危于一身，完全出乎美蒋反动派的意料，作出亲赴重庆谈判的决策，粉碎了美蒋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获得中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钦佩！又如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我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的大决战胜利之后，对是否过江，当时党内意见不一，有一些国际朋友，也不同意过江，怕美国干涉，引起世界大战。

这确是关系到革命继续前进和就此止步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毅然决策，百万雄师过大江，埋葬了蒋家王朝，将革命进行到底。这就避免了“划江而治”的民族分裂的悲剧。

最典型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关于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了。

1950年，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刚以蹒跚的脚步跨进第二个年头，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同时派第七舰队强占我台湾海峡。仁川登陆，越过“三八线”，逼进鸭绿江，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屡次侵犯我国领空。与势汹汹，张牙舞爪，疯狂之极，恨不得要把这半边地球吞掉。

怎么办？出兵吗？面对的可是世界头号、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可是关系到新中国的安危，关系到世界的和平啊！

毛泽东在党内认识不统一，国际朋友存有疑虑的情况下，经过不知多少日日夜夜，苦思焦虑，多方运筹，不怕威胁，不怕核讹诈，以空前的勇气最后作出了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的英明决策。并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10日连打五个战役，皆传捷报，歼敌23万余人，把敌人赶回“三八线”，稳定了战局，迫敌停战，连美国的评论家都说：“毛泽东在一系列得心应手的运动战中征服了中国，最后他的部队，在朝鲜又以阵地战顶住了美国，毛泽东打了他一生竭力避免的阵地战。”美国侵略者自己不得不承认，这是选择“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对象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毛泽东为维护朝鲜人民的利益，保卫新中国的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也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在中国和世界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胜败输赢各有术 扬长避短巧用兵

在人类所从事的各种活动中，再没有比战争更充满辩证法的了。尤其战争发展到决战阶段，各个战役和战斗都特别激烈、复杂、变化多端，指挥上最不容易。所以，作战双方的指战员，对于战争中的辩证法的了解和运用，往往直接影响战争、战役、战斗的进程，甚至胜败。尤其是指挥员，头脑中多点辩证法，少点主观片面、形而上学，就会转化成强大的物资力量，就会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夺取胜利。战争的指挥，也是一门艺术，是闪着刀光剑影、充满豪情和悲歌，影响所致甚至决定历史发展的一门艺术，是包含丰富多彩的辩证法的一门艺术。

优势与劣势

在三大战役决战的初期，敌人的总军力，仍有 365 万余人，而我军才有 280 余万人；敌人所占地区和人口都多于解放区，又有美帝国主义在人力、财政上的大力援助，军事装备上也还比我占优势。毛泽东是如何促使这种优势与劣势的转化的呢？

充分利用有利于我军的战争趋势。敌人已由战略进攻被迫改为重点防御，江河日下；而我军为正义之师，已由战略防御变为战略进攻，日益强大。单说军事，蒋介石反动派，妄图以重点防御，盘踞东北，稳住华北，确保中原，经营江南，卷土重来。毛泽东则顺势作出巧妙的部署，把敌人分割为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五个孤立的战场，每个战场又实行战役分割，如东北战场，把敌 60 余万大军分割为锦州、沈阳、长春三个地区，淮海、平津也无不如此，我又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包围、歼灭敌人的战术，所以，在战役和战斗上，就都处于优势了。这许多局部的优势，汇集起来，就造成我战略上的优势。终于打败了蒋介石，解放了全中国。

主动和被动

战争、战役和战斗，在许多因素，如军力、地域、装备等等上面，都处于优势的一方，由于主观指挥上的错误，并不一定处于主动地位；而在诸多因素，如地域、财力、装备等等，处于劣势的一方，由于主观指挥上的正确，也就不一定处于被动的地位。

三大战役，毛泽东决策首战东北，便从战略上取得主动。因为东北在地域、人力、物力、军力上，我军都处于优势。若首战指向华北，则有可能遭华北、东北之敌夹击，使我腹背受敌，陷于被动。也可能促使东北之敌撤退，增援华北和华东的敌人，甚至会造成我战略上的被动。

单看辽沈战役，毛泽东决策先打锦州，便使东北战局满盘皆活。不仅攻歼锦州，造成“关门打狗”的态势，使敌人处于被歼的境地，而且可以促使沈阳之敌卫立煌派军援锦，正好又造成我攻坚打援的态势。真是一着得当，着着主动。结果是攻占锦州，歼敌 10 万；打援一战，又歼敌 10 万。迫使长春之敌一部起义，大部投降，沈阳之敌被聚歼，夺取了东北战役的完全胜利，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的指挥艺术的高超。

如果先打长春之敌，把主力部署于沈阳附近的新民及其以北地区，准备打沈阳出来的敌人，即使攻歼长春之敌，但沈阳之敌却会因受我军威胁太大，而不敢出来。还可能促使蒋介石增援锦州，或促使锦、沈之敌撤出东北，那就有可能使我陷于被动了。由此看来，军事指挥员的主观的正确决策，对于取得实战上的主动，何等重要。

战略歼灭与战役分割

辽沈、淮海、平津大决战，是我军由防御转为进攻，而敌人由进攻转为防御的结果，而我军在防御阶段，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运动战，也随之转化为反攻阶段以消灭敌人强大兵团为主的阵地战。这是个战略性的变化。可就战略上看，单说军力，敌军尚有 365 万余人，我军 280 余万人，敌人似仍占优势。除东北战场外，淮海、平津战场敌人军力上也占优势。在这种敌我军力对比的情况下，如何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军事原则呢？毛泽东说：

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脱出的，方法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们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这样的转变，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

在三大战役的实战中，是怎样“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造成我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的呢？首先把蒋介石的数百万军队，分割在五个孤立无援的战场，然后巧妙部署，实施战略包围，使敌人动弹不得，这就把敌人抛入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接着对各个战场的强大之敌人兵团，实行战役战术分割，肢解体割为若干孤立部分，造成各局部上我军的优势和敌人的劣势，最后以我优势兵力，实行战役战斗上的歼灭，最终达到战略上的歼灭。

辽沈战场，敌人 55 万余人，而我军 100 万余人，本处优势，又加之把敌人实行战役分割，造成了锦州、长春、沈阳三个地区的孤立态势，然后以优势兵力，逐个歼灭了范汉杰、廖耀湘兵团、长春之敌、卫立煌集团，全歼东北之敌。

淮海战场，敌人 60 余万人，而且实行以精锐部队为核心，猬集一起，密集防守，使我难啃难吃的战术；我军华东野战军 16 个纵队，中原野战军 6 个纵队，加上地方武装，也有 60 余万人，并不占绝对优势。但我军实行以优势兵力歼其一部的战术，首先打掉黄伯韬兵团，把敌人实行战役分割、包围，在几个战役局部上，我军都居于优势地位。然后逐个围歼了黄维兵团、杜幸明集团，最后达到了战略围歼的目的。

华北战场，傅作义拥重兵 60 余万，我华北野战军也不占绝对优势。但待我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以后，与华北野战军一起，则处于绝对优势了，加之对敌实行战役分割，造成敌人津塘、北平、新保安、张家口等几个地区的孤立态势。然后，逐个歼灭，先歼新保安、张家口之敌，再歼天津之敌，后和平解放北平，最终达到战略歼灭的目的。

由此看来，要达到战略歼灭的目的，就必须对敌人实行战役包围，先造成局部上的优势，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实行各个歼灭，而且是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实现战略歼灭的总目标。

运动战与阵地战

无论进行什么性质的战争，要壮大自己，消灭敌人，攻城略地，夺取政权，运动战和阵地战，都是基本的作战形式，而且这两种形式又是以军力、财力和主观指挥的正确与错误的诸因素而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

在解放战争的初期阶段，敌强我弱，敌大我小，敌人占据优势，处于进攻地位，而我军暂居劣势，处于防御地位，所以只能以运动战为主，在运动战中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不拘于一城一地的得失，绝对不消耗之战，不打无把握之战。

待战争发展到 1948 年 6 月，虽然敌军力数量上仍占优势，又有美帝国主

义的大力援助，但从战略上看，敌人已处于战略防御，只有招架之力了。而我军却处于战略进攻、占据主动的地位了。我军也由占领农村、包围城市，转化为夺取城市，由消灭分散、孤立、弱小之敌，转化为围歼集中、强大之敌。这也就必然造成以阵地战为主的局面。即使到这时，运用两种战术形式，虽有主次之分，但仍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的。

辽沈战役中，攻歼设防坚固，又有十几万强大敌军防守的锦州是攻坚的阵地战；在塔山以近3个纵队的兵力，阻止敌人援锦的9个师，则是阻援的阵地战。而我军解放锦州，便挥师北上，迎击廖耀湘兵团，并在运动中加以围歼，又是运动战在前的阵地战。总之，东北战场，是以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而集中优势兵力攻歼锦州的运动战开始，又以围歼沈阳的卫立煌之敌的阵地战结束。

在淮海战役中，我军以11个纵队，侧击、攻击、截击西撤的黄伯韬兵团，是运动战；而最后围歼黄伯韬于碾庄地区，就成了攻坚的阵地战。阻击邱清泉、李弥12个师东援，则是防御中的阵地战。歼灭黄伯韬兵团之后，挥师包围黄维兵团于蒙城东北的双堆集地区，是运动战；最后把他歼灭，就成了攻击的阵地战了。所以，整个战役，也是以消灭黄伯韬兵团、分割包围敌人的运动战开始，而以逐个围歼黄维兵团、杜幸明集团的阵地战结束。由此看出战争发展的必然规律，也看出运动战与阵地战之间的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在于恰到好处地运用运动战和阵地战，并使这两种战法达到和谐辩证统一的极高境界。

初战与决战

在组织战略决战中，初战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往往决定整个战局的方向，影响决战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劣势、主动和被动的转化。甚至初战的胜负，会决定战争全局或战役全局的胜负。所以，必须从决战全局的高度来确定初战，从而使初战和决战取得胜利有绝对把握。

历来的军事家虽然都对初战极为重视，极为谨慎，但初战指导的艺术，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象毛泽东那样，从理论上达到如此的成就，在实战上达到得心应手的地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初战东北，战略主动，稳操我手，为淮海、平津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东北战役，又首战锦州，确保了“关门打狗”的战术的成功和全歼东北之敌的胜利。又如淮海战役初战歼灭黄伯韬，战役之始，先断刘峙一臂，使其成为独臂将军，完成了对淮海战场80多万敌军的分割包围，奠定了淮海战役决战取胜的基础。再如平津战役初战攻歼张家口、新保安，绝傅作义西窜之望，接着解放天津，断其从海上逃跑的预谋，斩头去尾，使傅作义处于四面楚歌的绝境，遂使和平解放北平成功，创造了解决敌人的三种方式中的一种——北平方式。

战略决战的初战辽沈，而辽沈战役的初战锦州，淮海战役的初战歼灭黄伯韬，平津战役的初战新保安、张家口和天津，都是从整个战役的全局和战略决战的全局出发的，初战与决战都有着严密的逻辑联系。所以，初战胜利，便成势如破竹、排山倒海之势，取得各个战役、最终取得整个战略决战的胜利。三大战役和战略决战的初胜，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提出的“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的初战原则，成为初战取胜的光辉战例。

速决与缓歼

“兵贵神速”，“战贵速决”，这是兵家常识，但也不可绝对化，由于战役决战或战略决战的需要，本来可以速决的战役或战斗，也可缓决，暂时留住敌人，不予歼灭。

辽沈战役中，对锦州一战，即为速决。毛泽东命令林彪、罗荣桓：“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并且“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要“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所以，东北野战军，便以6个纵队和1个炮兵纵队、1个坦克营的兵力，围攻锦州，另以两个纵队配置于锦州西南的塔山、高桥地区，3个纵队配置于黑山、大虎口、彰武地区，阻击援锦之敌，确保锦州攻坚战的速度。

我军从1948年10月14日对锦州发起进攻，仅经过31个小时，便全歼锦州之敌，俘获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以下10余万人，解放锦州。这么大规模的战役，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胜，其激烈程度可以想见，是为速决的典型战例。而对长春之敌则采取了缓歼的战术。开始，长春在我包围之下，完全易于歼灭，但这样打法却不利于辽沈战役全局，反有可能增加全歼东北诸敌的困难。先打掉锦州，迫使长春之敌一部起义，大部投降，不战而胜，岂不妙绝。

在淮海战役中，歼灭黄伯韬兵团，便是速决，所以，把此一战作为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并作了以6至7个纵队歼敌3个师的部署。从1948年11月6日开始，到22日结束，仅16天时间，便歼灭了黄伯韬兵团，击毙了黄伯韬，还歼灭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东援的12个师之一部。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从11月23日到12月15日，我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配合，又围歼了黄维兵团，生俘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吴绍周，同时歼灭了由徐州西逃的孙元良兵团。这时杜幸明直接指挥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弃徐州西逃，也被围于永城东北的青龙集、陈官庄地区，本易于消灭，毛泽东却命令对其缓歼，待到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同华北野战军一起完成对平津地区之敌的分割包围之后，再歼灭杜幸明集团，此又一妙着。平津战役的初始阶段，对从塘沽、天津等地到新保安、张家口等地之敌，或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待到淮海战役彻底胜利，再将平津之敌斩头去尾，以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予以解决，更是缓歼的典型战例。

由此看来，速决和缓歼，全是依据战略或战役全局的需要而互为表里，不可分割。速决，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具备了战役全局的态势、敌我军力、财力等等都有利于我的条件；缓歼，不是不歼，“缓”而已，时机一到，坚决歼灭，关键是依据全局的需要，掌握好时机。一旦部署既定，有了稳操胜券的把握，最终还是要彻底解决问题的。

主攻与助攻

按照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军事原则，每战，必以我军主力歼灭敌人，而以少数军力予以配合，但也不可绝对化。毛泽东处理这二者的关系，也以实战需要，极为灵活。淮海战役中首战围歼黄伯韬兵团一战，便是很好的战例。

毛泽东的部署是，以6至7个纵队围黄伯韬3个师，却以一半的兵力（即5个至6个纵队）担任阻援和打援，以对付邱清泉、李弥两兵团12个师的援助，并歼敌一部，达到顺利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对其余诸敌实行分割包围，又断敌海上逃跑的目的。

一般情况下，主要兵力应集中使用于攻歼目标上，毛泽东却在我兵力充足、敌军兵力集中、又不违背集中优势兵力以歼灭敌人的原则的情况下，采取了几乎相反的战法，创造性地处理了战役目的和手段既统一而又有区别的辩证关系，即主攻和助攻的辩证关系，灵活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既歼灭了黄伯韬兵团，牵制阻击了徐州敌军强大兵团的东援，又为以后各个战役阶段的胜利，如歼灭黄维兵团、最后歼灭杜幸明集团，创造了有利条件。

军事歼灭与政治攻势

任何战争，消灭敌人，都是以军事手段为主的。因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最终解决问题的极端手段。任何敌人都不会自动放下武器，立地成佛，退出历史舞台。这就象打扫灰尘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但军事手段也不是消灭敌人的唯一手段，在一定条件下，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以瓦解敌军，也是重要手段之一，在处于军事优势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如汉刘邦围项羽于垓下，以“四面楚歌”的政治攻势，瓦解了项羽的军心。项羽自知大势已去，又无颜见江东父老，最后自刎乌江，留下一曲悲歌，便是很好的战例。

毛泽东的英明之处，超人之处，在于把军事歼灭和政治攻势这两种消灭敌人的方式，都科学化，一体化，艺术化了。关于以军事、政治手段消灭国构外的敌人（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境战争等），毛泽东有着高深的理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创造性地总结出游击战、运动战等一系列的战略战术，以及政治攻势的方式方法，成为马克思主义军事宝库中的瑰宝。就连我们的敌人，也不敢忽视，也不敢不研究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和战略战术原则。在三大战役中，由于我军节节胜利，国民党败局已成，敌人内部各种矛盾，都迅速扩大化尖锐化了，也为我军运用政治攻势瓦解敌军提供了客观有利的条件。

在辽沈战役中，歼灭了锦州顽抗的范汉杰和自投罗网的廖耀湘之后，整个东北敌军陷于覆灭的境地。我军便运用政治攻势，瓦解敌人，遂使长春之敌曾泽生部起义，郑洞国部被迫投降，也就造成沈阳卫立煌被歼成为定势。

在淮海战役中，我军在歼灭了黄伯韬兵团之后，处于强大的军事优势，便利用政治攻势，争取了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等部的起义，迫使孙良诚、赵壁光、黄子华等部的投诚。在围歼杜幸明的时候，也发出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组织了强大的政治攻势，虽杜聿明拒不投降而遭歼灭，做了俘虏，但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也争取了敌人官兵 14000 余人来降。可见政治攻势的巨大威力。

在平津战役中，这两种进攻形式，运用得更加纯熟、卓有成效。对平津之敌采取了“先礼后兵”的方法，先晓之以理，指出敌人面临被歼和接受和平解决两条路；后动之以情，为中国人民和官兵免遭生命财产损失，以后视敌人的不同态度采取了三种处理方式。对新保安、天津等顽抗之敌，采取坚决、彻底、干净歼灭的方式，而对北平之敌，则继续采取强大的政治攻势，讲清国内外形势，晓之以民族大义，保护古都，免遭后人唾骂；动之以深情厚谊，甚至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亲自做傅作义的工作，遂促使他坚定了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决心，使古都北平的解放兵不血刃，同时也挽救了他自己，由反革命战争罪犯，成为对民族、对国家有了贡献的“大功臣”，还通过他促成了绥远国民党残部的起义。

由此，毛泽东创造性地总结出解决敌人的三种方式：天津方式、北平方式、绥远方式，不过，运用这三种方式，必须注意两点：一是立足于军事解决，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敢于顽抗的敌人。正如毛泽东所说：“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二是在造成强大的军事优势的威慑之后，再充分利用政治攻势，而且必须明白，这也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幻想不通过各种方式的斗争，便使敌人起义、投降是不切实际的。当然，不充分利用军事优势，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不认真地、耐心地做敌人的工作，一味地军事解决问题，也是形而上学，缺少辩证法。

革命军队和人民群众

任何战争的成败，都主要取决于这两个因素，最终取决于人民群众的人心向背。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水能载舟，亦可覆舟”，在战争中尤其明显。我们解放战争的胜利，便是充分调动了军队和人民群众这两大因素的积极性，并使这种积极性发挥到极至。

在三大战役决战之前，党在军队中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开展了“三大民主”、立功运动、政策教育等政治思想工作，大大激发起广大官兵的革命热情和革命主动精神，能在以后的战斗中以惊人的毅力，高度的智慧，灵活的战术，勇猛无畏的牺牲精神，完成作战任务。在群众中，进行伟大的土改运动，调动群众的积极性，鼓励其发展生产，光荣参军，支援前线，形成“前面打蒋军，后方挖蒋根”的热潮。

在三大战役中，辽沈战场上，六七十万军队直接投入战斗，30余万人作为后备兵源，另有13800余副担架，36700余辆大车，96000余名民工，支援前线，随军行动。淮海战场上，直接投入战斗的60余万军队，40余万地方武装，配合作战，200余万民工推车挑担，支援前线，军队打到哪里，人民便支援到哪里。我军与民的比例，竟达到了一兵一民，一兵二民，甚至一兵三民的程度。

这就把革命军队和人民群众，军队和地方，前方和后方，全部动员起来，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无法逃脱灭顶之灾。兵民是胜利之本。所以，战略大决战的胜利，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的胜利。

总之，无论是战略决战的整体，还是三个战役阶段，还是三个战役阶段的各个战斗，无不处处充满敌我双方的矛盾，无不充满辩证法，而且敌我双方，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军事与政治等等，无不依时间、地点、军力、人力、物力、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诸条件的不断变化而转化。毛泽东作为伟大军队的最高统帅，他的英明伟大在于，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胸怀和胆略，以科学的战略战术，在六亿神州的大地上，导演了一场史无前例、威武雄壮、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战略大决战，并使自己的军事指挥艺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战争的胜利！也不能不说这也是辩证法的胜利！

决战决胜决乾坤 妙手妙笔妙文章

翻开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纵横八千里，象辽沈、淮海、平津这样大规模的战略决战，是从未有过的。在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面上，几百万军队进行会战，如此复杂，如此激烈，也为中外古今少见。若把这一战略决战比作一篇宏伟壮丽、光照千古的文章，那么，象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这样，在六亿神州这片大地上，以如此高超纯熟的艺术才能，生花的妙笔，书写出如此丰富多彩、奥妙神奇的妙文，也该是亘古未有的大手笔。

1946年7月，独夫民贼蒋介石，自恃手里有400万军队，又完成了进攻解放区的“充分”准备，接收了100万日本侵略军的全部武装，再有美帝国主义军事、财政上的巨大援助，而解放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客观条件下却占“劣势”，所以，蒋介石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完全不顾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和平建国的愿望，撕毁了1946年1月间经过43天艰苦的重庆谈判而签订的国共两党的停战协定和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悍然挑起内战，又把中国人民投入血泊中。

但是战争自有它自己的规律，绝不依蒋的如意算盘而转移。蒋介石的军事力量的优势，帝国主义的援助，解放区的困难，都不过是暂时的现象，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性质，人心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

所以，战争到了1947年的下半年，仅仅一年，便出现了转折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扭转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

到1948年6月，解放战争就完全出现了新局面：军事上，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每况愈下，总军力由430万人下降到365万人，其中能作战的170余万人，被我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分割在西北、中原、华北、东北、华东五个孤立的战场上，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却在战争中艰难而迅速地成长，由120万人增加到280余万人，军事、政治素质不断提高，愈战愈强，一年多消灭了敌军100多万人，并依靠蒋介石这个优秀的运输大队长，不断武装自己，无论内线作战，还是外线作战，都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战斗力，不但能打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且能打攻城略地的大规模的阵地战，并且已经创造了四平、石家庄这样攻坚战的样板。事实表明，战争的主动权已完全操在我们的手里。眼下这篇文章如何做，就看毛泽东这位妙手的生花之笔了。

这里有段插叙，值得一提。

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蒋介石反动派便挑起内战。在延安的一个下午，毛泽东到河边散步，正好遇到美国友人马海德和夫人苏菲。老友相见，非常亲切，便坐在河边的石头上促膝谈心。马海德问哈尔滨能否保住，毛泽东说：美国帮助蒋介石运兵几十万到东北，要占领所有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我们也准备让给他，他暂时处于优势。让蒋介石高兴一点，将来消灭他也更容易些。马海德还问：蒋介石一共有多少军队？毛泽东说：他号称500万军队，实际上真正能打仗的只有300万左右。他如果往东北运去100万，还有200万，分布在全国各地。到那时候，蒋介石就没有后方了，他就会发现，他的末日来临了。他想挽救败局也来不及了。这使马海德非常感动，连声说：毛主席看问题，总是看得很远呀。战争的胜利，一定是中共的。

历史正是按毛泽东的预言前进的。到了1948年下半年，毛泽东的预言，就全部实现了！

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就象写一篇精妙绝伦的散文，内容复杂，变化多端，首先需要确定这篇文章的主题。有了主题，材料的取舍，布局谋篇，承转关锁，方法的运用等等，也就易于解决了。

当时面临的形势是：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又打内战，人民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军事上也有了这种可能，在力量对比上敌人形式上仍占优势的情况下，发展我们节节胜利的形势，组织力量，向敌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已完全可能。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敢于攻击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敢于同敌人强大的机动兵团作战，敢于打我军从未打过的大仗、恶仗，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作出了英明的决策，即这篇雄文的主题：决战！彻底打垮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这一战略决策，妙在抓住时机上，早则不成熟，晚则时不我待。正如1949年10月30日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篇社论中所说：“满洲的丧失是不可避免的，在撤退问题上唯一严重的错误，就是择时不当。”从反面证明毛泽东扑捉战机的无比英明和果断。

主题确定了，文章如何做？话要一句一句他说，文章要一段一段地写，即使有挥笔而就的才能，也无不如此。尤其困难的是开头一段。因为战略决战阶段的斗争，最激烈，最复杂，也最易变化，瞬息万端。也象一盘棋，一着投错，满盘皆输；一步妙棋，也可使满盘皆活。真是一笔九鼎，一子千钧啊！所以，战略决战之始，首战哪里，就成了决战的方向问题了。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毛泽东就说：“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这是指战略上说的。真要打败他，策略上需要一仗一仗地打，而且不得有半点疏忽，尤其全国各个战场的形势，都不同程度地有利于人民解放军，但眼前的决战，第一个战役由何处打起？这就需要。“知己知彼”了。毛泽东讲得就更透彻更鲜明了：“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的侦察、思索、判断、决心、部署是怎样的呢？

东北战场为卫立煌集团，55万余人，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的地区，通过北宁线锦、榆段与关内水陆联系；华北战场为傅作义集团，60余万人，分布于平绥线上的归绥、张家口，以及北宁线上的北平、天津、唐山、山海关等地，塘沽港是他们的补给线；太原的军伐阎锡山已被我解放军团团围住，已成瓮中之鳖；华东战场是刘峙集团，60余万人，分布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连云港，西至商丘的陇海线，以及南至蚌埠的津浦线上，企图阻止我大军南下；中原战场为白崇禧集团，75万余人，分布于平汉线南段，以及以武汉为中心的地区；西北战场为胡宗南集团，30余万人，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手下败将，被牵制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一隅。这5个集团已被我战略包围分割，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

这篇自古以来规模最大的战略决战的雄文，根据敌人这5个集团的特点及其分布状况，确定为三大战区，共分三大段：

1948年9月12日至1948年11月2日，进行了辽沈战役，歼敌47万余人，完全解放东北；

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进行了淮海战役，歼敌55.5万人，使解放长江以北，已成定局；

1948年12月上旬至1949年1月31日，进行了平津战役，歼敌52万余人，全部解放了长江以北，并为渡江，解放全中国，建都北京，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这位文章大家，运用一技妙笔，所写的这篇妙文，真是处处生花，处处生辉，其艺术境界，实在是妙不可言，纵使唐宋八大家再世，也哪里能比得上一二？

首先，在军事力量对比上敌人表面仍处优势的情况下，作出进行战略决战的伟大决策，就气势豪放，声威夺人，大有排山倒海、不战而胜的气势。其无产阶级战略家的胆略，已为世瞠目。

以下仅就几处妙笔，与大家共赏析。

妙笔之一，是首战东北。从政治上看，东北解放区已占97%，实力较强，军事上占绝对优势；而敌人孤立分散，态势突出，地区狭小，补给困难。另外敌人曾有“撤退东北，巩固华北，确保华中”的计划，但蒋介石优柔寡断，举棋不定。首战东北，完全符合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如“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等等。在战役上完全有了战必胜的把握。先打东北，也使蒋介石“撤退东北，巩固华北，确保华中”的梦想成为泡影，同时还避免了我先打华北，则会两面受敌的被动局面，真是扬己之长，击敌之短，一石三鸟的妙着。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这一战略方向的确定，是何等的英明！其宏图大略，全局在胸，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指挥才能，是何等的惊人！

妙笔之二，是进行东北战役，绝不先打长春，中敌人牵制我军的奸计，而是先打锦州。打下锦州，满盘皆活，所以，毛泽东在1948年9月7日给林彪、罗荣桓的电报中说：“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10月10日，毛泽东又电令林彪、罗荣桓：“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锦州战役的胜利，完全证明毛泽东的战略构想：因锦、榆、唐一线敌人互相孤立，遂使打锦州的攻坚战成为确实可靠。打锦州是击敌要害，所以锦州打响，蒋介石便急忙飞抵沈阳，坐阵督战，甚至锦州已被我解放，蒋介石还下死命令，让廖耀湘夺回锦州。正因为如此，使我“打其必援”的战术又得以实现。攻占锦州，歼敌10万，攻坚打援，又歼敌10万，卫立煌集团就成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囊中之物，我军关门打狗的态势遂成；解放锦州也成了逼长春之敌一部起义、大部投降、我一举解放沈阳的伏笔。

妙笔之三，辽沈战役于1948年9月12日打响之前，在9月7日给林彪、罗荣桓的电报中说：“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而另一方面却命令华东我军避免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并且明确具体地指示，即使歼灭敌人，也不要超过一两个整编师。

这一笔妙在，既可以使蒋介石继续做他的盘踞东北的梦，又可以促使蒋介石“撤退东北，巩固华北，确保华中”的计划继续“优柔”下去，直至卫

立煌集团的覆灭。如果华东我军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势必促使蒋介石下撤退东北的决心，真的如此，毛泽东把卫立煌集团封闭在东北加以各个消灭的构想就不能实现，同时必然使华东敌军得到增援，这样，反倒增加了我们战略决战的困难，从而使整个决战的战局受到影响。历史的发展，确实证明了这一战役决断，不愧是惊世骇俗之笔！

全歼东北之敌卫立煌集团，完全解放东北之后，毛泽东又运用“兵贵神速”、“出敌不意”的原则，接着命令东北我军，不待休整，便秘密入关，可以看作这篇妙文的过渡段。这一军事行动如此神秘，如此迅疾，妙在会同华北我军完成了对傅作义集团的分割包围，但是，毛泽东又命令

东北野战军“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

妙笔之四，是东北战役还在激烈地进行中，毛泽东便部署了淮海战役，并把这一战役分作三个阶段，而第一阶段的重心，就妙在确定“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等地上。因为淮海战场，蒋匪军60余万人，若加上以后增援的1个兵团及其他部队，共80余万人，取“一点两线，重兵密集”的态势，妄图以其精锐部队为核心，兵力靠拢，猬集一团，让我“吃不掉，啃不烂，歼不了”，并互相策应，守住中原，屏障南京。所以，要战胜他们，必须先行分割包围，使其不能机动灵活，互相迅速增援。所以，毛泽东的战役部署为：以优势兵力，即以2个纵队消灭敌1个师的比例，以6至7个纵队围歼黄伯韬兵团；而以5至6个纵队实行分割、阻援打援，牵制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使其不敢舍命东援等。

歼灭了黄伯韬兵团，首先断刘峙一臂，使其成了独臂将军；而使我山东、苏北解放区联成一片；还切断了敌人的海上通道，形成包围徐州、兵临淮海的态势，刘峙集团陷于四面被围，孤立无援，又无路可逃的绝境。

此后，我军稍松了松套在刘峙脖子上的绞索，缓歼杜聿明，稳住了东北、华北敌军，待东北战役全歼敌人，彻底胜利之后，才紧接着完成了第二、第三阶段的作战任务：歼灭了黄维兵团和刘峙亲自指挥的杜幸明集团，又取得了中原决战的伟大胜利。从而使蒋介石“力争华北，坚守中原，经营华南”的幻想彻底破灭，经营了20多年的蒋家王朝已是大厦将倾，土崩瓦解，气数已尽了。

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是何等的灵活！

毛泽东的辩证思想是何等的完美！

妙笔之五，是淮海战役鏖战正急的时候，毛泽东电令太原前线的徐向前、周士第，不要急于攻歼太原之敌，待到东北战役完全胜利，大军入关，淮海战役也已胜利，平津战役业已打响，再对太原之敌实施最后歼灭。这样做的妙处在于，既可以确保淮海战场之敌孤立无援，被我从容歼灭，又可稳住北平之敌，不致从海上逃掉或西窜，以增加我军日后消灭他们的困难。这是作战中战术上的策应，却是做文章中的细节，对于表现主题是何等的巧妙和不可缺少。

妙笔之六，是和平解放北平。淮海战役虽还在进行，但敌人被歼灭，我军稳操胜券，已成定局，所以北平之敌傅作义已成惊弓之鸟。傅作义60多万军队便企图由海上逃走，或西窜绥远。但没等傅作义惊魂稍定，毛泽东便命令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与华北聂荣臻兵团配合，以神速的动作，将敌人分割包围在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塘沽五个地区，使敌人既不能从海上逃走，又不能西窜绥远，完全处于收不拢、逃不掉的绝境。在完成这一战

役包围之前，甚至被围于张家口、新保安之敌，以及杨罗耿兵团所包围的敌3个师，都不先行消灭。淮海战场，也暂缓歼灭杜幸明残部。待我从容布阵完毕，再逐一歼灭。

1948年12月22日，围歼新保安之敌；24日攻歼张家口之敌；1949年1月14日，攻歼天津之敌，活捉顽抗的陈长捷，至此，华北之敌被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斩头去尾，分段歼灭。遂使北平20万守军被团团围住，陷于毛泽东布下的天罗地网之中，在我强大的政治攻势之下，傅作义便率部起义，接受和平改编，北平遂和平解放。

毛泽东象一位艺术高超的设计师，成竹在胸，精密设计，彼此呼应，左右逢源，真达到妙不可言的境界。

三大战役胜利结束，战略决战这篇雄文已基本作成，不过还有两个插曲也非常精彩，很值得一提。

一是，当辽沈战役刚开始的时候，我军得到消息，说傅作义的部队已经从北平、保定出发南进，扬言要夺回早已被我军解放的石家庄市，并妄图偷袭我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西柏坡。而我军在北平至石家庄之间，又无主力部署，所以情势十分危急。因而周恩来副主席作了如下部署：西柏坡的警卫部队，加紧训练，刺杀投弹，准备迎击敌人。若敌人敢于进犯，便坚决抵抗，掩护党中央、毛泽东安全转移，中央机关也做好了转移准备，当地农民也加紧秋收秋种、藏粮，准备转移。

毛泽东为了从精神上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便于1948年10月31日，亲自写了一篇新华社述评，公开警告敌人：我们已经作好了充分准备，你来对你没好处，你还是老实一点好。述评中还说：这里发生一个问题，你们究竟还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这样空康，只有一个青年军二八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稀稀拉拉几个兵了；总之蒋介石的整个北方战线，傅作义的整个系统，大概也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了，还在那里做什么石家庄的梦！

毛泽东在赞扬丁玲的一首词中曾说：“纤笔一技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毛泽东用的不是纤笔，而是如椽巨笔，又顶多少精兵呢？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大概就难以计算了吧。

述评一播，果真灵验。敌人象《空城计》里的司马懿一样，退兵了，而且很快，也算得上“兵贵神速”，他们逃回保定、北平等地。不久，保定敌军也龟缩到北平。

瞧，一枝多么名副其实的力敌千军万马的妙笔！

二是，在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天津又获得解放，傅作义的20万大军，便处于我人民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真是有天大神通，也插翅难飞。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强大的政治攻势之下，傅作义与我党派遣的中央军委副参谋长叶剑英，举行了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基于爱祖国、爱民族的热忱，以保护北平2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古都文物为重，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

但在和谈条件尚未全部执行的时候，傅作义将军却请求要亲自拜见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中央首长。

在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同意之后，傅作义和邓宝珊将军便飞抵石家庄，受到军委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迎接，并陪同乘吉普到达西柏坡，受到周恩来的热烈欢迎。周恩来肯定了傅作义的爱国行动，避免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是位爱国将领，并勉励他继续与我党合作，欢迎他参加后

来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使傅作义极为感动。

接着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接见。

接见时，傅作义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第一句便说：“我有罪！”毛泽东却赞扬他说：“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掉你的。”还勉励他说：你是功大于过。和平解决北平最好，你带了好头，立了个大功。将来你们都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了。还勉励他将来当个水利部长，更好地发挥作用。还给他讲了国内的军事、政治形势。傅作义极为激动，表示要“无条件地服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叫我做任何工作，我都保证把工作做好。在我有生之年，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也好弥补我过去的过错。”

他是狐疑而来，感激而去。

以后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得到完全、顺利的执行，还协助我党和平解放了绥远，直到解放之后，他任许多要职，如水利部长、国防委员等等，为建设祖国，全心全意、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看，毛泽东把这篇妙文做得处处伏笔，处处照应，承转关锁，浑然一体，多么细致入微，天衣无缝，绝妙之至！

总之，战略决战的这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到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4个月零19天，先后消灭了蒋介石的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共154万余人，取得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使蒋介石的老巢南京完全暴露在我军威胁之下，蒋家王朝的覆灭已指日可待，独夫民贼、内战、卖国的蒋介石也已成丧家之犬。正是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决战，使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得到充分发挥，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既继承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军事艺术，又使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在中国的革命战争中得以创造性地运用，并发展成毛泽东自己独特的军事科学体系，及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他在战略决战里，洞察全局，高屋建瓴，在指挥中国革命战争中，所表现的那非凡的英明和伟大气魄，是史无前例、无与伦比的，对中国、对世界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在写作战略大决战这篇超世绝俗的妙文过程中，胸怀全局，周密布阵，此呼彼应，环环相扣，三大战役，各具特色。真可谓妙思泉涌，奔赴笔下，处处生花，异彩纷呈，让人目不暇接。

“起笔惊天地，落墨注鬼神”，中外古今军事史上，经过如此多，如此复杂，规模如此大的战斗，其指挥艺术发挥到如此登峰造极的程度，其军事理论具有如此鲜明的民族、时代特色，又具有如此的世界普遍性，毛泽东之外，还没有第二个人。

因地制宜学列宁 丰富发展游击战

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产生，也在斗争中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在他的时代认为，必须以革命的暴力，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认为这种革命，必须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丰富发展了关于国家革命的学说。在他的时代，提出：“社会主义下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便开辟了“十月革命”的道路，使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继承了列宁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他的时代，则认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如中国，也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不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并在实践中，坚持“十月革命”的道路，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井冈山”道路。使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夺得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

从继承和发展中，明显地看出：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马恩思列宁主义，每前进一步，都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才有所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的军事学说中，也是如此。如毛泽东对列宁关于“游击战争”的理论，便有继承，有突破，有发展，甚至使这一理论达到高度科学化、艺术化的程度。

1906年列宁在《游击战争》一文中，曾说：“马克思主义决不拒绝任何一种斗争方式。”并指出：“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的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这就充分肯定了“游击战争”这种斗争方式，并斥责了对游击战争的种种怀疑和攻击。

毛泽东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极为严肃认真，尤其重视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但他绝不象“左”倾机会主义者那样，教条地照搬苏联的经验，搞什么“一省数省的胜利”，把希望又寄托在攻打大城市上，给革命造成难以弥补的危害。毛泽东认为，不对具体问题作具体的分析，不承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的阉割。应当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继承和运用马列主义，又要在本国的革命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

列宁所指的“游击战争”，主要是指在“黑帮政府反对居民的武装冲突和搏斗”条件下，“居民自发地、无组织地——因此也就往往采取不能奏效的坏形式——用武装冲突和攻击来对待这种现象。”他还说：“有人说，游击战争会把觉悟的无产阶级弄到不可救药的无赖流氓的地步，这是对的”，并进一步得出结论：“无产阶级的政党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把游击战争当作唯一的斗争手段，甚至是主要的斗争手段。”因而主张：“社会民主党应当好好培养和训练自己的组织，使它们真正能够起作战一方的作用，不错过任何一个打击敌人力量的机会。”这些论述，是列宁考察了俄国、那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而提出的，也许完全是对的。

但毛泽东没有无条件地照搬这一理论，更没有象从苏联回来的那几位秀

才那样，无条件地实行。因为任何一国、任何革命的经验，既有普遍性的一面，更有特殊性的一面，因而只能学其精神，至于具体如何做，则要考察中国革命各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然后作出抉择。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具体环境的特点是：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极不平衡，但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敌人的强大，他们有武器、军事物资都远比革命武装强大的常备军；红军的弱小，数量、武器、作战物资远不如敌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些特点便奠定了井冈山时期的战争形式只能是游击战的理论基础；其战争形式绝不能是苏联“十月革命”式——首先在大城市起义，然后推进到全国；也不能是采取中国的北伐战争式——长驱直入，占领大城市，而必须是以农村为根据地的游击战；并且必须有一套适合中国特点的、科学的战略战术；决定了中国弱小的红军，能够在与强敌的战争中夺取胜利。

所以，中国的游击战争，无论理论的深刻性，战略战术的科学性，指挥艺术的灵活、丰富多彩性，还是实践的有效性，都不是列宁所指的“游击战争”所能比拟的。

首先，中国的游击战争，绝非自发的、无组织的、盲目的行动，而是一开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有目的、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武装起义；它有着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得到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忠实支持；它有着严密的军事组织，尤其在三湾改编之后，军队完全在党的指挥之下，并有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保证，有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即使有相当的游民、流氓无产者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但在党的教育影响下，也绝不会“把无产阶级弄到不可救药的无赖流氓的地步”，倒是这些游民、流氓无产者在党的教育影响下，在革命实践的自我教育中，锻炼成长为自觉的革命者；它还有坚强的纪律性，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和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更保证了军事行动的高度统一。

就是这样一支在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成功地、极为有效地进行了“游击战争”，取得了第一次到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人类战争史上发出耀眼的光辉，在中国、在世界，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仅以第三次反“围剿”为例。蒋介石亲自出马任总司令，分兵三路，中路何应钦，左路朱绍良，右路陈铭枢。“进剿”军由第一次“围剿”的10万人、第二次“围剿”的20万人，到这次的30万人马，取“长驱直入”的战略，风烟滚滚，气势汹汹，直扑革命根据地。而我军却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安一点，由西而东，向敌人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诱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武之地。及至敌人觉察，回头向北，我则乘机打其疲劳者。然后向莲塘、良村、黄陂突进，四天连打三仗，三战皆捷，缴枪逾万。敌主力发现我意图，猛力并进，找我作战，我却穿插迂回，休整自己，疲劳敌人，使敌人的士气沮丧，我则避其锋芒，击其虚弱，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终使蒋介石无能为力，枉自嗟叹，只好退却。真可谓不可一世而来，弃甲曳兵而逃。毛泽东所谱写的“游击战争”的篇章，其高超的指挥艺术，也熠熠生辉。

还是在井冈山游击战争时期，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就开始形成了一套尽管带有朴素性质却是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术，这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以后毛泽东又在实战中提出了“诱敌深入，避敌精锐，击其虚弱”的方针。这就包举了游击战中的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两个阶段；而战略防御又包括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形成了较为

全面、又为实战证明是正确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如：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反对游击主义，承认游击性；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役的速决战和战略的持久战；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反对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反对大后方思想，承认小后方思想；反对绝对的集中指挥，承认相对的集中指挥；反对单纯的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承认红军是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反对土匪主义，承认严肃的政治纪律；反对军阀主义，承认有限制的民主生活和有权威的军事纪律；反对孤立主义政策，承认尽量争取一切可靠的同盟者，等等。总之，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也有防御和后退。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充满生动活泼的辩证法和高度机动灵活的军事指挥艺术，使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从理论到实践都趋于成熟。

然而，“左”倾冒险主义者，闭眼不看世界，不看中国革命的实际，好象脑袋长在别人的脖子上。他们基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剧”、革命高潮的形成，甚至认为世界革命也即将成功等错误理论，提出了“三次反‘围剿’被粉碎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然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错误路线，狂热地提出与蒋介石的战争是“国与国作战”，要“全面出击”、“夺取中心城市”、“御敌于国门之外”、“要决战”、要“绝对的集中指挥”、“两个拳头打人”等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抛弃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反诬游击战为“游击主义”，“是山沟沟里产生的”，这些毫无马克思主义气味的鲁莽家和战争门外汉们的理论与孤行，最后导致了极为严重的恶果：“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成了逃跑主义。”使红军连遭劫难，损失大部，根据地丧失殆尽，被迫长征。造成了革命史上最惨痛的教训。

恩格斯在1840年4月1日所作《皮蒙特军队的失败》一文中就曾指出：皮蒙特人一开始就铸下的一个大错误，就是他们只用正规军队来抵抗奥军，他们想进行最一般的、资产阶级式的、规规矩矩的战争。一个想争取自身独立的民族，不应该仅限于用一般的作战方法。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方法。

这多么象是针对中国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所发的响箭，准确无误地击中其教条主义的要害，显出他们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也多么清晰地看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英明，以及他关于游击战争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当时的历史条件是，中国大而弱，它是个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大国，又是近百年来任人欺侮、任人宰割的弱国，但是，它所进行的民族战争，却是反侵略的正义的战争，因而是进步的；日本帝国主义小而强，虽然它的军力、物力、财力是强大的，疯狂一时，不可一世，但是它国小、人少，所进行的战争，是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因而是落后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既不会失败而亡国，也不会轻易速胜，但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却是肯定的，日本帝国主义凶狠、残忍，但它陷于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象一匹野牛陷于火阵，既不可能速决，又因人力、财力、军力的匮乏绝不能持久，所以最后的失败，也是必然无疑的。

反映在军事上，中国的抗日战争的作战形式，也决不能只是单一的正规

军的对抗作战，而必须是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等的结合，相辅相成。

抗日战争的根本规律是战略上的持久战，而且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论持久战》）随着这种防御——相持——进攻的发展和变化，各种主要战法也有着不同的地位和作用。第一阶段，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和游击战为辅；第二阶段，则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和阵地战为辅；第三阶段，以运动战为主（并非第一阶段的正规军进行的运动战，而是游击军所担负的游击战上升为正规军所进行的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为辅，而这三个阶段上的游击战的地位和作用也绝不完全相同。

运动战的特点是：正规兵团；战役和战斗的优势兵力；进攻性和流动性。游击战的特点则是：在战场、战地、战区的高度主动性，取得自由权；兵力的指挥和使用上的灵活性，分散以发动组织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及时转移，不拘于一城一地、坛坛罐罐；客观条件下尽可能严密的计划性。所以，八路军的作战方针只能是：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并且出现了“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

本来，游击战在正规军的战役作战上起近距离的、直接的配合作用，即只起战术作用。但在中国，国大、力弱、抗日的持久性等特殊条件下，游击战就不但是主要的战争形式之一，而且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和作用。毛泽东把这种战略作用归纳为六项：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二、和正规战争相配合。三、建立根据地。四、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五、向运动战发展。六、正确的指挥关系。而且在战术思想和实战的指挥上的“防御和进攻，持久和速决，内线和外线；一切行动立于主动地位；灵活地使用兵力；一切行动的计划性”，等等，其思考的严密性、灵活性，其得心应手的程度，都达到高度艺术化的境界。

在中国的军事传统中，出现过关于游击战争中的某项战略战术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如：“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孙子·九变》）便涉及到作战中的防御和进攻问题。“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孙子·谋攻》）便涉及到作战中的指挥和灵活地使用兵力。但这是朴素的，孙武没有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谈论现代化战争，尤其是游击战争中的战略战术问题。

在国际上虽然有过游击战争，如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古巴、越南在解放战争中的游击战；也有一定的理论建树，如列宁的《游击战争》等，但没有任何一国能象中国的游击战争，有如此复杂而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既有阶级战争中的游击战，如土地革命战争、解放战争，又有民族战争中的游击战，如抗日战争，更没有哪一位军事家象毛泽东那样，对游击战争，有如此全面、系统、科学、深刻的论述，不但肯定游击战争这种斗争方式，肯定它的战术地位，并由此制订出一系列战术原则，而且创造性地肯定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并由此制订出一系列战略原则。从理论上的论证，到具体的战略战术的制订，都既继承本民族最优秀的军事传统，也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传统，并丰富和发展了这些传统，使之发扬光大。

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的理论，确实有着自己独特的创造性，确实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并达到新的高峰——到目前为止，中外还没有任何人能逾越的高峰。游击战争这篇文章，确实让毛泽东做活了，做绝了。毛泽东所表现的军事战略家的风范，其军事思想的深刻性，其军事艺术方面的造诣，不但史无前例，即使在现代，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还没有谁能与他媲美。

后 记

毛泽东是一位破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时代伟人。他一生的宏图伟业，在中国人民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也在国际社会中确立了他特有的地位。怀着对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崇敬和怀念，很久以来就想写点什么以表达这种感情，沉淀的记忆和感情的积累，终于使写作的冲动找到了突破口，捕捉到了一个较为满意的角度——即从艺术的角度来审视毛泽东同志的思维、军事、语言、诗词和书法等方面给人类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为了再现这一时代伟人的形象和神采，当然最好也只能是以确凿的历史史实和生活画面为依据，经过精心的筛选、艺术的加工和润色，使毛泽东这一宏伟的艺术殿堂和丰富深蕴的风姿巍然屹立在人们面前。使人们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更真实地看到毛泽东的全人，认识到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领袖，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一位独辟溪径、富有个性的艺术家。成书的过程中，我们广泛地阅读、参考、借鉴了大量的中外学者、作家、师友有关毛泽东题材的传记、编译著作，如：美国作家 R·特里尔著的《毛泽东传》、海鲁德等编著的《生活中的毛泽东》以及《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等。在此除向这些中外学者、作家、师友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外，我们还为在宣传毛泽东、歌颂毛泽东方面，有这样众多的志同道合者感到十分欣慰。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毛泽东的伟人形象和不朽著作，必将使通向韶山的蹊径绵延悠长，越走越宽广。

当然，我们的动机和想法虽好，但由于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纸漏和缺陷，敬请各位学者、作家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毛泽东的艺术世界》丛书，由王永盛、张伟作了整体的构思、设计、统编、修订，具体分工是：《毛泽东的语言艺术》由王永盛、张伟撰稿；《毛泽东的诗词艺术》主要由路则逢、其次是田翠云、王永盛撰稿，张常修、王军参加了部分编写；《毛泽东的思维艺术》主要由张同夫、王永盛撰稿，其次是张伟、陈慕真、袁福刚、王军、陈永华参加了部分编写；《毛泽东的军事艺术》主要由张健、刘庆华撰稿，其次是路则逢、王永盛、张伟、石蔚东参加了编写；《毛泽东的书法艺术》主要由刘锡山撰稿，其次是袁宗轩参加编写。

在该丛书出版过程中，还得到了许多领导、学者和朋友热情的帮助和真诚的合作。山东大学出版社的领导、编辑以及山东省新闻出版局的领导和图书处的同志对该书的出版给予了热情支持和帮助。山东省委宣传部审阅了全部书稿，孟宪仁先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南京昆仑书店也对该丛书的发行工作，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

1991年6月

